



引用格式:薛庆超.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密码: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3): 1-17.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3.001

文章编号:1009-3729(2021)03-0001-17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密码

——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The success cod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 a century of struggle

—from “historical activities are the activities of the masses” to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inking”

薛庆超

XUE Qingchao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宣传教育局, 北京 100017

摘要:从马克思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群众路线,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至上”,贯通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路线成为“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要求全党“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路线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革命战争就不能取得胜利;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壮大;没有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能取得辉煌成就。当下,中国共产党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领导中国人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建党百年;
群众路线;
人民至上;
成功密码

[收稿日期] 2021-04-14

[作者简介] 薛庆超(1955—),男,河南省南阳市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原副局长,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时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1]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引领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革命。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从而科学地揭示了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和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⁴¹¹,“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⁴²²。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

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4]“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5]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这些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核心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经过对中国革命实践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与理论升华,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困苦环境中战胜强敌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同志要求我们做工作必须考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江泽民同志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提出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这一届党中央明确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一以贯之的。在前进征途上,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紧紧依靠人民,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人民至上,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使之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路线成为“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独创性的群众路线,它成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之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来自各地的13名代表,代表着50多位党员,手无寸铁。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期间就遇到“惊涛骇浪”,不得不中断会议,后在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上完成全部既定议程。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要搞好群众工作,使“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案中,提出一切工作要在群众中进行,“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土地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奋斗历程,深入农村建立共产党的各级基层组织,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各级工农政权,强调必须紧紧依靠群众才能完成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在此基础上,中共六大作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重要论断和具体要求。在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1929年6月中共红四军七大前后,就红军应该承担什么任务问题上在红四军党内存在一些争论。毛泽东认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打仗外,还要肩负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帮助地方建立党组织等

政治任务;另一种意见认为红军只管打仗。中共红四军七大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没有被认可,毛泽东的红四军前委书记没有继续当选。红四军党内的争论没有解决,随后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八大仍然没有达成共识。在此期间,红四军代表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代表中央听取红四军工作汇报。中央作了专题研究,周恩来代表中央向红四军作重要指示,形成《中央对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央对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提出,红军一切要接受党组织领导,仍然由毛泽东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中央对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三次提到群众路线:一是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二是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三是红军给养与需用品问题也要“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红四军接到《中央对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后,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意见,立即派代表到闽西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工作。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后召开一系列座谈会,把各种问题一一梳理清楚。在此基础上,他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九大——古田会议,通过《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不仅要打仗,同时要深入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帮助地方建立革命政权和共产党组织,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全面执行,红四军各种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从此,群众路线深入人心,中国革命深入发展,红四军发展成为红一方面军,逐步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长征途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农民、兵士和一切劳苦民众的出路在共产党主张的苏维

埃红军,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许多感人的红色故事如“半条被子的故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020年9月16日至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指出,“半条被子”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为民本质^[7]。永远同人民群众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同甘共苦,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中共八七会议后我们党领导了大大小小100多次武装起义,逐步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等,最后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导,只剩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创建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能够“硕果仅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不渝地坚持群众路线。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刘志丹任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强调: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还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发展,我们进行的是土地革命,只有正确执行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才会拥护我们;边区政府的每一个同志,都必须听懂政策;掌握政策,才能正确执行政策。做群众工作时,一个村子、一户人家都不能落下,要一家一户宣传和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没有红军,根据地就保不住,没有根据地,红军就没有依托、没有家、没有后方;建立根据地、扩大红军都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只有紧紧依靠群众,我们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才能发展壮大。每当刘志丹率领红军打下乡村、城镇时,习仲勋总是带领工作人员一家一户地做工作,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发展积极分子,建立革命政权,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推翻国民党统治。刘志丹、习仲勋等一直与人民群众保

持密切联系,凡是遇到问题,总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问计于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日益发展,最后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点”,随后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成为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和中共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主张依靠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抗战,这是“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主张发动全国人民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铸成新的长城。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实质就是依靠人民群众抗战,就是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洛川会议研究八路军挺进华北前线的战略方针,有的同志主张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主要是对日军作战。毛泽东主张,八路军一方面要对日军作战,更重要的是发动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建立广阔的抗日根据地,在战胜日本侵略者过程中,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等,要求中国共产党要站在抗日战争前列,发动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要大力支持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随后,八路军挺进华北前线实行战略展开,平型关首战告捷,阳明堡夜袭日军飞机场,连战皆捷,影响很大。接下来,八路军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实行第二次战略展开,把主力部队按照团营连分散,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等。南方红军游击队组成新四军,依靠人民群众,在大江南北开创一系列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琼崖纵队等依靠人民群众创建华南一系列抗日游击根据地。日军占领香港九龙后,东江纵队通过

秘密交通线,把大批国际友人、著名爱国人士和文化名人安全护送到大后方,创造了一大奇迹。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抗日根据地的男女老少充分动员起来。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民皆兵、全民参战的战略,开展伏击战、游击战、麻雀战、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水上游击战等,人民战争大显神威。人民战争“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1943年6月,毛泽东总结了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新做法、新创造和新经验,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高度,对群众路线进行了深刻阐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8]899}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深入实践群众路线,凝聚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坚持抗战直至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生动体现,这是最广泛最彻底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对群众路线进行了全面阐述:“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8]1094-1095}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中专门论述了群众路线对于党的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9]342},群众路线“就是要使

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就是指导方法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路线”^{[9]348}。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不仅是发展党员、搞好基层组织建设、注重干部培养、干部选拔、干部使用,更主要的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发现和培养先进分子,建立各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权。因此,中共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明确规定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为了鼓舞全党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实现此次会议所确立的路线,毛泽东讲了中国古代“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并赋予其新的政治内涵。毛泽东号召全党,以“愚公移山”精神带领中国人民顽强奋斗,彻底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成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和民族先锋,在浴血奋战中党的力量得到空前发展,拥有一百万人民军队、一亿人口的解放区和大批民兵,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生机勃勃、十分成熟、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党。由于在抗战中奠定了强大政治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抗战胜利后我们党很快就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集结25万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西北野战军只有两万多人。面对强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说,别看敌人貌似强大,他们脱离人民,陕甘宁边区这个地方虽然贫穷,但是人民群众和我们站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铁桶江山”;敌军虽然貌

似强大,但最后必然会被我们所战胜^{[10]317}。历史的发展,完全被彭德怀的预见所证明,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占领延安后,赶快向蒋介石“报捷”,蒋介石想要看看红军长征后在陕北发展壮大的奥秘所在,看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究竟用了什么法宝。于是,蒋介石乘坐“美龄号”专机飞到延安,来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住过的窑洞,仔仔细细、里里外外看了一遍。就是在这种纯天然的原始状态的窑洞里,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落地生根,由弱到强,发展壮大,最后彻底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占领延安后,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青化砭战斗消灭国民党军一个旅,活捉旅长和一批国民党军官兵。西北野战军打扫战场后,立即撤离战场。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很快开了过来。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西北局书记兼西北野战军副政委习仲勋站在黄土高原的山上观察敌情,看到国民党军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民群众利用消息树等接力发信号——暗示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彭德怀非常高兴地说:什么是天罗地网,这就是天罗地网啊!有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帮助,我们必然战胜国民党反动派^{[10]317}。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原战场上,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进军大别山期间,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将用国民党一个将领名字命名的县名改为“伯承县”。刘伯承认为,解放区应当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建立新社会开始新生活,坚决反对将该县名改为“伯承县”,而是建议改为“新县”。这就是河南省新县名字的由来。1948年春,刘邓大军从大别山区进入河南中西部地区,改名为中原野战军。人民群众纷纷提供粮食,参军参战,支援人民解放军。邓小平曾就此非常高兴地致电中央,进入河南境内后,兵源、粮源十分充足。邓小平也曾回忆

说,解放战争时期心情非常舒畅,胜利一个接着一个,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都得到圆满完成。人民解放军攻克当时中原地区第一个省会河南开封时,坚决贯彻了群众路线。开封战役刚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封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就发出毛泽东修改的《入城布告》,保护一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一切文化教育机关和学校。硝烟未散,人民解放军警备部队已在河南大学、河南省图书馆、开封市图书馆门前站上了岗。河南大学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校,当时很多进步教授、学生和河南省会大批知识分子、名流学者纷纷参加革命。他们刚刚进入中原解放区,司令员刘伯承、陈毅、陈赓就来看望他们。在这些大学教授、名流学者心目中,刘伯承将军、陈毅将军、陈赓将军都是“天兵天将”一样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物,现在一个个穿着粗布军装谈笑风生,简直难以置信。陈毅说,我们有两支队伍,一支是武装的队伍就是人民解放军,一支是不穿军装的队伍就是文化战线的队伍。因为解放区日益扩大,急需大批干部,邓小平主持中原局决定,以这批河南文化界、教育界的名流学者和河南大学进步师生为基础建立中原大学,为中原解放区培训干部。中原大学为中原解放区和中南地区培训了大批干部,后发展成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上,1946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后改为东北野战军)总政治部在政治工作指示中指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只要我们把群众发动起来,群众是拥护我们的,国民党就得不到群众的拥护。1946年7月7日,东北局通过了东北局副书记、东北野战军副政委陈云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史称《七七决议》),中央修改后批准。《七七决议》根据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强调指出,“大城市是我们所需要的,

但大城市暂时一般地不易确保,如果偏重大城市,轻视建立根据地,我们将有既无大城市又无根据地的危险。因此,必须规定,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11]346}。“创造根据地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群众”^{[11]346}，“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11]348}。《七七决议》要求东北各级干部到农村去,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东北局号召广大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造成共产党员面向农村,深入农民的热潮”^{[11]348}。东北局负责人分头到东北各地传达贯彻《七七决议》精神。在东北解放战争形势严峻之际,《七七决议》统一了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党政军干部的思想,使东北地区工作方针和人民军队作战指导思想,转变到中共中央制定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上来,并成为东北地区各级党政军干部的实际行动。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和《七七决议》精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克服悲观情绪与和平幻想,树立进行艰苦战争的决心;整编训练部队、及时补充兵员,组建炮兵、坦克兵、铁道兵、工兵等特种兵部队;实行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相结合,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使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战斗力迅速提高。东北局动员数万名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土改工作队,到农村发动群众。经过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扎扎实实的群众工作和建设东北根据地的艰苦工作,通过“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等战役战斗,我们党有力扭转了东北战局,为解放全东北奠定了基础。辽沈战役进攻锦州总攻之前,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要求各纵队做好战时政治工作,特别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随着东北野战军胜利

进军,东北解放区人民群众组成民工团,东北野战军打到哪里,东北民工团就跟进到哪里。东北野战军之所以后勤保障非常充分,一方面由于辽沈战役缴获国民党军大量物资;另一方面由于东北民工团带着这些物资跟着东北野战军前进,从东北到华北,直到中原和中南地区解放才返回东北。

全国解放战争三年取得胜利的战略决策是毛泽东问计于民的结果。中共中央迁到西柏坡后,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做地下工作的胡愈之来到解放区,当他听说中央预定用五年时间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夺取革命胜利时,就说国民党已经彻底腐败了——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军事腐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都希望人民解放军赶快进军,早日解放全中国。胡愈之的谈话被报告给中共中央,毛泽东把胡愈之请到西柏坡,听他详细讲述国民党政治崩溃、军事崩溃和经济崩溃,以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盼望人民解放军尽快进军的详细情况。毛泽东征求各方面意见,召开中央会议果断决定,大大缩短人民解放战争进程,用三年时间从根本上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斗争将会更艰苦更复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2]。“两个务必”的核心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完全相信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体现在党的全部活动中,体现在重大决策中,体现在战役战斗中,体现在共产党人的日常行动和群众关系中。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要解放全人类。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就不能使

无产阶级自己最后得到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要求全党“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路线、发展群众路线,赢得中国革命胜利。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仍然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路线、发展群众路线,赢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担负进军西藏任务。邓小平指出,进军西藏要严格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所谓群众路线,包括调查研究等。第十八军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首先了解西藏的民情民风。通过调查研究西藏的实际情况,为进军西藏、服务西藏群众、和平解放西藏、争取西藏群众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进军西藏过程中,第十八军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民族团结政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充分尊重西藏群众的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未经许可不准进入寺庙,更不准住经堂;不得在寺庙附近捕鱼、打猎;不得到神山砍柴、放牧等;积极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为群众背水、扫地、打柴、修补房屋,免费治病,发放无息或低息农业贷款,进行社会救济,修桥、修路,办学校,稳定市场物价,供应部分民需物资等。为了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十八军指战员遇到缺粮挨饿,绝不拿群众一粒粮食;遇到风雪严寒,绝不进喇嘛寺庙,坚持搭帐篷宿营。这些优良作风,体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增进了民族团结,确保了进军西藏的胜

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甘肃甘南一些地方发生国民党从台湾空降过来的特务暗中煽动操纵的叛乱,于是,西北局负责人兼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会见甘南藏族代表人物黄正清。黄正清在大革命时期曾得到共产党人宣侠父的教育和影响,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时,深受宣侠父宣传的革命思想影响的黄正清迅速和第一野战军取得联系。彭德怀、习仲勋立即派人把黄正清接到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黄正清宣布起义加入革命阵营,听从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指挥。在彭德怀、习仲勋亲切关怀下,黄正清担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黄正清对习仲勋说,他愿意到甘南地区平息叛乱。习仲勋授予他平息甘南地区叛乱的全权,任命他为甘南剿匪副司令员^{[10]325},一边说一边把随身佩带的手枪解下来交给黄正清,让他带上护身。黄正清深受感动,到甘南地区振臂一呼,少数民族群众纷纷骑着快马带着猎枪聚集到他的驻地,他把藏族群众编成藏族骑兵剿匪团,配合人民解放军骑兵团,布下天罗地网,穷追猛打,把叛乱分子一网打尽,活捉叛乱头子交给了人民政府,甘南地区平叛取得彻底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持群众路线的历史经验和执政后发展群众路线的新鲜经验,对群众路线做了详细阐述:“党章草案的总纲,着重地指出了党必须不断地发展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并且指出了这个任务由于党成了执政的党而有更加重大的意义。”^{[13]216-217}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中第一次写上了“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主张的实现,都要通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人民群众中间的活动,都要通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自觉的努力。因此,必

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14]中共八大还提出,坚持群众路线,要注意建立制度,要加强监督,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对群众路线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中央领导人在坚持群众路线方面树立了光辉榜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十周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会见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淘粪工人时传祥时说:你做淘粪工人,我做国家主席,咱们都一样,只是革命工作分工的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刘少奇是第一个把国家领导人与普通淘粪工人视为平起平坐地位的领袖,显示出很高的思想境界。

1961年春,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担心到其他地方调查研究听不到来自农村的真话,决定到自己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调查研究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他首先来到一个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当时宣传这个生产大队有一个养着几万头猪的大型养猪场,号称“万头猪场”。实地一看,哪里有什么“万头猪场”,只有几头瘦得不像样子的小猪。他说,这就是你们宣传的“万头猪场”呀,咱们的调查研究就从这里开始吧。于是,他住在农村,一家一户、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实地了解真实情况。刘少奇对一个少年时代一起放过牛的农民说,你说真话,到底现在农业减产、农村困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农民说,有天灾的因素,但是要让他看呢,“万头猪场”不是天灾,主要是人祸。人祸就是由于人们主观认识和做法造成的农村经济困难问题。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研究44天,走村串户,了解情况。回到北京后,在中央会议上他大声疾呼,要采取果断措施,扭转危局,迅速解决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他本来准备了书面报

告,又临时即席讲话,实事求是地分析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原因,提出一系列扭转困难局面的重大举措。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刘少奇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充分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坚持实事求是的崇高品质。

历史证明,全面贯彻落实群众路线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对是否实行群众路线出现过曲折和不同意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否坚持群众路线同样不是一帆风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5]¹⁴⁴“十年内乱”时期,群众路线荡然无存。“文化大革命”时期召开的中共九大和中共十大都从《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删去了关于群众路线的内容。历史发展历经曲折后,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终于彻底粉碎了“四人帮”。当时,国际国内对粉碎“四人帮”有很多说法。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时提出一个问题:粉碎“四人帮”究竟是谁决定的?是哪一个人、哪几个人决定的?邓小平回答说:“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16]《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粉碎“四人帮”做

了历史结论:“同年(1976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15]146}邓小平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阐述的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是历史的创造者。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路线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实事求是成为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源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蕴含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群众路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挥集体智慧,与会同志畅所欲言,来自全党全国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充分展现,不论发表怎样尖锐的意见都可以在会议简报上得到直截了当、直言不讳的充分反映。与会同志回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会前中央工作会议发表的各种会议简报,相当于两部《红楼梦》、三部《三国演义》的厚度,中共中央集思广益,发挥集体智慧,汲取与会同志意见,集纳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历史性转折,开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

国的改革开放以农村改革为起点,农村改革来自人民群众的创造。邓小平曾多次讲过:农村改革不是他的发明创造,是来自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他的作用只是把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总结出来、推广开来。邓小平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问题,树立了坚持、丰富和发展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全党全国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指示,安徽等地依靠群众在农村改革方面走在前列,进行许多有益探索,勇于大胆创新,总结出许多新鲜经验,迅速得到广泛推广。“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农村改革蓬勃发展,成效显著。改革开放初期创办经济特区也是坚持群众路线的结果。1978年底,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一政委,遇到一个突出问题:广东农村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许多农民抛弃土地、抛弃家乡,逃到香港“打工”去了,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成为一种风潮,被称为“逃港风”,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制止不了;有些地方甚至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青壮年都跑光了,被称为“逃港村”。习仲勋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逐家逐户逐村做群众工作的光荣传统,带着省委的同志到“逃港风”严重的“逃港村”走村串户,与农民和农村干部拉家常、开座谈会,了解实际情况。了解到发生“逃港风”的真实情况后,习仲勋主持召开广东省委常委会议认真研究,向中央提出划出一块地方给予特殊政策,迅速把经济搞上去,迅速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搞上去,从根本上解决“逃港风”问题。习仲勋还面见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当面阐述广东省委的主张。中共中央完全同意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意见,经济特区应运而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迅速发展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这样一来,人们吃惊

地发现,“逃港风”消失了,过去逃到香港打工的农民又回来了。经济特区建立初期并非一帆风顺,各种议论都有,有的说经济特区是资本主义的,有的说深圳经济特区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还是社会主义的,其他都已经变质了。为此,邓小平1984年到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实地考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他风尘仆仆,来到企业、码头、农村、渔村、工厂、公司等单位,与工人、农民、渔民、科技人员、企业家、港澳人士甚至和住地服务员都进行了广泛接触、交流和谈话,最后得出结论:经济特区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实践证明,我国设立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回到北京后,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问题。随同他一起到经济特区考察的中央领导同志专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介绍经济特区的发展成就。根据邓小平实地调研和中共中央决策,经济特区的发展进一步得到各方面大力支持,迅猛发展。中央继续开放沿海14个城市,实行沿海地区开放、沿江地区开放、沿边地区开放,使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沿江地区、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协调发展,既带动了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也有力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迈上新台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检验经济特区的唯一标准。历史发展已经证明,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非常好的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现在,深圳经济特区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城市和乡村的区别已被打破、完全融为一体,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圳示范区”。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

党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深刻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15]163-164}

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发展都证明,革命战争年代需要依靠群众路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需要依靠群众路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实践创造和理论创新依然需要依靠群众路线。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对群众路线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际风云急剧变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重大挫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解散。在此前后,邓小平反复强调:“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17]321}邓小平对中央领导同志说:“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

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17]³⁶³为此,邓小平再次视察南方,来到深圳经济特区和珠海经济特区等地,到工厂、农村、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单位,广泛接触方方面面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农民、工人、企业家、港澳人士,问计于民。邓小平通过走群众路线,实地调查研究,从中得出正确结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完全正确,中国建立经济特区完全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正确,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幻的时候,我们要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中国经济实力逐步增长,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日益提高,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的严峻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依然保持蓬勃旺盛的生机与活力,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为了人民。历史证明,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要力量源泉。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深化改革过程中不断总结改革开放新鲜经验,大力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引领中国顺利实现从20世纪向21世纪的跨越。21世纪初,中央负责同志到广东省和经济特区调查研究,在广泛接触人民群众、深入调研过程中,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进一步升华,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2003年初中国一些地方发生“非典”疫情,在一段时间内传播得相当厉害。中央负责同志来到广东“非典”疫情最严重的广州街头同人民群众一起同甘共患难,调查研究,探讨迅速消灭“非典”疫情的科学办法。中共中央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听取科学家与各方面意见和建议,采取一系列科学有效的果断措施,很快遏制住了“非典”疫情。在此基础上,根据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需要,中共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决策,形成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人民至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与实践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强调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9]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丰富和发展群众路线的重大举措,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中共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集体活动是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那天上午陪同参观的中央各部委领导干部按时到达国家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却迟到了半个多小时,原因是他们在前往国家博物馆的路上没有让警察封路,也没有用警车开道,北京正处于上班时间,路上堵车,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领导同

志耐心等待,同其他车辆一起缓缓行进,所以迟到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20] 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到南方调研期间,沿着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路线对广东特别是经济特区进行实地考察,并在深圳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当时香港媒体一男一女两个记者,在邓小平铜像广场附近漫步,看到一些群众在那里晨练,过了一会儿,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和一些领导同志过来了,既没有清场也没有戒严,一切照常。他们亲眼看到,广场上的人民群众无论男女老少都走过去向总书记表示问候,与习近平总书记热烈握手,习近平总书记一边向大家打招呼一边跟大家握手。两个香港记者站在旁边比较羡慕,想着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了,我们也可以上去和总书记说几句话、握握手啊。于是,两个香港记者就勇敢地走了上去,同习近平总书记互相握手、问好,一切都非常亲切,一切都非常自然,一切都非常朴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在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反腐倡廉、坚决扫黑除恶、首倡厕所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决策,深得民心,很接地气,得到全党全国人民衷心拥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共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西雅图即席演讲中可以看到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主席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走过了一段很不平凡的历程,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上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庄插队当农民,在那儿度过了7年时光。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我了解乡亲们最需要什么!后来,我当了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我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今年春节,我回到这个小村子。梁家河修起了柏油路,乡亲们住上了砖瓦房,用上了互联网,老人们享有基本养老,村民们有医疗保险,孩子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当然吃肉已经不成问题。”^{[21]29-30} 他还说:“这两年,我去了中国很多贫困地区,看望了很多贫困家庭,他们渴望幸福生活的眼神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21]30} 习近平担任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要让乡亲们经常吃上肉,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是其“初心”和“使命”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22] 他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我们将举全党全国之力,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确保兑现我们的承诺。”^[23]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到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调查研究,实地解决问题,部署脱贫攻坚,号召坚决打赢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战役,让14亿中国人进入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活幸福的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期盼。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属于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该村实地调

研,亲眼看到当时的十八洞村穷得叮当响。习近平总书记走访多个“低保户”“特困户”,看民居、问民情、揭米仓、进猪圈,仔细了解村民生产和生活情况,询问水、路、电、教育、医疗等情况,并与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座谈。在这次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强调抓扶贫开发,既要整体联动、有共性的要求和措施,又要突出重点、加强对“特困村”和“特困户”的帮扶。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新理念,中国共产党确定“精准扶贫”战略,成效显著,大得人心。2016年3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湖南代表团现场,开口就问:“去年有多少人娶媳妇?”人大代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回答:“7个。”代表们听了习近平与州长的对话,会心地笑了。习近平总书记问的正是十八洞村的情况,州长回忆起了习近平总书记到十八洞村调研的情景。习近平总书记说,他正式提出“精准扶贫”就是在十八洞村,前几天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十八洞村脱贫进展情况,他都看了。习近平总书记问:“现在人均收入有多少了?”州长回答:“您当年来的时候是1680元,现在已经增加到3580元。”州长说,十八洞村百姓收入增加,村容村貌变化,已成为全省文明村和旅游定点村,村民笑容多了、求发展愿望强了,连大龄男青年解决“脱单”问题也容易了。从中华民族祖先憧憬小康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既继承前人又不断创新,引领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指标”,这样,就会使愈来愈多弱势群体和经济文化落后地区过上小康生活。

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铭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目标,推翻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国共产党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脱贫攻坚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以及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创造力、组织力和领导力,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对小康的美好期盼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是对中华民族发展的伟大贡献,具有前无古人的历史意义。中国用了三十多年时间,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十多亿人摆脱物质短缺,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享有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利。这既是中国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也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更是中国对世界发展的重要贡献。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只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继续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24]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说:“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25]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26]¹⁶⁻¹⁷“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6]¹⁵他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26]1-2}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27]。这些论述深刻表达了我们党始终坚持发展是为了人民的价值追求,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

五、结语

重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中共百年历史,展望中国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中共十九大确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百年大党百年历程、百年奋斗经验的深刻总结、深刻提炼、深刻升华和深刻发展。

从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可

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的历史,人心向背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把人民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人民群众才会把领导干部当成自己的亲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之一。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对群众路线不断进行丰富和发展,在新的实践中创造新的经验,再把新的经验转化为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升华,并在党章上确定下来。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指出:“党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群众,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中共十四大通过的党章对群众路线又做了新的表述:“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从中共十四大通过的党章到中共十九大通过的党章,对群众路线的科学、系统、全面的表述都被延续下来。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百年华诞,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到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最彻底地体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毛泽东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1031}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13]257}他要求全党要始

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检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否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试金石”和基本标准。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将“三个代表”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胡锦涛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并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落实到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去^[28]。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随着历史前进和新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生机勃勃,与时俱进,永葆青春与活力。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革命战争就不能取得胜利;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壮大;没有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能取得辉煌成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搞革命需要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搞建设需要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搞改革开放需要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需要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百年

历史还证明,群众路线是我们党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当下,中国共产党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领导中国人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从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到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独有的实践担当、理论担当与历史担当。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8-05-04)[2021-03-12].<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9952257497>.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7.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02.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5-256.

- [6] 习近平.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3-06-25(01).
- [7] 在湖南考察,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做好这几件事[N]. 人民日报, 2020-09-20(02).
- [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9] 刘少奇. 刘少奇选集: 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10] 薛庆超. 群众路线: 从萌芽到实践[M]. 郑州: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23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1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38-1439.
- [1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9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72.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1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349-350.
- [17]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8] 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24-25.
- [19]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N]. 人民日报, 2012-11-16(01).
- [20] 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N]. 人民日报, 2012-11-30(01).
- [2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22]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 2013-12-25(01).
- [23]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 中国人民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N]. 人民日报, 2017-10-26(01).
- [24]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3-12-27(01).
- [25] 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N]. 人民日报, 2014-02-09(01).
- [2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27]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N]. 人民日报, 2021-02-21(01).
- [28] 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坚持人民至上 不断造福人民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N]. 人民日报, 2020-05-23(01).



引用格式:詹秀娟,王鐸.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正义指向[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3):18-23.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3.002

文章编号:1009-3729(2021)03-0018-06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正义指向

The justice orientation in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詹秀娟¹,王鐸²

ZHAN Xiujuan¹, WANG Tan²

1. 安徽大学 哲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2.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作为思考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蕴着明确的正义指向。通过深刻地回答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以及怎样建设生态文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展现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正义诉求;论证了在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个体之间平等分配环境权益与负担的要求,力求满足人们共同的生态环境需求。而在对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深刻回答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在环境方面正义的实现,而且还持续不断地推进国际、代际实现环境正义。广泛全面地推进环境正义的实现,共享优美的生态环境,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为根本的价值旨趣。

关键词:

生态文明;
和谐共生;
环境正义;
生态环境

[收稿日期]2020-12-25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AHSKQ2016D123)

[作者简介]詹秀娟(1983—),女,江西省九江市人,安徽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道德哲学与应用伦理学;王鐸(1996—),男,河南省西峡县人,郑州轻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基于对工业文明的客观审视,站在人类文明演进的总体趋势和基本方向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的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全面、科学完整地回答了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全貌的根本性问题^[1],深刻地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以及怎样建设生态文明这些重大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具有划时代意义,不仅为我国的生态治理、环境保护提供了理论指南,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也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明确的正义指向。本文拟从出发点、制度体系、目标三个层面来揭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蕴含的正义指向,以深化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以期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提供理论参考。

一、出发点蕴含的正义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态文明思想,有两个重要的出发点,即深刻的历史教训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后的迫切要求,这两个出发点通过对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的深刻回答,表达出对正义的价值追求。

第一个出发点要求我们要以深刻的历史教训为镜鉴。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人类也因此获得了惨痛的教训。20世纪的世界八大公害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很多人为此失去了性命。意大利人把阿尔卑斯山北坡的枞树林砍光用尽后,也把他们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山泉都枯竭了,并且雨季又有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最后使人们深受其害。习近平总书记比喻说,这如同借钱做生意,钱是赚来了,但欠了很多环境债,同时还要赔上高额的利息。所以,“生态环境方面欠的债迟还不如早还,早还早主

动”^{[2][141]}。你善待环境,环境就会对你友好;你污染环境,你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对此,恩格斯早就深刻地给出过警告。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行不通了,我们不要得意于眼前对自然界的胜利与征服,因为或许人类终有一天承受不住自然界报复的代价,因为人类用科学证明整体环境问题的危险性的时刻存在滞后性,一旦那个危险时刻来临,人类将极度无措;我们应该转变思路,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界的规律,善待环境,改变对待自然的态度与立场,正确认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创造一种区别于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3][360]}自然不仅仅是人类获取资源的工具,本质上,自然是人类得以存在的根本,或者自然更应该被视作根源,而不是作为一种资源。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相存相依、休戚与共,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对待自然,方才能更好地保存自身。“人靠自然界生活”^[4],而且人也只能靠自然界生活,没有任何其他选择,所以说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我们只能守护好它,就像它对生命的默默的守护一样,我们虽不会察觉,但是一旦它变脸了,我们就将遭受致命的威胁。生态环境决定着民族的存亡,“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5][186]}。所以,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得以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我们唯有基于自然,不断提升自己对自然的认识,与自然建立和谐的关系,尽力保存、修复自然生态,才能更好地发展自身,创造璀璨的文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体现了生态文明的正义指向。工业时代对经济无限增长的追求,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人类一改过去对自然的依赖,无度地支配自然;自然作为人类满足自己欲求的工具,不断地透支,以致远远超过了其自身的承受力,这对于自然而言是极度

不对等的、不公平的,即表现为生态上的非正义。生态文明正视了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整体关系,遵循了一种生态正义,表达了“如何建构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关系”,关注了“人类之外存在物的权利与价值”^[6]。人与自然同为生命共同体,共存共荣,自然供养人的生活,人在能动的创造活动中尊重自然的运行规律与价值,这种和谐关系体现了对双方的正义,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种际正义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它开启了区别于工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

第二个出发点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之后,人们的需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它对我们国家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必须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是突出的短板,人们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是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表现,如何为人们提供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优质的生态产品成为国家亟须面对的问题,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势在必行。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群众对新鲜的空气、清澈的水质、清洁的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转变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推动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方式,同时满足人们对生活富裕与生态良好的需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民生问题,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把它解决好。所以,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3]359}。

把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问题来解决,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正义取向。公平正义是人类文明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价值,其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文化与制度都影响着人们对生活中的正义问题的思考、判断与建构,因此正义的形态存在明显的差异。生态环境作为关系民生

的重大社会问题,显示了其旨在建构的是人际的关于环境益品的正义。“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8]4}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最为基础的条件,因此,正义的社会应该关注满足人们生存的最基本的益品的分配问题;生态环境是最公平、可以惠及每个人的公共产品,是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必需品,生态文明建构的环境正义也是最为基本的正义。过去生产力不够先进,人们更重视经济;现在生产发展了,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关注了,环境问题以及环境恶物与善物的不公平分配都极有可能引发群体性的冲突。“人心是最大的政治”^{[3]359},既然现在我们具备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与能力,那么我们就要顺应民意,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积极地解决好生态环境问题,积极地回应人民心中所想、所盼、所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环境恶物与善物的公平分配,推进人际的环境正义,满足每个人对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

二、制度体系蕴含的正义指向

文明的趋势、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催生了对生态文明的关注与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需要方法指导,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深刻回答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持续推进,需要制度的保障,正义的价值取向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应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人们不断地反思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传达正确的观念与认知,呼吁变革传统的发展方式与行动方式。但这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完成的,可能需要数代人的努力与坚守,才能在历史的潜移默化中逐渐改变人们的认知与观念,并在无形中慢慢转化为人们普遍认同、自觉自为的行动。“像所有的认知过程一样,人们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认识,也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自然自发到自觉自为的过程。”^{[2]13}经过不断反思,我们意识到了只考虑经济不考

虑环境是行不通的,意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但是还没有普遍地形成既考虑自己的小环境也考虑他人的环境的自觉意识;更没有普遍地意识到生态问题的无边界性,站在全人类的高度自觉地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或许有些思想先行者已经意识到了后面两个阶段,但它还没有被全社会普遍自觉地意识到;或许有些人在观念上认可它,但也并不意味着会在行动中落实,因为思想观念离现实行动还有一定的距离,现实的漏洞与诱惑可能都会使人偏离自己的观念,做出有违初衷的行动。所以,为了尽快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从第一个阶段上升到第二个、第三个阶段,缩短从自然自发到自觉自为的过程,我们应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使人们能够认同这些观念。而确保人们对正确价值取向的坚定、推进人们把观念转化为行动,则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予以保障,以此规避现实的漏洞带来的风险,抵制现实的便利带来的短浅利益的诱惑。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建立在人们自觉的环保意识的基础之上,而且在环保问题上,不能越雷池半步;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人们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而且还要严格的制度保障。我国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与体制不完善、法治不完备有着很深的关联,所以建设生态文明就必须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体制机制问题。因为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9]。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要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生态文明的出发点对正义的价值追求,从逻辑上论证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正义取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是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建立的,建构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体现了人

与自然之间的正义;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公平地分配环境善物与环境恶物,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正义。我国生态文明制度蕴含的正义指向,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更好地保障了正义的推进与实现。在全民还没有形成普遍的自觉的生态观念和环保行动的时期,为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依靠严密的法治;要保证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现实中具体落实,就必须建设一支生态环境保护铁军,强化制度执行,让生态法治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但是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与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因此,为树立制度的刚性与权威,保证生态文明建设决策能够尽快落地生根见效,就必须严格干部考核问责。“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8]¹⁰⁰终身追责制从根本上抑制了盲目决策行为,破除了有些干部为了任期的更好政绩对环境进行潜在破坏的怪圈,使得相关决策人能更谨慎地做出合理的有利于生态发展的决策;促进了相关工作人员对环保工作的监管、督查的严格执行、落实,对破坏环境的行为严加惩处,绝不手软。领导干部的责任制既是正义取向的表现,也是保障正义能够实现的必备条件,它通过真抓严管的方式确保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推行,以实现正义的价值。

另一方面,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体现了对区域环境正义的价值追求。所谓区域环境正义,是某一国家或地区内不同区域之间,在环境资源享用权益上的公平分配 and 环境保护义务上的公平划分,即两者之间保持比例协调、对等、相称的状态^[10]。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本意是为了人们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人类更加文明,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在处理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悖论,产生了

严重的不对等:不同的个体、群体、区域在环境利益与环境负担之间严重的不对等,这些不对等加重了部分人群的环境负担,削弱了他们的生存能力。通过资源的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坚持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解决邻避难题,让不同区域的个体、同一区域的不同群体在公共环境资源的分配方面能够有效地维护、获得自己应得的合法权益。有些环境资源作为公共产品,受制于外部性的特性,环境负担往往难以内部化,生态的有偿使用与补偿制度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作为公共资源,在市场机制下,环境是有偿使用的,而且一旦对公共环境和他人正常的环境权益造成了损失,就必须承担责任,进行相应的赔偿,损失方可以获得对等的补偿。补偿相应地也是一种回报,体现了对生态环境权益受损的区域、群体、个体的环境权的保护,体现了正义的要求。生态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平衡了不同区域的资源情况,调和了不同群体、不同个体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利益冲突与矛盾,实现了在他们之间对环境权益和环境责任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因而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人际的环境正义的重要体现。

三、目标蕴含的正义指向

围绕着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地对问题进行深入求解,深刻解答了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以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要达成的最终目标。建设生态文明的两个起点分别从逻辑上设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两大目标:通过人对自然的照看,尊重、顺应、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发展;尊重个体平等的环境权,从个体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出发,为人们提供优美的生态环境,平衡环境权益和环境负担,公平分配环境资源。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要求;对个人环境权的尊重与保护,对人与人之间环境权益与义务的合理分配,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在环

境方面的正义要求。生态文明建设以这两大目标为基座,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不断扩展它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与代际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拓宽了正义在环境方面的对象与范围,实现了更广泛更全面的正义。

从国际方面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8]127},表达了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在国际上实现环境方面的正义。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现当代环境问题不再囿于某个地域或国家,而是全球必须去面对的问题,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唯有同舟共济才能应对全球环境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承担同等的国际责任,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虑,必须权责共担,践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8]132},才能体现正义的要求。从历史发展来看,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率先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却是以消耗大量的自然环境资源为代价的,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在发展中支取了发展中国家用来发展的资源,并把污染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发展的外部性买单,并丧失了享有应有的自然资源的机会。所以,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从现实发展来看,全球的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受到了发达国家的盘剥,而且发达国家的发展需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环境负担也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为此,发达国家必须为自己的交易方式和现实需求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承担环境责任方面是共同的,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方面担负的历史责任不同,现实的发展需求与能力也存在差异,所以它们所承担的实际责任是有差异的。这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不用为全球的环境问题承担责任,而是说发展中国家承担的责任要符合历史,符合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与要求;而

发达国家也要主动担负起对发展中国家的补偿责任,从而体现出国际上的环境正义,推动地球美好家园的建设。

从代际方面来看,持之以恒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11],展现了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了代际环境正义的实现。生态环境是人类得以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我们在创造美好生活时要发展,但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当代的发展不能断了子孙发展的后路,我们不能因为现行在场的优势,损害甚至剥夺了子孙后代享有优美生态环境的权利,这对还未到场但终究会到场的子孙后代是极为不公平的,也不符合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的民心工程、立在千秋的德政工程”^{[5]187},它不仅充分考虑当代人生存发展的需求,而且内在地要求考虑后代的生存发展的需求。所以,生态文明不允许干吃祖宗饭砸子孙碗的事,它应立足于长远的整体观,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坚守历史担当,是一种稳态的可持续性的文明;它要求公平地考虑并权衡当代人与未来人在生态环境利益方面的分配,并主动自觉地规范当代人的行为,通过代代传承与接力,为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的生态环境,推进代际环境正义的实现。

四、结语

综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正义指向既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涉及人与人的关系;既涵盖了国内区域、群体、个体的关系,也涵盖了国与国的关系;既包含了当代人之间的关系,也包含了代际关系,在环境方面正义的对象与边界不断地扩展、延伸,是人类文明对正义思考的集中表达。人类文明是整体性文明,生态文明努力达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际、代际的共生、共荣、共存的和谐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受制于诸多因素,因而也表现出一定的脆弱

性,不仅需要 we 自觉地涵养生态文明观,自觉地参与,摒弃偏见,积极地保护生态环境;也需要我们进行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为其保驾护航。当国家的治理能力达到一定程度,人类的自我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实现美好生活时,人们将愈加自觉地、不遗余力地遵守制度,捍卫正义的价值。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期望,在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正义指向会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人们会更加自觉地推进其正义价值的不断实现。

参考文献:

- [1] 潘家华. 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27.
- [2]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 [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61.
- [5] 习近平.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 [6] 王雨辰. 论生态文明的本质与价值归宿[J]. 东岳论丛, 2020(8): 31.
- [7]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1.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 [9] 李捷. 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问答[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 169.
- [10] 龚天平, 饶婷. 习近平生态治理观的环境正义意蕴[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1): 9.
- [1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212.



引用格式:刘国云,李祎.突发公共事件中自媒体风险传播的伦理反思[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3):24-32.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3.003

文章编号:1009-3729(2021)03-0024-09

突发公共事件中自媒体风险传播的伦理反思

Ethical reflections on risk communication of we-media in public emergencies

刘国云¹,李祎²

LIU Guoyun¹,LI Yi²

1. 四川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
2.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自媒体已成为突发公共事件中风险传播的重要渠道。作为公众权益的自主表达者、风险世界的伦理刻画者和风险社会的道德维系者,自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风险传播规律也具有伦理内涵。自媒体的风险感知主要依靠自我保护式的情绪体验,传播行为则是面向外在伦理关系的,其实现基础是成员之间的道义默契,这种义务是以伦理共同体作为保障的。自由环境、自我视角与自利取向在自律不足的条件下,会导致突发公共事件中传播失真、失序和失德风险的诱发因素,可分别从他律机制、自律意识和自治能力上强化治理应对,以优化自媒体在公共领域的伦理表现。

关键词:
突发公共事件;
风险;
自媒体;
伦理

[收稿日期]2020-12-2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XZX016)

[作者简介]刘国云(1979—),男,湖南省湘潭市人,四川师范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应用伦理学;李祎(2000—),女,河南省平舆县人,郑州轻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危险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其与公众利益攸关,并具有突发性、风险性等属性,隐含结构性的危险与不安。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公众普遍有接收信息与表达需要的心理与行为。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会改变事件所产生的具体影响,风险信息的传播本身也存在风险,可能产生负效应。因此,突发公共事件与信息传播具有密切联系,信息传播蕴含风险因素,影响突发公共事件的走向。

进入 21 世纪之后,网络与媒体技术使媒介个人化,自媒体已成为普通民众传播信息的重要渠道。自媒体风险感知与传播行为的时代新特征,使其成了风险感知与信息传播中的关键要素,并就此改变了传统风险感知与行为反应的规律,其伦理效应也逐渐显现。鉴于此,有必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自媒体风险传播的伦理角色、规律、风险及其治理进行反思与重构,以优化自媒体在公共领域的伦理表现,推动突发公共事件有效应对。

一、自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风险传播中的伦理角色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风险不仅是客观的,而且其发展与人类对危险的认知和行为密切相关。风险能以信息的形式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与传播,同时也可以被量化与评估,风险状况以信息形式被媒体传播就是风险传播。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的风险信息传播是公众了解公共事件或公共风险的重要渠道,大部分公众的风险经验来自媒体的详尽报道。风险传播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情境因素,其中,传媒报道是最为重要的^[1]。媒体的风险信息是民众风险感知的预设框架,它会影响人们接受、诠释所处的风险环境。媒体一方面参与到社会风险

定义的架构中,另一方面主导社会风险信息传播的进程。

在自媒体时代,自媒体也成了公共事件风险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信息传播不再完全由大众传媒所垄断。自媒体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可以使普通民众借助融合的数字科技成为全球信息网络的节点,依托微信等通信软件、视频与短视频、微博、博客、直播、论坛等新媒体平台提供见闻并分享观点,通过网络向全世界传播自己所记录的个人化的事实与价值。

自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承担着两个主要的风险信息传播功能:一是风险表达与呈现的来源;二是风险传播的渠道。作为风险传播渠道,自媒体具有不同于大众媒体的特点,已成为公众获得风险信息的重要来源。以前,大众传媒提供信息源,再由公众接收信息或进行信息的再传播。自媒体虽为微小媒体,但其传播一旦引起风险感知共振,可引发“蝴蝶效应”。单个自媒体传播的受众虽极其有限,但其可通过快速复制来传播信息。诸多公共事件信息是通过自媒体以所谓“病毒式”模式传播的,之后再反哺大众传媒,成为大众传媒的信息来源。今天,人们的风险信息更多是由大众传媒获得的,而非直接由人际分享获得,自媒体则使这种风险信息的交流分散化了。

作为风险传播的主体,自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的伦理角色:

其一,公众权益的自主表达者。媒介曾被视作人身体的延伸,而当代自媒体的发展则使人出现“身体的媒介化”趋向,即人被媒体化、人与媒体重新融合,人即媒体。这种重新融合是“人-媒”关系的否定之否定,人作为媒介主体,其传播能力已经实现了对传统媒体的超越。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作为媒体也进入伦理关系中,他首先是作为自身权益的自主表达者的

身份发声的,尤其是在突发公共事件的风险之下,人的生存、发展的权益危机是自媒体重要的表达内容,形成自下而上、由散而聚的权益表达。

其二,风险世界的伦理刻画者。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用“洞穴隐喻”描述经火光投射到洞壁上的阴影,将其视为禁锢于洞穴内的人所能接收到的世界图景。李普曼则指出,公众所看到的客观环境实际上是媒介所建构的“拟态环境”。但是传统媒介对议题顺序安排的垄断被自媒体的关注热度逐渐打破,风险信息可以随着突发公共事件进展而在自媒体中即时形成,在人们想要了解的风险和他们关心的问题,它提供迅速与持续的反馈,增加了媒介渠道,使信息来源迅速扩大。因此,所有公众可通过自我视角的观察与记录呈现出风险世界的伦理关系,参与到风险定义机制之中,汇聚风险话语,建构社会的风险景观。分散的视域有时会拼合成更完整与更真实的伦理视界,影响公众判断风险信息与选择道德行为。

其三,风险社会的道德维系者。当今时代常被学者以“风险社会”来描述,日益脆弱的环境、不负责任的生产生活方式等都以风险提升作为代价。社会舆论是道德的三种主要维系方式之一,舆论表达了公众以道德规范作为标准对于所处社会中善恶事件的道德判断与评价。自媒体在风险沟通中对突发事件的伦理忧虑是在风险社会中规避风险、抑恶扬善的柔性保障,是“兼善天下”的传统美德的时代传承,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道德发展水平的现实表现。

自媒体的伦理角色是与其在当今伦理关系中的特殊作用相关联的,但是又因为自媒体与人的融合,其在风险传播中的现实表现与规律是由现实的人所决定的,因此,需要探究在当前环境下“人-媒”之间独特互动所造就的风险传播的伦理效应。

二、突发公共事件中自媒体风险传播规律的伦理内涵

突发公共事件中自媒体的风险传播规律体现为:首先,个人化自媒体的风险感知主要依靠情绪体验在危机中的自我保护式的唤醒。其次,风险感知之后的传播行为是指向外在伦理关系的,其实现乃基于伦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道义默契。而突发公共事件是超越个人效能、需要共同施为的特殊传播场景。

1. 传播始点:情绪感知

面对突发公共事件,风险感知是人传播信息的前置环节。风险感知是指对风险的态度和判断。风险不是单纯的客观状态,不仅具有客观维度,也标志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主体参照生活经验中的因果联系在特定时空体验下的产物,公众会在经验回忆与未来想象中估算风险,并在其观念中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与危害程度进行评估。区别于传统媒体,自媒体是个体化的媒体,其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风险感知体现出个体化的特点。

风险感知理论认为,人类理解风险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分析系统,它依赖智识使用逻辑与规则推算危险概率与程度,相对较慢与费力;二是体验系统,它是直观、迅速且自动的^[2]。体验系统使人类能够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生存,时至今日仍然是应对风险的最自然的方式,其依赖图像与联想唤醒记忆。当身处特定场景或是某些线索与特定场景关联,人们会形成直观的对于当前场景是否安全的判断。自媒体的风险感知大部分依靠体验系统,主要通过情绪来运行。

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公众会出现焦虑、恐惧、担忧、愤怒等各种情绪反应,自媒体会直接将这些情绪表达出来以引起共鸣与支持。谣言容易在冲突、危机与灾难中产生与流传,主要是

这些事件使人们普遍产生了焦虑,从而唤醒了情绪。伯格进一步指出,情绪唤醒引起面对公共事件的信息分享与控制行为的产生^[3]。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信息传递对于行为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积极情感也能增强自媒体传播的动机。生理唤醒的特征是自主神经系统的激活,这种兴奋状态为共享提供动力。心理唤醒之后会加速人们分享信息的行为。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面对已知风险信息,自媒体主要是从两个维度来对风险加以判断的。风险感知主要由两个维度构成,一是风险广度,二是风险强度,即已知的外在风险是否已波及自身和风险是否可控。是否可控对于自媒体来说,由它既有的经验判断,或是由它所处的环境的共同反应来推断。根据所感知风险的广度与强度,自媒体会产生相应的情绪与应对行为模式。依据面对风险的两类维度,可构建自媒体风险感知与传播行为理论模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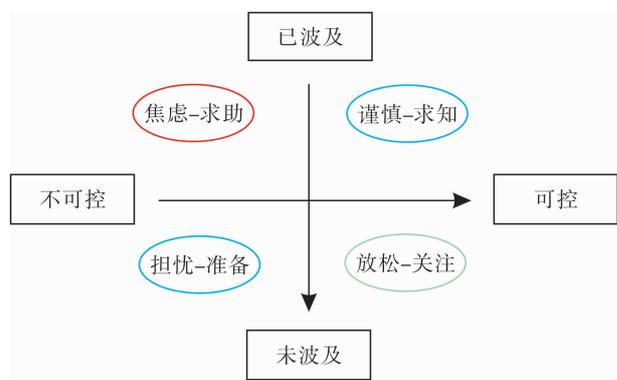


图1 自媒体风险感知与传播行为理论模型

2. 传播目标:道义支持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自媒体对于风险的感知与传播行为都是指向外界的,如果他人和社会对相关信息毫不关注,也不存在任何义务,那么信息传播就没有意义,信息就无法传播。突发公共事件中自媒体传播通过共享与互动,在反馈中寻求道义上的认同。如果产生道德上的共鸣反应,则能确认风险感知。

自媒体可以展示自身的状态,以获得外界对于自己的关注与支持。基于自身立场,自媒体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递与其个体利益的保护与获得是相伴随的。自媒体的风险感知与传播受其利益变化感知驱动,或者自媒体尚未被波及,但出于道义上的责任,对受突发公共事件影响的人所处状态进行传播,以唤起社会的关注,改变他们的现实境遇。

从图1可以看到,当传播主体处于已被突发公共事件的风险波及的状态时,无论这种风险是否可控,此时的传播行为都是以向外求助为诉求的,而这种求助之所以能成立,是以他者和社会对个体的道义支持为默认义务的。向外发送的诉求对象并不一定有法定义务提供知识或者实质的帮助,而是基于在伦理的社会之中成员彼此所担负的道义上的义务和责任。

突发公共事件中自媒体的风险传播常常发生在相对剥夺感的状态之下。人的生活满意度是以其现实或认知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的标准作为参照来评估的。如果存在相对于其他人的缺失感,或者自己的生活水平比可感知的其他人差,那么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而这种剥夺感是有道义上的正当性的。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人们通过媒介网络不断地获取自我与他人的状态并加以比较,当受事件波及的群体产生了某种损失后,会加剧由于相对剥夺而出现的焦虑、恐惧与愤怒等情绪,这种情绪会激发他们向外传播这种事实与情绪。

3. 传播保障:伦理共同体

面对突发公共事件,作为自媒体的个人是事件经验产生与风险传播的最小主体,当他相信可以通过行动产生预期效果并规避不良后果时会具备行动力,也就是感知到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效能。

由自媒体传播目标可知,传播对象与诉求都是指向外界的,尤其是在相互之间存在道德

义务连接的伦理共同体之中,风险传播的效果是更显著的。当共同体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就会产生共同的效能与施为。“共同的效能”是指大众通过分享社群的公共信任感与社会凝聚力,从而对于共同努力实现所在社群共同目标的集体信念与预期。共同效能可以促进共同行动的展开。班杜拉的研究表明,人们共同效能的感知程度越高,共同性行动意向越高,抗逆的斗志也会越强^[4]。共同体成员共享的效能会影响他们通过共同体行为实现共同体目标的投入程度。

突发公共事件超越了个人应对的经验范围,就会削弱个人的感知效能。普遍化与细微化的信息传播可以产生共同的效能感,共同的效能感的根源在于成员的思想。共同体会基于人们的共同信念协调行动。共同体效能中的共同信念会影响人们通过共同体行动探求的未来状态、资源状态、共同体参与程度、顺境时的持久力和逆境中的脆弱度。在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与舆论发展过程中,群体特征与个体需求都会影响共同体效能水准,对社会不同群体的舆论信息走向产生影响。突发公共事件属于超越个人效能而必须诉诸共同体效能的场景,只有通过相互合作才能化解风险。

自媒体在效能的基础上展开风险应对的施为,即应对突发事件的自我保护、自我适应和自我发展。但自媒体在风险环境中的传播施为应当体现社会集合与媒介自我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共同体通过自我系统的机制起作用,从而产生行为效果。在施为过程中,自媒体的自我系统是外部影响的表现渠道。通过行使自我的媒体影响力,自媒体施为可以在社会系统中积极主动地产生作用,而不仅仅是被动地起作用。

三、突发公共事件中自媒体传播的伦理风险

突发公共事件中自媒体的风险信息传播速

度快、范围大、流向多,风险感知渠道相比传统媒体具有显著差异。这种风险传播的变化自身也构成一种伦理风险。伦理风险是指自媒体传播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伦理关系方面产生不确定事件或条件,尤指其产生的不确定的伦理负效应^[5]。在技术自由的环境下,从自我视角出发,以自利为主要取向的风险信息感知与传播,在逾越治理机制、缺乏自我约束时,过度的自由、自我与自利将是诱发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失真、失序与失德风险的重要因素,进而干扰公众正确的形势评估与行为选择,延误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及时有效的处理,导致突发公共事件的不可确定与难以控制。

1. 风险信息失真

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自媒体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并利用自媒体获得信息传播的主动性。人们借助自媒体可以突破身份、地位、时间、地点等限制更加自由地言说。自媒体使社会的媒介近用权下移,并史无前例全面地向普通民众开放。所以,自媒体为信息自由提供保障,意味着最低限度的社会干预与组织限制。

但是,自媒体传播者大多没有受过传播风险、传播伦理等素养训练,在传播流程上往往是先出版后过滤,“把关人”设置弱化,态度表达相对随意,因此自媒体传播的公共信息中事实是非难分、价值良莠不齐,一旦信息失真,人们就会错误地评估形势,并做出错误的行为选择。自媒体时代人人皆有麦克风,但众声喧哗之中也潜藏着风险:真实有效的信息易被干扰或被覆盖。

自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到事件全景真相完全被呈现之前,往往谣言四起,因为作为信息传送者的自媒体在网络环境中是匿名的,匿名效应可使道德自律机制部分或完全失效,自媒体动机各异:或无意误信,或有意欺骗,但都对维护传播真实性缺乏意愿。同时,自媒体播发海量

信息,甄别信息也异常困难,面对迷离真相缺乏考证事实的能力,人们会放弃对内容的真实性与影响的整体性责任,从而导致自媒体空间谣言泛滥,自媒体传播的主要诉求从事实澄清转变为情绪宣泄。部分自媒体意见领袖通过群发设置误导舆论关注,通过虚假报道或片面诠释有目的地煽动公众情绪,使公众产生无意识的失范行为模仿。

在当今自媒体时代的突发公共事件中,虚假信息泛滥与传播主体泛化相伴相随,处理谣言与误信是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过程中的世界性难题。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常有特定资源将匮乏或涨价的谣言,引发公众抢购甚至哄抢这些物品,进一步推高风险的影响。谣言与误信将扰乱事件应对进程,削弱相关治理机构的行动力,使民众难以获得真实信息,最终导致突发公共事件的失控风险。

2. 风险传播失序

大众媒介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风险舆论具有锚定作用,公众的意见往往是基于大众媒介所报道的事实而提出来的。自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基于自我视角的风险信息有可能是颠倒与扭曲的,从而影响风险应对的秩序。无论是大众传媒还是自媒体,它们都不是突发公共事件的研究与负责机构,无论其参与程度如何,都很难就描述风险达成一致意见。自媒体最大限度地突显了平民与个体的力量,然而,自媒体对健康和环境风险的报道也往往过于简单、夸张和错误频出。

在自媒体空间中,获得更多表达自由的个体行动者的风险视域是交错不定的,自媒体表达的是基于自我视角的事实认知与价值认定。同时,自媒体的自我视角又常常是情绪、情感等自我感受的记录与表达,通过情绪同感来达到对受众的吸引。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相对单一且比较匮乏;在自媒体时代,面对突发公共事

件,自媒体及其“粉丝型受众”容易在“信息茧房”中获得信息支持与情感认同,一部分群体在用户生成内容平台上接收自己所“选择”的群体的信息,并让同样的情感被共振。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了公共信息的若干闭塞空间。而自我视角的自媒体产生群体“狂欢”效应,诱发舆论的群体极化。

诸平台的大流量视频上传者或粉丝多的认证博主拥有兴趣相投的粉丝群,形成了具有特殊文化背景的亚文化圈,圈子拥有共同的爱好、相似的观点,甚至仅有圈内人才能看懂的语言符号,负面信息可能在特定群体中被放大,甚至引起群体无意识的舆论“狂欢”效应,他们在特定媒体信息的交换下组织活动,如美国部分青少年群体的“新冠派对”活动,竟然将疾病当作一种荣誉而竞相染病。显然,其群体内部流动的疫情信息是与科学背道而驰的。

而在群体之外,信息与态度却又往往呈现抵消效应。信息良莠混杂、真假难辨,自媒体可能将基于自身立场的完全对立的事实或观点带到大众面前,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自媒体信息必定层出不穷,但是有效信息或真实信息可能被冗余的无价值信息所覆盖,甚至可能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突发公共事件攸关全局的高价值信息被隐藏于海量的自媒体信息中而使风险事件的焦点被模糊或被更改。例如,2020年2月英语自媒体中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关联主题之一是用比较熟知的冠状病毒同名啤酒(Corona)开玩笑,制作大量表情包,传达了自身未感知到流行疾病或者感知到了但认为影响可控的情况下对于疫情的轻视态度。一旦这种风险感知偏差通过自媒体传播,势必会加剧突发公共事件风险的危害。

3. 风险传播失德

自媒体不仅承担信息传播角色,也常用作商业概念,是保障与获得自我利益的诉求渠道。

当自媒体作为商业从业者,在他最大限度实现增进自身效用的目的却必须以违反道德、损害社会与他人利益为条件时,就会产生道德风险,这源于自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传播活动过程中各种机制条件的差异,这些条件包括相关利益主体信息不对称、传播代理关系复杂程度、传播代理过程的监督制衡机制等。例如,相关利益主体对于公共事件的信息不对称是诱发道德风险、引起利益转换的关键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当监督机制松散、制衡机制不力时,道德风险就必然地会从可能变为现实。

风险信息不对称,自媒体利用公众寻求信息与帮助的迫切性,可以将特定产品或服务植入信息发布中,从而利用信息传播获得产品增值。自媒体在风险传播中会将利益作为内容选择的重要依据,出于流量的考虑,风险传播中会过多地关注灾难性和暴力性的灾害,这会使得人们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频率产生错误印象与判断。例如,自媒体选择素材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标准是灾害的惨烈程度,而不是灾民的受害程度。被广泛报道的事件更容易得到社会的额外关注,而那些处在灾害之中需要关怀的人的需求信息可能更难以通过自媒体到达他们的受众,对于同样处于危机中的弱势群体来说,被关注与报道的标准是缺失正义的。

当内容取舍的获利模式固定化之后,风险传播本身就是风险。2015年以来,直播平台快速发展,催生了网红经济。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自媒体主播者也可以通过事件直播引来观众关注并“送礼”消费。所以,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自媒体会基于自利的需要播发信息。但由于自媒体直播没有门槛,获得流量并非易事,恶搞、媚俗甚至淫秽就成为获得关注度的捷径,越是突破底线,越能哗众取宠,进而越能谋取更诱人的经济利益。如若以商业利益作为主导甚至唯一取向,不顾传播的社会效应,欠缺责任担

当,势必难以有效应对风险。

四、突发公共事件中自媒体伦理风险的治理

根据突发公共事件中自媒体风险信息传播的伦理角色、规律和风险,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自媒体的传播风险加以调整,在他律机制、自律意识和自治能力上形成结构性的治理应对。

1. 完善传播规范,健全他律机制

其一,专业组织应进一步积极融入自媒体,以权威信息引导风险舆论,成为自媒体的意见领袖,营造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自媒体是新的社会赋权的媒介体系,而意见领袖是这个自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权较弱的群体通过自媒体可获得新的表达渠道,甚至倒逼官方和民间的舆论场,所谓“事实”是提供自媒体所遮蔽的现实,而“价值”则体现道德的合理性。以使自媒体中正确与科学的风险信息与舆论不至于螺旋式地沉默下去。但是在自媒体时代,公共媒体不再享有控制信息传播的权力,其信息权力实际上和个人媒介并无本质差异,所以对于公共媒体来说,要加强治理信息的有效传播,无法依靠强制力,而应充分引导自媒体传播并避免公共媒体陷入公信力下降的“塔西佗陷阱”,进一步推动公共媒体多平台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6]。公众通过自媒体从技术上打通了信息使用权的障碍,但是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关键信息的清晰与及时传递是风险信息有效流通的瓶颈,事实证明这些信息的发布越是制度化和常态化,自媒体也就越是会在更高效能水平上运转。

其二,进一步完善自媒体规范,确保自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有效运转。应根据自媒体所引起的风险问题尽快形成较完整的自媒体规范,具体包括自媒体的传播制度和自律公约。自媒

体的规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应具有简练、清晰、可操作的特点。自媒体所依赖的网络环境承载着新型的人伦关系,参与者在场已经不再是伦理关系中的关键因素。通过自媒体交往的虚拟行动者应遵守明确的道德规范,有效避免虚假或者错误信息的生成。

其三,应通过实施自媒体契约,保障自媒体与社群的共同利益。个体在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活动中以自我利益为追求目标,利益对立时,容易陷入“丛林状态”,会对每个个体的权利诉求形成难以解决的矛盾。因此,为了实现人们之间的真正互利,所有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都应当置于道德约束下,以避免对公共利益的摧毁。通过契约,自媒体共同知晓与明确遵守相互之间的道德义务,从而可以有效保障自媒体与社群的共同利益。相关管理规定或自律公约已有实施,现实中规定与公约文本较长、版本各异,自媒体注册平台服务时往往不用阅读即可进入下一环节。因此,应根据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加以修正,让自媒体在发布新闻之前可以清晰地、简洁地了解传播义务与权利,推动统一的自媒体行为规范的编撰与落实,使每个公民都能正确行使传播权利,履行传播义务。

2. 落实风险责任,培养自律意识

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公众有了解真相、掌握局势的迫切愿望,自媒体虽然保障了信息的多元化,但是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快速、真实、全面而权威的信息是社会“化危为机”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对自媒体传播风险的有效规避。

其一,培育应对风险的责任伦理意识。突发公共事件中风险信息的不确定性高,责任就更需要成为普遍性的伦理原则。同时由于事件发展结果的不确定性,风险责任是“前瞻式”的,人需要增强对行为后果的自觉。责任伦理,即确认与服从自身的社会任务,并将完成职责与任务作为基本道德原则,进而形成对所从事

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它要求不能仅站在自我中心考虑事件对自身的影响,而是需要以对社会甚至人类的观照作为行为依据。自媒体并不是专职工作,风险信息的传播可能只是被“随手一发”并未被认真对待,所以培育自媒体责任伦理的要务是让担当媒体角色的公众了解自己的社会责任与影响,以形成对风险传播行为的敬畏感与责任感。

其二,设置传播的公私边界,明晰传播的公私属性。实体领域与传统媒体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上的边界是清晰的,而自媒体传播横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打破了公私领域明晰的界限。自媒体公私领域载体和平台相同,在使用软件时,容易忽略传播的私人界面与公共界面的区别。所以,系统平台有必要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作醒目的区分显示,让自媒体使用者获得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提醒,这样可让自媒体向外传递信息时针对公私领域选择合适的话语方式与交往方式,而不至于逾越公共生活规范与私人生活规范的界限。同时,应细化界面技术,对私人领域交流采用传播限制手段,形成向公共传播的壁垒。

其三,通过署名强化自律意识。媒体的称号或名称是彰显其特色与责任的标志,针对自媒体道德问题产生的匿名性症结,自媒体系统和网络平台应形成自身的稳定的署名体系。自媒体制作的视频如果能形成更加清晰的责任人意识和行为,而不是像现在很多作品被反复传播根本难以追溯其源头,那么自媒体对其作品将平添作者的责任感,从而按社会规范自行调整传播行为。

3. 提升媒介素养,强化自治能力

现代治理被认为是由“参与者形成的自主自治的网络”^[7],其结构与秩序的建构不是由外部强加的。就自媒体来说,风险信息庞杂,集中控制信息节点的内容、方式和时间都是困难

的。因此,由上而下的管制在自媒体治理中并不符合治理与技术发展趋势,而是需要广泛动员、夯实基础、自下而上地形成风险应对的治理结构。

其一,明确治理方向。在风险治理中,自媒体不再是消极的客体,自媒体与治理的发展趋势相互契合,凸显了自媒体治理中自治的必要性,应充分发挥自媒体作为自治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利用自媒体技术条件优势,自主维护自媒体空间的风险秩序,强化自我治理能力。

其二,正确认知风险。在风险感知与施为过程中,理性系统和经验系统是并行的。主体的分析推理会受到情感的引导,理性决策需要两种思维的适当整合。因此,既需要伦理共同体中积极健康的道德情感,避免破坏性情感的产生与传播;又需要理性的长期建构与培育,以理性辨识风险信息。引导自媒体正确认知突发公共事件中的风险信息,并选择适当的传播行为,能够排除错误判断、固化经验、狭隘情感等干扰因素,从而帮助自媒体形成风险信息传播中的自我治理能力。

其三,培育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既是自媒体增强信息辨识与有效播发能力的媒介技术,又是符合社会规范的精神品质与修养,它可以通过自律调节自媒体的行为;更是对社会共同体的认知与维护,是通过协商与合作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与习惯。基于人与媒体的重新融合,自媒体将是未来道德生活的重要内容,应将媒介伦理教育对象从媒体从业者向全民转型,将媒介素养专题纳入全民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之中,让所有公民认同自媒体实践所处的伦理共同体与道德关系,并对正确进行道德选择形成基本的道德意识与能力。所有公民在担当自媒体角色传播信息时需要“理解并重视道德、公

众信任的重要性以及专业性”^[8],形成媒体的道德自觉,具备良善意愿;学会判断信息真伪与素材良莠,避免制作、传播虚假信息与错误观念,具备风险传播能力。

媒体是利益诉求的渠道,尤其是在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公共风险背景下,通过治理,使自媒体的利益诉求不局限于一己之私利,而是具有共同体与合规则意识,从而完成对自媒体利益调整的风险治理目标,使自媒体扬长避短,追寻共善,构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风险的最优媒体生态。

参考文献:

- [1] WIEGMAN O, GUTTELING J M. Risk appraisal and risk communication[J].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95(1/2): 246.
- [2] SLOVIC P. Risk as analysis and risk as feelings some thoughts about affect, reason, risk, and rationality[J]. *Risk Analysis*, 2004(2): 311.
- [3] BERGER J. Arousal increases social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1(22): 891.
- [4] BANDURA A. Exercise of human agency through collective efficacy[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0(3): 78.
- [5] 陈爱华. 技术与伦理: 高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应对[J]. *伦理学研究*, 2006(4): 96.
- [6] 习近平.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N]. *人民日报*, 2019-01-26(01).
- [7] STOKER G. Governance as theory: five propositions[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98(155): 18.
- [8] GILLMOR D. *We the media*[M]. Sebastopol: O'Reilly Media, 2004: 135.



引用格式:冯华超,韩春旭.我国农地调整研究述评[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3):33-39.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3.004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3-0033-07

我国农地调整研究述评

A review of agricultural land adjustment in China

冯华超,韩春旭

FENG Huachao, HAN Chunxu

郑州轻工业大学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1

关键词:
农地调整;
正式规则;
非正式约束;
农地确权

摘要:通过对我国农地调整的发生原因、主体、实践差别、影响和发展方向等方面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发现:既有研究在农地调整的实践差别上基本达成一致,但在发生原因、发起主体、影响和发展方向等方面尚存在需深入探讨的问题。未来应努力探索如何健全农地调整的替代性制度和协调解决涉及农地调整的法律法规之间的内在张力。

[收稿日期]2020-03-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80307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8YJC90128);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2019CSH024);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0-ZZJH-503)

[作者简介]冯华超(1989—),男,河南省新野县人,郑州轻工业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农村改革与区域发展。

土地是大部分农户赖以生存的最主要生产要素,土地如何分配与用什么样的方式分配对农民的粮食生产和经济收入具有重要意义^[1]。19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虽然使得我国在土地所有权结构上表现出一种高度平均主义的特征^[2],但是这种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的制度安排可以保证每个农村家庭粮食的消费,这对于平滑家庭消费具有重要意义。也正是基于公平和保障的目标考虑,我国大多数农村都采取了定期或不定期的行政性农地调整政策,这已经成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普遍接受的一个事实^[3-4]。但是均田分配的益处得到广泛认同的同时,借助政府干预下的农地调整来保证农民获得土地均等机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讨论^[1]。特别是在当前农地确权的实践中,农地调整引发的矛盾和纠纷严重制约了农地确权的推进,这也与我国的政策取向相违背。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思考农地调整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很有必要。鉴于此,本文拟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文献,从农地调整的发生原因、主体、实践差别、影响和发展方向五个方面,系统评价相关研究与进展,以期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

一、我国农地调整的发生原因: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

土地的频繁调整及其带来的地权不稳定是我国农地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从中央的政策取向来看是努力抑制农地调整的,但刚性的制度在基层实践中不断被异化,承包关系由制度层面的稳定变成实践层面的调整^[5]。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地权的不稳定呢?这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大多数研究从经济学或法学的视角切入,形成了两种比较有解释力的假说:一是“产权残缺学说”,该假说认为在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中,由土地产权虚置而产生的产权功能残缺问题尤为突出,土地所有权并没有严格的排

他功能,按照人口变动来分配土地就成为这一制度的内生安排^[6-7];二是“市场缺失假说”,该假说认为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由于土地租赁和农业雇佣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全,当农业生产要素缺乏进行进一步优化配置的市场途径时,必然在客观上存在进行农地调整的要求^[2]。

以上两种解释虽都表明了农地调整的合理性,但并没有揭示出农地调整的深层原因。实际上,农地不仅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生存的依靠。在人均土地资源禀赋极少的地区,农民的理性原则并不是收入最大化,而是把生存安全放在第一位^[8],此时,农地向少数人集中的制度无法维持社会稳定。特别是在没有良好运行的农地租赁市场的环境下,农地调整提供了一种风险分担的机制^[9],它迎合了传统的公平观念^[10],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社会保障的作用^[11]。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农地调整会导致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是这种效率损失是保障平等的必要成本^[12]。当前,虽然农民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在减退,但由于非农收入的不确定性,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并没有彻底转变。此外,在一些地区由于大范围征地或流转,土地价值提高,村级组织通过农地调整可以化解矛盾,满足多数人的需求,实现利益共享。从这个角度来讲,农地调整是使拥有较少土地的农民面临最小风险的机制,是社区和农民囿于严峻的农业发展环境和社区内部的资源约束条件所作出的理性选择^[3]。

二、我国农地调整的主体:村级调控与政府调控

当面对农地调整这一重要问题时,一些海外研究者认为,中国农村的管理是自上而下的,甚至一旦干部对某件事情做出决定便可以强加到农民身上^[13],即村干部是农地调整的主体。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由于农地调整的行动是由

村委会或者村民小组进行的,因而农地调整实践很大程度上是由村组干部进行推动和执行的^[14],海外研究者的判断也基本符合实情。在农地调整中,村级组织是除政府外实施农地调整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当农地潜在价值越高时,村干部可能越倾向于通过调整来进行寻租^[15]。有研究甚至发现,年纪较大的村干部进行的农地调整更频繁^[2]。农户在面对问卷中有关农地调整的决策权和地块分配的决定权由谁掌握的问题时,回答为“村干部”的比例占样本的绝大多数^[16]。

村级调控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农地调整的动力机制,但是仅仅将农地调整归于村组干部的推动显然与大多数地区的实际不符。因为村级组织对农地的调控并非随意的,村权之扩张也并非完全基于一般性的法律框架不明,也会受到土地规则本身与村治的政治框架两方面制约^[17]。一些研究就发现,当遇到由于人口原因而有人提议实行农地调整时,所在的村民小组会要求进行民意投票,只有获得普遍赞同之后才会实行调整,即使是在县级或乡镇干部提议农地调整时,一般也都会由村民小组来决定是否实施^[17]。

村级组织虽然是农地调整的决策者与组织实施者,但其权力基础是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国家政治权力的延续^[11],在合法的范围内更多的体现出国家意志的贯彻者和执行者的角色。就农地调整而言,由村一级和县级以上政府决定农地调整的占绝大比例^[18],特别是随着国家对村级组织调控权的限制,由政府行为引发的调整比例越来越大。一项对 1002 个农民的调查发现,认为村里进行农地调整的原因是政府规定或要求的占 86.4%,是村干部要求的仅占 4.9%^[19]。而另一项关于农民对于农地调整主体的认知的调查也发现,认为调整主体是“地

方政府”的占比最高^[20]。在广大农民眼里,法律意义上的真正土地所有者代表——村集体在农地调整中所起的作用似乎远比不上政府的作用大^[19]。综合以上分析,村级组织的调控权在现实中似乎被夸大了。

三、我国农地调整的实践差别: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约束的协调与互动

正如上文所言,农地调整的发生可能是基于平等的考虑,但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央统一的政策下,不同的农地调整实践却又千差万别,即便是同一村庄不同小组的调整形式和周期等也有所不同?针对这一问题,学界大致从国家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和乡村治理三种角度来进行诠释。有学者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视角进行解释,认为尽管中央政策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实施的力度却是先松后紧、逐步增强的*。这种不同时期中央政策规定文本上的“有意模糊”的渐进式实施方式,给予地方较大的政策调整空间,使得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做出相应决策,这是造成各地土地调整差异的重要原因^[21]。但是实际上,村级土地制度的安排与实施要受到村中各种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14],并不是国家正式规则可以单方面决定的。

有学者从村庄经历和内部结构出发,认为能否调整土地的关键在于所有的村民是否具有一致的地方性共识^[22],这种共识要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遗产的交互影响:(1)在小农社会中,农民生存高度依赖土地,农民一直有平均占有土地的强烈意识;(2)在人民公社时期,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其他平均主义实践则以隐蔽的方式对之有所强化;(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虽然现实情况已经改变,由于滞后效

* 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允许土地大、小调整阶段;允许小调整、不允许大调整阶段;强调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和确权发证阶段。

应的存在,人们的观念并没有完全改变,加上对当前国家政策和法律的想象和曲解,农民对农地调整仍然有比较强的偏好^[10]。一般而言,地方性共识越强,村庄的自主性就越强,国家正式规则的介入所产生的变化就越慢,从而使得不同地区的调整呈现出差异。这一假说从非正式约束的角度来理解农地调整的差异,注意到了调整内生的社会心理基础。

农地调整的差异不仅与国家政策规则的渐进形成的政策空间与地方性共识相关,还与乡村治理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张静^[23]认为,地权不稳定是由于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相对于规则主观能动性高度发达,规则是可以被选择的,农地调整是基于利益冲突或利益分配的多规则博弈,国家政策、村干部决策、集体意愿和当事人约定等因素都可能成为选择土地规则的力量,土地使用规则随着利益、力量的变动而具有不确定性,由此使得农地调整的实践在各地千差万别。这种解释的普适性较高,具备一定的弹性,但是其对调整的建构过程缺乏关注。实际上,农地调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国家正式规则的加入与非正式约束等制度要素协调和互动的程度不一。在一些地区,农民一直有强烈的调地偏好,村级组织通过调地也可以做成一些事情,如化解矛盾和利益分享,这就形成了调地的需求和坚持。与此同时,基层政策基于稳定的治理逻辑,会对中央的政策或制度规则、逻辑进行选择性的运用,这种相对独立性为农地调整的存续提供了庇护,地方政府的治理逻辑、村组的利益和农民的需求相契合,农地调整由此成为可能^[14]。但在地理条件较差的地区,调整的交易成本较高,经济发展和非农就业降低了农民对调地的需求,村庄调地的共识不强,实际上调整减少。因此,农地调整之所以在各地千差万别,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的正式规则与民间的非正式约束等制度要素协调和互动的程度不一,在二者相一致的地区农地调整较少发

生,而当二者不一致时,正式规则留下的政策空间为非正式约束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条件。

四、我国农地调整的影响:对土地投资的影响

在以往研究中得到广泛关注的是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对土地投资的影响。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土地的频繁调整带来的地权不稳定,不利于农户达成投资的预期收益目标,也影响了农户进一步投资的积极性。很多经济学家对农地产权与农户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大多数研究发现,农地调整带来的地权不稳定和对土地产权交易的限制,削弱了农民在土地上进行投资特别是土壤保护性投资的积极性^[24]。例如,何凌云等^[25]对广东的调查表明,土地使用权越稳定,农民投资的积极性越高;马贤磊^[26]以丘陵地区水稻生产为例,研究了农地产权变量对土壤保护性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村庄农地调整越频繁,农户施用农家肥的可能性越低。

但也有研究者对地权不稳定给农业生产效率造成的不利影响表示质疑。其一,农地调整和地权稳定并不一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调整也不一定会造成农民投资积极性的下降。对于拥有不同土地来源的农户来说,对地权稳定性的判断是不一致的,特别是个体差异的存在使得我们也无法认同同一个村庄内部的农户对于地权稳定性都具有相同的判断^[27]。在某种程度上,只要农地调整的规则是稳定的且被农民所认同,就不会影响地权稳定^[28]。从实际情况来看,受农地制度渐进式变革和交易成本的影响,现阶段的调整主要是小调整,大调整已经较少发生,故而即便发生农地调整也并不意味着村庄内所有的农地都会调整,农民所有的地块都会改变。基于中国农村的小调整较为普遍的事实,Kung^[29]认为,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中国的农民大体上已经接受了根据人口与土地的

变动进行边际调整的惯例,在不进行大规模调整的情况下,这种惯例反而向农民传达了一个信息,即他们可以在未来耕种相同的地块(只要家庭人口不发生减少)。

其二,地权稳定性是否影响投资可能与投资的类型有关。从农地调整的发生时间来讲,大多数调整都发生在收获季节之后,农户并不担心农地调整对他们当期收益的影响,因而调整可能并不会影响生产要素的短期投入^[30]。对于那些为了进行出租或服务的投资,如购买大型农机等,由于并不与特定地块相连,即便调整改变了农户的土地面积、质量或位置,农户的投资依然可以用于改变之后的地块的生产活动,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调整会降低这一类投资的积极性^[31]。这样看来,农地调整可能只是影响少数几种特定类型的投资。

其三,农户投资主要基于收益-成本分析,相对于地权不稳定的风险,其他因素对投资的决策作用可能更重要。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农业生产的回报率仍然比较低,即使地权稳定对农业投资具有正面作用,农业产量也未必会因此有所增加^[32]。此外,与土地有关的投资如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农户的投资积极性并不高^[31]。所以,仅仅提高地权的稳定性,将重点放在阻碍投资上,并不能解决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和农业生产收益低等原因引发的投资意愿不高的问题。因此,土地制度安排本身并不能保证农地经营者可以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33]。

五、我国农地应不应该调整?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农地调整所面临的约束(法律限制与交易成本)不断增强,相关的替代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建立与完善,农地调整逐渐减少,但当人口变动或非农就业不稳定时,农民内部依然会涌动出调地的诉求。丰雷等^[21]对17省份的调查发现,2010年农民对在30年承包期内“不得调地”政

策的态度持“反对”的比例仍有28.6%,相比2005年23.7%的“反对”比例甚至有所回升。但实际上国家是严格限制农地调整的,农地调整制度由此陷入“调地,不合法;不调地,不合理”的困境,那么农地应不应该进行调整呢?

多数研究者认为农地调整带来了地权的不稳定,给经济绩效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24-26],这种负面的评价为国家规制农地调整的规范提供了正当性,有学者提出未来要彻底禁止农地调整,继续加大政策执行力度,并对法律法规中关于农地调整的条款进一步具体细化,以维护农村的公平和稳定^[26]。针对农民的农地调整诉求,国家主张在土地承包经营关系长期不变的框架下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如以土地流转发挥类似调整的功能^[34]。

然而,禁止调整的出发点主要在于调整在地权稳定和农地效益方面的负面效应,难免有将土地视为一种产品或资本的倾向。农地制度作为我国农村社会的根本制度,其不只具有经济性,还具备社会性和政治性,因此对农地制度的考察不能仅仅考虑效率。从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角度来讲,农地调整也具备一定的正功能^[35],可能是一项造福农民的基础工程^[36],如发挥了社会保障的作用^[11],维护和保障了妇女的土地权益^[37],促进了农民的自我管理和农村社会的自我调节^[10],以及促进了劳动力长期流动^[12]和农地使用权市场的发育^[27]。退一步讲,即便要禁止农地调整,也需要在技术上处理好至少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由于现有法律中存在允许调整的条款,要对既有法律、法规进行整理和修订;二是农地调整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和形式,禁止调整的情形下就需要调整村民自治的制度结构与重要功能^[17]。从中国的具体实际来看,这两个问题都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

笔者认为,不同地区人均土地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农民对于土地调整的偏好也是不同的,

在权衡是否调整时,重要的是要给予农民更多的选择权,而不是替农民做出决断。政府可在了解农民调地意愿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的举措:在一些人地矛盾特别突出的、绝大多数农民希望调地的地方,在坚持大稳定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允许农地调整,但应努力控制农地调整的频率和规模,并对农地调整的办法和实施过程给予严格的监督;如果农民不愿意调整,那么就应修订相关法律,调整相关制度,切实维护农村的稳定,保障农民的权益。

六、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学界在农地调整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方面形成了丰富的成果,已经取得的成果具有以下特征:(1)在研究内容上,充分考虑到农地调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特性,关注了农地调整与农业生产效率、劳动力流动、社会保障、乡村治理等议题的层层牵连,强调了农地调整的复杂性与深刻影响;(2)在研究视角上,既有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从单一视角研究农地调整,大多能够从国家、集体与农户两个或三个层面来审视农地调整问题;(3)在研究方法上,既有理论层面的逻辑分析,又有大量的实证研究,特别是一些量化研究注重实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未来,以下两个问题需要关注。

1. 如何健全传统农地调整的替代性制度

当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与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的快速流动,我国农业经营格局正面临着农业边缘化、劳动力弱质化的挑战^[33],如何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成了农业发展的现实问题。此外,随着新农保、新农合等制度的施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以公平为诉求进行农地调整的意义已经有所弱化。因而,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上,一定程度上都表明,传统均分土地的调整方式已经不符合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由于均分土地的调整方式在当前仍有一定的存在空间,如何

健全传统均分土地的替代性制度,进一步稳定地权就成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之一。

2. 如何协调农地调整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在张力

在现实中,仍有许多村组进行农地调整,调整在这些地方甚至成了村规民约的一部分,即成了地方性共识。在村治的框架下,按照村庄民主与多数原则进行农地调整以解决人地之间的矛盾,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具体体现,符合村民自治的形式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合乎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条文和精神。但在当前农地确权的背景下,农地调整已经不被制度允许。鉴于当前农地调整仍然存在的事实,有必要重新审视不同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重新整理、修订和完善既有法律法规、政策条文。

参考文献:

- [1] 金松青, DEININGER K. 中国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展及其在土地使用公平性和效率性上的含义[J]. 经济学(季刊), 2004(4): 1003.
- [2] BRAND L, 李果, 黄季焜, 等. 中国的土地使用权和转移权: 现状评价[J]. 经济学(季刊), 2004(4): 951
- [3] 张红宇. 中国农地调整与使用权流转: 几点评论[J]. 管理世界, 2002(5): 76.
- [4] 丰雷, 蒋妍, 叶剑平, 等. 中国农村农地调整制度变迁中的农户态度: 基于1999—2010年17省份调查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 2013(7): 44.
- [5] 钟涨宝, 狄金华. 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J]. 江苏社会科学, 2008(1): 147.
- [6] 黄弘. 产权到户是遏制土地频繁调整的有效途径[J]. 农业经济问题, 2005(12): 38.
- [7] 孔涛, UNGER J, 刘鹏凌. 农村承包地调整的实证研究: 通过村民小组数据的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11): 87.
- [8] 斯科特.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 程立显, 刘建, 译. 南京: 译林出版

- 社,2001:156.
- [9] 龚启圣,周飞舟.当代中国农村土地调整的个案分析[J].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10):136.
- [10] 朱冬亮.土地延包“30年不变”的再认识[J].农业经济问题,2001(1):37.
- [11] 李尚蒲,罗必良.农地调整的内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5(3):18.
- [12] 姚洋.非农就业结构与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J].中国农村观察,1999(2):18.
- [13] BERNSTEIN P, LÜ X B.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4] 聂建亮,钟涨宝.庇护与坚持:农地调整的存续逻辑:基于对湖北邢村的个案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74.
- [15] 钱忠好.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的困境与乡村干部行为:对乡村干部行为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3(2):10.
- [16] 朱明芬,常敏.农用地隐性市场特征及其归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1(11):10.
- [17] 毛丹,王萍.村级组织的农地调控权[J].社会学研究,2004(6):41.
- [18] 于乐荣,张林秀.中国农村耕地调整频率及变化趋势:一项来自全国五个省的实证调查报告[J].生产力研究,2007(14):24.
- [19] 徐旭,蒋文华,应凤其.农地产权:农民的认知与意愿:对浙江农户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02(6):36.
- [20] 汤谨铭,朱俊峰.农户认知对农地制度变迁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重庆市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3(7):71.
- [21] 丰雷,蒋妍,叶剑平.诱致性变迁还是强制性变迁?——中国农村土地调整的制度演进及地区差异研究[J].经济研究,2013(6):4.
- [22] 陈柏峰.地方性共识与农地承包的法律实践[J].中外法学,2008(2):295.
- [23] 张静.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一个解释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03(1):113.
- [24] 姚洋.农地制度与农业绩效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1998(6):3.
- [25] 何凌云,黄季焜.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与肥料使用:广东省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1(5):42.
- [26] 马贤磊.现阶段农地产权制度对农户土壤保护性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以丘陵地区水稻生产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9(5):31.
- [27] 田传浩,贾生华.农地制度、地权稳定性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理论与来自苏浙鲁的经验[J].经济研究,2004(1):112.
- [28] 唐浩.农民的土地产权偏好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4):9.
- [29] KUNG J K S. Common property rights and land reallocations in rural China: evidence from a Village Survey[J]. World Development, 2000(4):701.
- [30] 俞海,黄季焜,SCOTT R,等.地权稳定性、土地流转与农地资源持续利用[J].经济研究,2003(9):82.
- [31] 钟甫宁,纪月清.土地产权、非农就业机会与农户农业生产投资[J].经济研究,2009(12):43.
- [32] 姚洋.效率,抑或政治需要?——评《土地承包法》[J].南风窗,2002(9):40.
- [33] 冯华超,卢扬,钟涨宝.论土地调整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兼论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0.
- [34] 张红宇,李伟毅.以起点公平为基础实现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J].新视野,2013(4):14.
- [35] 冯华超,钟涨宝.土地调整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一个研究述评[J].中国土地科学,2017(7):83.
- [36] 贺雪峰,刘金志.土地何以成了农民的权利问题[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9.
- [37] 田传浩,陈佳.禁止土地调整与妇女土地权利保障:基于浙江和陕西的经验[J].经济学(季刊),2013(1):719.



引用格式:张少停,康依宁. 城乡关系视角下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演变的逻辑:1949—2019[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3):40-48.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3.005

文章编号:1009-3729(2021)03-0048-09

城乡关系视角下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演变的逻辑: 1949—2019

The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rural land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relations:1949-2019

张少停,康依宁

ZHANG Shaoting, KANG Yining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独特的农村土地制度安排是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中国奇迹”的根本驱动力。因此,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城乡关系是理解70多年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演变逻辑的重要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工业化优先的城乡分离、城市化优先的城乡失衡和一体化发展的城乡融合三个阶段。相应地,农村土地制度演变的逻辑是:在产权统一的农村土地集体化条件下,国家通过全面控制农村土地以汲取大量资源支持工业化高速发展;在“两权分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国家通过农村土地管制和土地行政化(土地征收、土地财政、占补平衡、土地增减挂钩)支撑了城市化快速推进;“三权分置”的新一轮土地改革,旨在通过管制改革与市场化放松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国家管制,激活农村土地资源沉睡的资本属性,释放农村土地巨大的经济价值以实现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还没有真正完成的社会转型期,农村土地市场化过程仍面临着土地依赖与行政控制积重难返、土地资本化风险防控、土地利益博弈等诸多挑战。

关键词:

城乡关系;
土地制度;
全面控制逻辑;
行政化逻辑;
市场化逻辑

[收稿日期]2021-03-15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0BZZ01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41701195)

[作者简介]张少停(1983—),男,河南省许昌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讲师,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乡村治理与农村土地问题;康依宁(1995—),女,河南省南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在现代化进程中,土地改革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上极为突出的问题”^[1]。回顾70多年的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土地改革不仅实现了中国农民几千年以来“耕者有其田”的终极理想,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2]。“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指出,土地改革奠定今日农村基础^[3]。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不仅解决了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成为改革开放创造“中国奇迹”的突破口并为之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然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和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农村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生产力,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面临诸多现实困境:细碎化分散经营下土地生产率较低、农村劳动力大转移下大量宅基地闲置与违法用地现象普遍、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下农民利益被侵犯与城乡社会非均衡发展等。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已经成为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取得了显著进展:承包地和宅基地“三权分置”理论的提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逐步建立、《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顺利通过等。学界围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既有研究主要从三个视角展开讨论:一是从制度属性视角,关注农村土地制度属性,学者的争论主要在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国有制^[4]、集体所有制^[5]还是私有制^[6];二是从功能变迁视角,强调农村土地功能变迁的观点,认为农村土地经济价值凸显^[7],保障与财产双重性质的纠缠是造成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困难的症结所在^[8];三是从产权安排视角,重视农村土地产权

安排,学者的分歧在于农村土地产权清晰^[9]还是模糊^[10]。从现有研究来看,基于城乡关系视角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鉴于此,本文拟以城乡关系为视角,深入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及其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关系,以便更好地理解新时代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三权分置”改革与农村土地市场化转向。

一、城乡分离:工业化与农村土地集体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摆在我国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迅速实现工业化以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而工业化需要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只有通过农业生产的集体化来完成工业化进程^[11]。在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安排下,逐渐形成以户籍制度和统购统销为核心的城乡分治格局,具体到农村土地制度上,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一系列举措,形成了“以农补工,以乡助城”的国家全面控制之下的农村土地集体化制度。

1. 城乡分治和城乡二元格局的确立

在工业化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下,我国形成了以户籍制度和统购统销为核心的城乡分治格局,影响至今的城乡二元体制由此确立,而人民公社下集体化的农村土地制度是城乡分离式发展的制度基础。1953年后,随着我国城市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民盲目拥入城市,城市在就业、农副产品供应方面压力剧增。为了使城乡之间的社会秩序稳定有序,也使农业生产能够持续促进城市工业化发展,我国在城市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在户籍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下,农村人口不得随意进入城市,从而减少了城乡之间的互动;同时,国家通过对粮食的统购统销而获得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并以此促进工业化的快

速发展。相应地,在广大农村则建立起人民公社制度,实行集体经营,农村人口不仅被限制在农村,而且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20世纪60年代后,城乡之间在就业、教育、福利等方面的差别逐渐凸显并形成了两个相对闭塞的空间实体。国家对城市和乡村发展的不同政策,使得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离式发展由此开始。

2. 全面控制与农村土地集体化

为满足工业化发展的资源积累需要,在农村最终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土地集体化制度,通过全面控制达到汲取资源以支持工业化发展的目的。1952年前后,我国大部分地方完成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转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一方面,农民土地所有制下的小农经营模式经营分散、规模较小,无法满足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对农产品的需要^[12];另一方面,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被认为是封建统治的基础,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13]。因此,从1953年开始,在农民自发组织与国家推动下,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一系列合作化运动,最终完成了由农民土地所有制向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转变^[14]。1962年出台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标志着国家全面控制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土地集体化的完成。

在国家全面控制的农村土地集体化制度下,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和收益权高度统一于农村集体组织(生产队所有,由政府通过计划指令实际掌控)。此外,农村劳动力、牲畜、农具都统一由生产队安排使用和管理。在国家全面控制下,必须完成上级特别是县级政府的派购任务规定的农产品数量,按县级政府的要求搞农田水利建设,按县级政府指定的日期播种、收获或采用某些技术,几乎连口粮留多少也由上级说了算。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

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既不能享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也没有剩余索取权,从而高效地为城市工业化快速积累提供剩余产品^[15]。

3. 农村土地集体化困境

基于全面控制逻辑的农村土地集体化制度,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大量汲取农业剩余“以农补工”,农民劳动积极性被严重挫伤,农村土地市场被“关闭”,农民生活水平低下,甚至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

其一,国家大量汲取农业剩余以支持工发展,造成农业与工业比例失调。在工业化逻辑下,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方式大量汲取农业剩余以支持工业化发展,造成农业与工业比例失调。据估算,1953—1985年全国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7878亿元,每年的“剪刀差”绝对额为240亿元左右,正是“剪刀差”奠定了30多年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6];1953—1978年“剪刀差”差额为3375.6亿元^[17],1952—1990年间通过“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了8708亿元左右的资金积累^[18]。

其二,农民劳动积极性被严重挫伤,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在集体化土地制度下,土地产权不仅归集体所有,土地也是在集体的控制下统一经营,限制了传统农户的人身自由和竞争性,难以发挥农民的劳动积极性^[19]。此外,在集体化土地制度下,农村实行统一劳动、统一经营,土地收益“吃大锅饭”,行政分配取代按劳分配,个人所得与劳动多少几乎没有太大联系,“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的人民公社集体化土地制度大大打击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搭便车”“磨洋工”等现象导致劳动监督成本过高,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粮食总产量增长缓慢。

其三,土地生产率低下,农民温饱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在集体化土地制度下,一方面,单纯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没有高效利用农业资源,是典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20]。另一方

面,农民劳动积极性不高,导致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过高。此外,过高估计劳动热情的力量而忽视农业机械化、化肥原料、因地制宜等因素亦是土地生产率低下的原因。因此,到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仍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21],全国仍有2.5亿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22]。

二、城乡失衡:城市化与农村土地行政化

改革开放带来了城乡关系格局的根本性改变,户籍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等已经不能适应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需要;相应地,集体化的人民公社制度也不利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调动,新的土地制度呼之欲出。改革开放后,国家放松对城乡关系的管控,城乡关系更多的是通过市场进行调节,在市场经济的驱使下,乡村资源仍然单向地流入城市,农村支持城市、农业哺育工业的发展趋势始终没有改变。2005年税费改革对乡村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家开始关注乡村发展问题,开始了政策引导下以城带乡的新时期。然而,城乡失衡的格局非但没有因此被打破,反而在改革开放后的近40年里更加根深蒂固。

1. 有限市场化与城乡失衡发展

有限市场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城乡要素流动逐渐增多,国家政策也逐渐向农村倾斜,但城乡关系出现了逆转失衡的态势,突出表现为在有限市场化的效应下农村大量资源(劳动力、资金等)向城市流动,呈现出城乡非均衡发展的态势。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国家放松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资金等方面的管控,让市场自由选择,在此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资金大量流入城市,支撑和加快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户籍、农村土地等方面依然采

取行政控制的手段。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村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但城市在享受劳动力红利的同时,却不需要支付相应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成本。在土地方面,政府垄断了农村土地市场,农村土地只有通过征收或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才能进入市场,而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村、农业的比例远远低于城市。据统计,2008—2010年,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村的部分合计分别为10.18%、8.39%和9.91%,三年平均为9.49%^[23]⁶。这种有选择的市场化逻辑使得低成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土地都有利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失衡的态势。1978—2012年,尽管城乡居民收入都快速增长,但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2012年城乡收入差距约是1978年的80倍^[24]。

2. 国家管制与农村土地行政化

两权分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提高了农民劳动积极性,解决了全国人民吃饭的大难题。但是,在国家对农村土地用途与产权进行严格的双重管制下,行政化成为农村土地的支配性逻辑,并通过土地征收、土地财政等政策助力中国快速城市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极大地激活了产权的活力,释放了农村土地的巨大价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般认为源于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开始的大包干,“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分配方式极大调动了农民劳动积极性。到1984年底,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的农户占到96.6%。1991年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把“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农村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978年我国农村仍有2.5亿农民没能解决温

饱问题,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的1984年,90%的农村家庭过上了温饱生活^[25]。据统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6.89%^[26]。此外,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国家放松了农地非农用的限制,因此在中国农村创造了“乡镇企业占据半壁河山”的奇迹。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国家虽然通过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农村土地的控制,但仍然通过国家管制对农村土地进行严格控制,国家不仅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严格的用途管制,而且对农村集体土地产权进行严格的管制,从而形成了不完整产权下的农村土地行政化体制。其一,用途管制。土地用途管制是国际通用的惯例,即使是最自由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国家,任何人都没有自行决定和改变土地用途的权利^[27]¹¹⁷,如美国、日本实行的“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英国实行的“土地规划许可制”,法国、韩国实行的“建设开发许可制”,通过土地用途管制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相协调。我国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正式确立了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新型土地管理制度,并沿用至今。其二,产权管制。通过产权管制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进行管制,如承包权、经营权不能流转,房地分离管制制度下宅基地使用权现阶段不能买卖,指标控制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能直接入市,农户承包经营权不能抵押、担保,宅基地使用权不能流转(宅基地不允许在集体成员外进行买卖)等。

3. 农村土地行政化困境

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农村土地行政化有利于农业生产和维护城乡社会秩序,但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农村土地行政化的弊端日益凸显。

其一,土地征收侵害农民土地权益。在农村土地行政化逻辑下,政府通过土地征收完成土地城镇化,城市偏向的导向造成农民土地权益受损。一是大量农民失地。城市化即城市土地的扩张、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农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化,但在农村土地行政化逻辑下,城市“化地不化人”,造成大量农民失地失业。据估计,我国失地农民数量至少在1亿以上,保守估计也有6000万以上,而且还以每年300万的速度增长^[28]。二是土地收益分配不合理。一方面,土地征收补偿按照农地农业用途补偿,而以公益用途名义征收的土地大量用作商业用地、工业用地和房地产用地,很显然征收后农地产生了极高的增值部分,这对农民来说极不合理。据统计,2010—2015年,农民获得的土地补偿费占土地出让收益的比例不超过5%^[29],而且随着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征收后的土地价值会继续上升,这部分土地增值与农村集体和农民都没有任何关系^[30]。

其二,土地财政埋下地方治理隐患。在农村土地行政化逻辑下,政府垄断一级土地市场,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收、高价出让农村土地获得大量财政收入,土地收入甚至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刘守英^[31]曾指出,土地收入是指政府通过征税、收费或经营形式获得的与土地征用和出让有关的收入,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土地收入逐渐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据估计,与土地有关的收入超过了全部政府收入的50%。土地财政以极低的土地成本成为中国城市化的“发动机”,甚至是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的制度支撑(工业用地低成本与工业企业补贴),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土地财政给地方治理埋下了严重隐患。一是土地纠纷增多,社会矛盾激化。土地财政意味着政府通过低价征收农民土地并高价出让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增值收益在

政府、企业(开发商和建筑商)和农民之间的不合理分配。随着互联网等信息传媒的发展,农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农民越来越意识到土地财政的不公平,土地纠纷越来越多,因征地、拆迁等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据国家信访局统计,60%群体性上访事件与土地纠纷有关^{[23]71}。二是地方政府债务持续增加,银行金融风险增大。在土地巨大潜在收益与地方竞标式发展的双重刺激下,地方政府大多会利用土地财政超前消费“土地价值”。从地方政府债务资金来源看,银行是最大的资金供给者,由于土地征收成本升高、土地出让收入和抵押价格回落,地方融资平台的逾期债务率会进一步上升,增加了银行金融风险。

其三,土地管理失效导致农地非农化严重。在农村土地行政化逻辑下,特别是在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陷入“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尴尬境地”^[32],导致土地管理失效,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大潮下大量农地非农化。农地非农使用涉及政府、农民、市民、企业(开发商、建筑商)等众多利益主体的切身利益,已经成为争论和利益冲突的焦点^{[27]66}。一方面,农地非农使用危及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1998—2003年每年有近21.7%的耕地是由于政府的行政性资源配置造成的资源损失。土地普查资料显示,2015年全国耕地为20.25亿亩,比2010年的20.29亿亩减少了0.04亿亩^[29]。另一方面,农地非农使用违法现象大量存在。由于城中村、城郊村的农村土地经济价值巨大,乱占耕地、私建滥盖、非法买卖等违法使用农地现象严重,小产权房是典型的土地管理失效的结果,有学者预估全国小产权房数量为66亿平方米,是全部商品房住宅面积的一半^{[27]123}。

三、城乡融合:一体化与农村土地市场化

中共十九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面对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实行城乡融合发展,标志着中国城乡关系进入新时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就是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

1. 城乡互动与城乡均衡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迅速推进,城乡二元的偏城市发展政策导致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社会矛盾表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协同性发展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共十九大提出实行城乡融合发展,并要求把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城乡融合发展理念摒弃了传统经济发展的单一发展观和城市化的单向发展观,旨在构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和生态全面融合、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全方位城乡关系新格局。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将城市与乡村置入一个有机系统,运用整体性治理的现代化治理方式,打破了传统城乡要素单向流动的“怪圈”,实现城乡要素的有效融合,充分发挥城乡各自在地理、环境、资源、人口、资金、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最终达到城乡融合发展的目的。

2. 管制改革与农村土地市场化

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看,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农村土地制度支撑。城乡融合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农地“三权分置”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市场化转向。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如果说前者大大提高了农民劳动积极性,那么后者则彻底激活了农村土地沉睡的资本属性。“三权分置”改革通过对农村土地

的产权细分,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与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之间寻找平衡点^[33]。产权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三权分置”正是牢牢抓住这个核心,围绕产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大权能,通过产权细分与产权重构寻找一种更加有效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如农用地的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宅基地的集体所有权、农户资格权、土地使用权。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文件对农村土地制度“三权分置”改革作出了明确部署: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试点县(市、区)进行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2016年10月,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正式提出;2017年,《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出台;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继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后又提出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明确指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

传统农村土地用途与产权的双重管制,造成国家管制与市场配置之间的矛盾,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土地资源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农村土地的市场化改革理应成为新时代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支配性逻辑。以产权为核心的“三权分置”改革适应了生产力发展要求,通过产权分离析出土地经营权,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土地用途管制的前提下,放松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国家管制,从农村土地的行政配置转向市场配置,最大化地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优势,激活农村土地这一笔巨大的沉睡资本,可为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提供内生动力。例如,农地“三权分置”分离出的土地经营权可以流转,能够“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力和资源利用率”^[33]。2019年发布的《土地市场蓝皮书:中国农村土地市场发展报告(2018—2019)》显示,截至

2016年底,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达4.71亿亩,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面积的35.1%。土地流转市场日趋成熟,2014—2017年,大多数省份50亩以下的适度规模土地(小块地)发布量占比激增,以东部的广东、中部的河南为例,近3年来,广东的小块地发布量占比增长了20%,河南的小块地发布量占比增长了18%^[34]。宅基地“三权分置”分离出宅基地使用权有力地推动了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不仅能够增加农民收益,而且能够增强集体组织财力^[35],为乡村振兴提供经济基础。国务院关于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情况的总结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3个试点县(市、区)已按新办法实施征地1275宗、18万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进一步显化了集体土地价值,试点地区共获得入市收益178.1亿元^[36]。

3. 农村土地市场化面临的新挑战

随着城乡关系政策导向的根本性变化,以及农村土地功能由保障性向财产性的转变,农村土地的行政化逻辑向市场化逻辑转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趋势。但是,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转型完成之前,农村土地制度市场化改革仍面临着诸多新挑战。

其一,土地依赖与行政控制逻辑积重难返。我国农村土地在工业化、城镇化迅速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无论是低成本的工业用地和城镇建设用地,还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都表现出“以地谋发展”的土地依赖特征。因此,在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如何摆脱土地依赖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此外,政府主导和行政控制一直是农村土地改革的主导性逻辑,这种改革的路径依赖根深蒂固。在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企业、资本、信息等市场要素仍然需要政府力量来推动,农民的土地利益也需要政府来保护,因此,政府如何把握服务性逻辑和控制性逻辑之间的界限,避免行政控制逻辑积重难返的困局,是农村土地

市场化改革面临的一大挑战。

其二,土地资本化的社会风险防控。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土地的属性由生产性的农业资源向发展性的工业资本转化,这也是市场化的内在逻辑。但是,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转型完成之前,农村土地仍然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生存保障等重要战略功能,而在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中,土地快速资本化无疑会导致耕地减少、农民失地等社会风险,甚至会引发社会矛盾和乡村社会秩序不稳。因此,土地资本化的风险防控是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三,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一直以来,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特别是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村土地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农民集体和农民本身。但是,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必然会打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边界,破坏既有的土地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相关利益关系。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市场化经营一开始就必须充分考虑相关改革措施,应对各个不同主体在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和利益调整^[37],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农民集体、分化的农民等诸多利益相关者,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平衡发展问题,以及外来资本与农村土地内部利益协调问题等。

四、结论

基于城乡关系与农村土地制度演变逻辑的视角发现,在城乡分离阶段,城乡关系的主导性逻辑是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优先逻辑。在“以农补工”的政策指导下,通过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统购统销政策实现对乡村的全面控制和农业剩余的汲取,具体表现在农村土地制度设计上是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集体化土地制度。在集体化土地制度下,国家全面控制了农村土地的生产、经营、分配,以完成行政控制与资源汲取的双重任务。全面控制逻辑成为人民

公社土地制度的主导性逻辑。在城乡失衡阶段,城乡关系的主导性逻辑是城市化优先发展逻辑。在“以乡助城”政策指导下,通过资金、劳动力等要素的有限市场化支持城市化建设,同时,又通过对农村土地、户籍的制度性控制,大大降低了城市快速发展的社会成本。城市化优先发展的城乡关系具体表现在农村土地制度设计上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行政化土地制度。在行政化土地制度下,国家通过用途管制、产权管制等方式垄断了农村土地市场,特别是依赖农村土地的“土地财政”,成为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经济基础。实践中,行政化逻辑成为承包责任制土地制度的主导性逻辑。在城乡融合阶段,城乡关系的主导性逻辑是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双向互助”政策指导下,城乡资源、产业、功能互补互促,推动城乡一体化和谐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城乡关系具体表现在农村土地制度设计上是以“三权分置”为核心的市场化土地政策。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通过产权细化与产权分离,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和农户成员权(农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的国家管制,放松农地使用权的国家管制,以促进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激活农村土地的资本属性,实现农民土地的财产权利。实践中,市场化逻辑已经成为“三权分置”改革的主导性逻辑。

参考文献:

- [1]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 刘为,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241.
- [2] 刘正山. 当代中国土地制度史: 上[M].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5: 93.
- [3] 杜润生. 杜润生自述: 中国农村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纪实[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17.
- [4] 刘俊. 土地所有权国家独占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9.
- [5] 贺雪峰. 地权的逻辑: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

- 处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10.
- [6] 文贯中.吾民无地: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7.
- [7] 刘守英.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0.
- [8] 陈小君.宅基地使用权的制度困局与破解之维[J].法学研究,2019(3):48.
- [9] 折晓叶.土地产权的动态建构机制:一个“追索权”分析视角[J].社会学研究,2018(3):25.
- [10] 曲福田,田光明.城乡统筹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J].管理世界,2011(6):34.
- [11] 李行,温铁军.中国60年农村土地制度变迁[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9(3):38.
- [12] 曹涌.70年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内卷化”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19(4):41.
- [1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31.
- [14]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290.
- [15] 彭鐔.八二宪法土地条款:一个原旨主义的解释[J].法学研究,2016(3):36.
- [16] 严瑞珍,龚道广,周志祥,等.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J].经济研究,1990(2):64.
- [17] 李微.农业剩余与工业化资本积累[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302-303.
- [18] 冯海发,李激.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数量研究[J].经济研究,1993(9):60.
- [19] 徐勇.历史制度底色下世界土地改革进程与成效比较[J].社会科学研究,2016(4):58.
- [20] 吴玲.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76.
- [21] 王大伟.城乡关系视角下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绩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62.
- [22] 李景刚,张效军,高艳梅,等.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一体化土地市场制度改革及其政策建议[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3):297.
- [23] 刘守英.直面中国土地问题[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
- [24] 陈锡文,罗丹,张征.中国农村改革4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6.
- [25] 谢经荣,叶剑平,王玮,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农地租赁问题及管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43.
- [26] LIN Y F.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1): 34.
- [27] 华生.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 [28] 王轶,詹鹏,姜竹.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与城镇居民和未失地农民收入差距研究:基于北京地区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8(4):121.
- [29] 洪名勇.城乡二元土地制度:逻辑起点、演进与未来改革[J].经济研究参考,2018(38):31.
- [30] 刘守英.中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特征、问题与改革[J].国际经济评论,2014(3):9.
- [31] 刘守英,周飞舟,邵挺.土地制度改革与转变发展方式[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83.
- [32] 甘藏春.社会转型与中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15.
- [3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集体所有制下的产权重构[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66.
- [34] 土地流转市场报告,全面解读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趋势[EB/OL].(2018-04-24)[2021-03-11].<https://www.tuliu.com/read-79107.html>.
- [35] 董祚继.“三权分置”:农村宅基地制度的重大创新[J].中国土地,2018(3):6.
- [36] 国务院关于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情况的总结报告[EB/OL].(2019-01-02)[2021-03-01].https://www.sohu.com/a/286082728_120055030.
- [37] 张智勇,杨再惠.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土地经营市场化问题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5(7):89.



引用格式: 张扬, 师海猛. 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探讨[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3): 49-54.

中图分类号: F3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2186/2021.03.006

文章编号: 2096-9864(2021)03-0049-06

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探讨

Discussion on the reform of entering the market of rural collective operational construction land in China

张扬, 师海猛

ZHANG Yang, SHI Haimeng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于优化城乡要素配置、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经过隐形入市、探索入市、深化改革和授权入市四个阶段,逐步形成了新型综合类用地模式、异地调整入市模式、集体土地整备中心入市模式和集地券入市模式,但还存在着入市与征地之间的矛盾、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和入市配套规划缺失等问题。应实施统筹入市与征地、规范收益分配机制和加快完善村庄相关配套规划等措施,促进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健康入市。

关键词:

农地入市;
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改革

[收稿日期] 2020-01-26

[基金项目]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重大项目(2020-YYZD-01);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0BJJ005); 河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19A630002)

[作者简介] 张扬(1973—),男,河南省扶沟县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土地制度;师海猛(1996—),男,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土地制度。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利用管理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实现土地权利资本化,让更多农民分享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2020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要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指导意见,全面推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作为“三块地”改革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对于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完善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乡村振兴、缓解城市用地紧张状况,以及遏制房价飞速上涨有着重要意义^[1]。

很多学者对此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孙秋鹏^[2]指出,地方政府是影响入市改革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目前改革尚未达到理想状态,地方政府的行为仅是为了应付中央政府压力和考核。陆雷等^[3]认为,“十四五”期间要适度放宽入市改革的条件及其范围,谨慎探索入市土地用于住宅开发。孔祥智等^[4]研究发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虽然已经全面放开,但目前缺少相关实施细则,各地改革进程参差不齐,改革缺少系统性,从而导致入市土地供需失衡。陈红霞等^[5]研究发现,在入市收益分配过程中缺少利益均衡思想,农民利益往往得不到保障,应从利益均衡视角构建兼顾各方的收益分配机制,促进入市收益的合理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如何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行了不断尝试,在不同阶段,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加强使用和监督管理。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方式、障碍和收益分配等问题展开了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通过梳理归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特征,结合经济发展状况,把农地

入市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通过分析试点地区经验,总结出具有代表性的入市模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有助于盘活我国农村存量建设用地,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政策变迁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城镇化、工业化对农村土地需求的状况,大致可把我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划分为四个阶段。

1. 自发入市阶段(1978—2002年)

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特别是沿海开放地区发展更加迅猛,对土地需求持续扩大。由于当时法律制度缺失,对村集体的用地决策权没有明确规定,与使用国有土地相比,集体土地使用价格低且容易审批。很多农村破旧祠堂、空闲的生产队用地、旧学校等闲置土地被企业租用,企业在此兴建厂房并组织生产。由于缺乏法律约束和监管,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违规将耕地出租给企业的现象。

乡镇企业的发展在促进当地经济繁荣和提高人们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刺激了对农村土地的需求。由于缺少科学的指导和具体的规划,很多地方的农村土地入市完全是混乱无序的,造成耕地流失、随意建厂等现象。1992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所有权属于集体的土地不得直接出让。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等用于非农业建设。这一时期严格的农村土地管控政策明显扭转了当时土地使用的混乱局面。事实上,在广东等东部省份,由于经济发展需要,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迫切需要大量土地的支撑,入市的隐形市场一直存在^[6]。这一阶段,虽然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缺乏政策

引导,但隐形入市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政府也开始考虑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行管控。

2. 探索入市阶段(2003—2007年)

2003—2007年,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经济每年平均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的快速扩张都需要大量的土地支撑,用地需求持续激增,城市征地规模不断扩大,导致许多征地纠纷出现^[7]。用地需求的激增和征地矛盾的凸显,客观上推动着对农村土地入市的深入探索。200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指出,集体所有土地在符合村庄土地规划的前提下,其使用权可以流转。这是我国农地使用权流转迈出的实质性的一步。2005年《关于规范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的意见》出台,土地的增减挂钩首先在江苏、四川等地开始试行。在这一时期,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加速,用地需求急剧增长,增减挂钩试点在部分区域推行,这为后来的改革积累了经验,指明了方向,标志着我国农地入市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突破,起到了提质增效的作用,但改革未能推行至全局。这表明还需要对改革进行深入探索,完善配套制度,破除改革阻力。

3. 深化改革阶段(2008—2013年)

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依赖,致使房地产价格飙升,房地产业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一方面造成城市用地持续增加,不断扩大征地规模,征地矛盾凸显,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城市的快速发展,吸引农村优质资源不断向城市流动,农村出现老年化、空心化,农村经济日益衰退。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被再次寄予厚望。

2008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实现集

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对农村土地产权进行规范,有序推进农地流转。2012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的规范化。这标志着我国农地入市改革进入深化改革阶段。

4. 授权入市阶段(2014年至今)

城乡二元制度的限制造成我国城乡发展失衡,要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必须打破农村土地的制度束缚。经过长期探索,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其合规入市,将有利于进一步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2014年印发的《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要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构建其与国有土地同等、同价、同权的入市规则,公平构建国家、集体与个人三方的收益分配机制^[8]。2015年,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大兴区等33个试点县(市、区)开展“三块地”改革^[8],其中有15个县(市、区)进行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试点改革。本次试点改革的目的更加明确,即对以往改革不理想的部分进行深层次的探索,如入市方式、收益分配等。此次试点探索被寄予厚望,试点成效直接影响此后法律法规内容的修改。

二、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典型模式经验

从33个试点县(市、区)的试点情况看,大多数区域进展顺利。试点地区根据自身区位条件、发展情况与经济实力,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发展的入市模式,形成了一批有价值、可操作的入市案例,典型的有贵州湄潭的新型综合类用地入市模式、浙江德清的异地调整入市模式、广

东佛山市南海区的集体土地整备中心入市模式和浙江义乌的“集地券”入市模式等。

1. 贵州湄潭的综合类用地入市模式

在中西部地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总量小、分布散。以贵州省湄潭县为例,全县符合入市条件的土地仅有107.01公顷,占全县集体建设用地总量的2%^[9]。如果只允许这部分存量用地入市的话,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在当地就不会收到较好的效果。湄潭县是西部典型的农业生产大县,地处内陆,乡镇企业数量少。但普遍存在农民将宅基地用于经营和居住的综合使用现象,使其不仅具备居住功能,还具备小商铺等经营属性。湄潭县充分结合当地特点,创新土地利用方式,创建综合类集体建设用地类型。由于宅基地部分功能改变,其作为经营的部分可进行分割登记,允许其在土地市场上进行出让交易。这种综合类用地的分割入市模式,将部分宅基地转变为可供入市土地,不仅扩大了当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规模,还有利于盘活当地宅基地资源,增加农村土地收益。

2. 浙江德清的异地调整入市模式

浙江德清地处沿海,拥有众多民营企业,对建设用地有较大需求。而德清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较为散乱、地块较小。在改革尝试中德清建立异地调整入市模式,不仅可以分散的地块聚集形成规模,而且也能照顾到区位较差的地块,最大程度显化土地价值。具体包括三种策略:一是自行换地入市,双方根据各自需要自愿进行调换;二是交易复垦指标入市,无法通过自行换地解决的,若有集体组织将自身经营性建设用地复垦,并愿意转让,其他集体组织可以通过购买其复垦指标同面积进行入市;三是集体合作入市,上述两种入市都不能实现的,集体之间可以通过合作入市,按比例进行土地收益分配。东衡村就是异地调整入市的典型例子。东衡村是洛舍钢琴的生产中心,随着洛舍钢琴知名度的提升,当地很多钢琴生产厂家急

需扩充厂房,扩大生产规模,但东衡村当时用地受限,通过购得临近村庄集体经营性土地的用地指标实现入市,临近村庄建设用地复垦^[10],用地指标在东衡村入市,既盘活了临近村庄的土地资源,为其带来增值收益,也破解了东衡村用地受限的困境。

3.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的集体土地整备中心入市模式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同样地处沿海,但其从20世纪就有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先例。这些土地获取成本低,为众多中小企业的前期发展提供了便利,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形成星罗棋布的企业分布格局,但土地利用较为零碎。此前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主要由村集体掌握,而一些大型项目的落地开发非常不便利,集中大片土地开发也较为麻烦,土地协调成本过高。另外,南海区部分企业面临转型升级,也需要连片和设施较为完善的土地用于生产。2016年,南海区创建全国首个集体土地整备中心,其下辖镇一级也成立相应的集体土地整备中心。南海区通过把存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托管给整备中心,由其代理进行土地的整合与前期规划开发,然后再由整备中心进行统筹入市。南海区通过建立集体土地整备中心有效解决了当地土地利用细碎问题,降低了土地统筹利用成本,也有助于大项目落地和大片土地开发,既能达到统筹使用土地的目的,又能避免因征地所导致的矛盾。

4. 浙江义乌的“集地券”入市模式

“集地券”制度是义乌市将农村闲置建设用地和其他零碎土地进行复垦,经过验收为合格耕地的,准予兑换成等面积的建设用地指标。“集地券”制度能够很好地将规划、占补和新增建设用地三项指标融为一体,较好地统筹“三块地”改革。“集地券”制度能够将偏远农村闲置的建设用地腾挪到城镇,有利于发挥农村土地价值,有效打通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间的“任督二脉”。“集地券”制度为农村建设用

地有序退出提供了新方案,符合中央提出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既没有触碰耕地红线,还能增加农民土地收益。通过“集地券”实现城乡土地空间等量交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城市建设用地需要,更好地促进城市发展。农村闲置土地经过整治,也将进一步优化农村空间布局,提高农民居住环境质量。

三、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临的问题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我国“三块地”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我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关键一招,对于实现与国有土地平等入市、改变传统土地入市方式有着重大意义。尽管各界在能够入市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试点地区改革也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其实践过程中还面临着复杂的环境和巨大阻力,仍存在诸多问题。

1. 入市与征地之间的矛盾

目前,我国的土地属于政府在一级市场上垄断,绝大部分土地出让金归属地方财政收入,而集体和农民只能从中获得较少的收益,政府、集体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处于扭曲状态^[1],而一旦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将打破现有利益分配关系,对现有征地制度造成一定冲击。一方面,通过入市获得的土地收益要高于征地所得,且产权仍然保留在村集体手中,在比较利益的诱导下,农民必然会选择通过土地入市获得较高的收益,这就会导致政府征地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入市的土地在市场上与国有土地形成竞争关系,使用者对土地有了更多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减少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

2. 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收益分配机制目前仍然模糊,收益如何分配缺乏理论指导和法律规定。现有的分配机制尚存在一定的弊端,未能兼顾地方政府、集体和农民三方利

益,从而带来很多相关纠纷。如果不对收益分配机制加以明确,可能会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进而会损害农民权益。一方面,村集体的负责人可能与企业私下操作故意压低入市土地的交易价格,以权谋私损害集体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收益分配关系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农民又处于弱势的一方,在地方政府、集体和农民三者利益分配时,地方政府会增加自己的土地收益比例,农民很难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入市配套规划缺失

在农村的大多数地区,土地规划落后,甚至有的地方并没有明确的规划,这就导致一些建设用地指标缺失,如容积率、建筑限高等。一些地区产业规划不完善,规划定位模糊,地方规划方案随意变动,难以形成土地的有效供给,即便有的村集体拥有大量可入市土地,由于配套规划的缺失,也难以吸引需求者。只有具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入市土地的使用才能严格遵循规划设计,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土地用于工业建设还是用于公共基础建设都会有详细的规定,也都会在地方发展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予以明确,从而有利于水电、管道铺设和交通等市政建设。土地规划缺失,不仅会让审批部门没有审批依据,也会让城镇发展处于无序状态。

四、破解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困境的建议

目前,我国城市土地市场供需矛盾重重,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将有助于缓解城市供地的紧张状况,对于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都有重大意义。但目前从试点反映的情况来看,虽积累了不少可以借鉴的经验,但入市仍面临着诸多阻碍,所涉利益矛盾突出。对此,必须对入市进行规范,增加城市土地的有效供给,稳妥推进农地入市改革。

1. 联动统筹入市与征地

征地仍然是目前用地供给的主要路径,城镇化仍然需要通过征地确保一定规模、一定面

积项目的建设。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作为征地制度的补充,同样对于土地供应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两者相互补充且又相互竞争。仅依靠征地供应,会使农民利益受损;仅依赖入市供应,难以满足现有城市的用地需求。因此,应合理界定征地的适用范围,保障农民的利益;统筹推进入市土地的供给,真正形成城市用地的有效供给;打造以征地为核心、入市为辅助的供地形式。具体来说,对于属于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而又需要大量土地的可采用征地方式,而对于规模较小、用地需求分散且用途多样的可以采取入市方式。

2. 规范收益分配机制

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村集体与农民三方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设置地方政府的增值收益调节金的最高比例,应以保障农民利益为中心,形成新的分配格局。首先,应建立土地增值部分的长效共享机制,增加入市的活力,完善兼顾三方的分配体系和土地收益在集体内部的分配方式,防止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收益分配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设定增值收益比例,不仅应充分激发地方政府参与的积极性,也应保障农民利益。其次,入市后,土地的价格会得到提升,农民无力对土地价格进行评估,容易出现村集体或地方政府合谋压低地价的情况,应完善入市市场的建设,通过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估值,充分保障各方利益。再次,应通过相关政策法规明确农民在收益谈判时的主导权,因为三者之中农民处于最弱势的一方,如果没有明确的制度来保障其议价权,农民必然难以获得较为公平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

3. 加快完善村庄相关配套规划

入市地区应加快村庄相关配套规划的设计,这是其入市的前提条件。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拥有农村建设规划的县不足40%,尚有近一半的行政村没有村庄规划。因此,这就需要有关部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加快推进各类村庄规划

的出台,同时应做好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和产业规划的协调衔接。在制定规划前,应注意积极听取群众建议,吸纳群众建议,以提高规划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同时应注意规划的稳定性与严肃性,规划一旦形成,任何人不得擅自随意改动。应尽量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划定村庄区域红线,协调好耕地与建设的关系,从而为农地入市改革提供空间管制依据。

参考文献:

- [1] 刘晓萍.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2020(10):137.
- [2] 孙秋鹏.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地方政府行为[J]. 上海经济研究,2020(11):5.
- [3] 陆雷,崔红志.“十四五”时期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任务[J]. 学习与探索,2020(11):110.
- [4] 孔祥智,周振. 我国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历程、基本经验与深化路径[J]. 改革,2020(7):27.
- [5] 陈红霞,赵振宇. 基于利益均衡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机制研究[J]. 农村经济,2019(10):55.
- [6] 高圣平,刘守英. 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现实与法律困境[J]. 管理世界,2007(3):62.
- [7] 马智利,陈锋,马敏达. 重庆地票二级市场的开放与交易机制研究[J]. 西部论坛,2014(3):1.
- [8] 黄建水,黄鹏. 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人大授权试点问题研究[J].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32.
- [9] 唐健,谭荣.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路径:基于几个试点地区的观察[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1):13.
- [10] 刘亚辉.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的进展、突出问题与对策[J]. 农村经济,2018(12):18.
- [11] 李怀.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改革:模式、困境与突破[J]. 东岳论丛,2020(7):128.



引用格式:杨明星,潘柳叶.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公共外交叙事模式[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3):55-61.

中图分类号:G206;D8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3.007

文章编号:1009-3729(2021)03-0055-07

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公共外交叙事模式

The narrative mode of public diplomacy for telling the story of the CPC

杨明星,潘柳叶

YANG Mingxing, PAN Liuye

郑州大学 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中国共产党难以读懂中国。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是当前中国公共外交传播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讲什么”与“怎样讲”是其中的核心要义。“中共党员是什么样的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问题是外国公众长期关心的重要议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应抓住时机,主动设置议题,积极回应海外公众关切。在公共外交与全球话语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背景下,应积极探索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新路径、新方略;应充分发挥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技术优势,强力构建全社会、多主体、多层次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公共外交叙事模式。

关键词:

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
公共外交;
外交叙事

[收稿日期]2021-05-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318)

[作者简介]杨明星(1966—),男,河南省信阳市人,郑州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原文化名家,河南省特聘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外交话语与外交叙事学;潘柳叶(1994—),女,河南省驻马店市人,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外交语言学、外交叙事学。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遭遇世纪疫情,使国际局势和对外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消除他国的偏见与误解、赢得他国的理解与认同,成为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任务。长期以来,由于全球话语权和叙事体系一直被西方媒体操控和主导,中国面临着“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话语传播困境。面对世界新形势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1]。外交叙事是在外交语境下采取故事化、情节性的话语方式,旨在获得国际受众的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的一门科学。中国共产党故事是中国故事的核心内容^[2],要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二者都与公共外交传播工作密切相关。构建新型公共外交叙事模式,可为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故事提供学理支撑。

一、疫情背景下全球公共外交叙事模式的新动向新态势

经济全球化和以互联网新媒体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公共外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两个体系不再处于长期相对割裂的状态。事实上,现代公共外交理念已逐渐从对外宣传走向国际传播,国际传播已然成为公共外交的核心载体^[3]。依靠大众传播的公共外交叙事,以国外公众为传播对象,以影响国际舆论、塑造本国形象为传播目的,其发展态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全民广泛参与,非政府行为主体成为公共外交的生力军

传统的公共外交以单向宣传式的说服为目标,主要以国家和政府为中心,而当前的公共外交则是一种以社会为中心的新公共外交。新公共外交以文化交流活动为主要载体,旨在培育他国公众对本国的好认知^[4]。从行为主体上

看,网络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使得信息传播和接收的门槛不断降低,公民个体作为外交传播者的主体性进一步增强,可以说人人都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5]。社会团体、意见领袖、普通网民等非政府行为主体一跃成为公共外交的生力军,他们在一些敏感的国际问题上勇于发表意见、传递普通民众的声音,成为国家主体外交的“风向标”。在中国故事对外传播中,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外国网红们同样充当着关键意见领袖的角色。以色列短视频博主高佑思亲自前往新疆游历,通过网络短视频,以在华外国人的视角向全世界介绍新疆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以此戳破西方媒体编造新疆存在“强制劳动”的谎言。

2. 公共外交数字化和融媒体化,网络空间成为重要舆论阵地

公共外交行为主体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公共外交形式的多样性^[6]。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5G、智能推荐算法、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的运用与普及,使得公共外交愈加数字化、融媒体化,网络空间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舆论阵地和竞技领域。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7]。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互联网新媒体在中国故事的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桥梁和媒介角色,赋予了广大网民参与公共外交事务的广泛发言权。在2020年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数字化公共外交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优势。中国社交媒体组织“全球疫情会诊室”的线上直播活动,进行国际援助、传授抗疫经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全球对中国的舆论偏见,有效地塑造了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8]。此外,中日韩三国民众守望相助,携手抗击疫情,所谱写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道不远人,人无异国”的外交叙事也在国内外网络上广为流传,获得了海外民众的广

泛认同。

3. 以公众需求为导向,传播对象更加精细化

与政府间外交相比,公共外交是一种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外交形态^[9]。公共外交的传播对象是海外公众,主要目的是影响公众的认知和行为,进而为外交政策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因此,为了实现公共外交效果的最大化,必须对外国公众进行有意义的精细划分,从“以我为主”式的“自说自话”转向以外国公众的信息需求为导向,开展有针对性的公共外交。一个国家的公众舆论主体主要分为普通公众、专注公众、舆论精英和舆论领袖^[10]。不同的社会公众主体关注的国际问题以及关注程度不同,在公共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精准化对外传播必须明确传播对象,聚焦国外舆论精英和舆论领袖对中国存在的信息偏差与信息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回应和解释,以实现公共外交传播效果的最优化和最大化。就欧美国家的舆论精英阶层不断污名化中国抗疫的事件,对外传播应有针对性地解释和说明中国的防疫政策和抗疫成果,以减少信息偏差所造成的舆论偏见^[11]。

4. 文化在公共外交叙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也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代,文化元素在外交事务中的作用愈加突出。除文化交往本身外,文化元素及其影响还内嵌在政治、经济合作与民间交往方面。与政治、经济外交相比,文化外交具有柔和性与和平性,能够淡化政治色彩,缩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裂痕,从文化亲近最终走向政治亲近和经济合作^[12]。正如赵启正所指出的,在美国,公共外交做得最好的不是政府,而是好莱坞,好莱坞将美国的声音传遍世界^[13]。好莱坞电影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作为一种无意识的文化形态,渗透着美国的文化内涵和意识形态。

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创作的《三体》三部曲经过翻译顺利“出海”,作品中蕴含的中国特色文化元素和思想精神深受海外读者喜爱。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原主任委员傅莹也曾引用《三体》里面的“黑暗森林”法则来回应朝核问题^[14]。

5. 西方虚假信息泛滥成灾,肆意抹黑中国共产党形象

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调整,西方媒体借助“西强中弱”的国际传播秩序,站在世界舆论的“制高点”,蓄意制造、散播误导国际受众的外交谎言与虚假信息,企图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舆论攻击。话语强势群体为煽动仇恨、制造隔阂、转移责任,利用公众既有的信息偏见,动用各种手段将之扩大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进而影响公众的认知和判断,这种污名化行为往往具有严重的渗透性与破坏性^[15]。因此尽管中国的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工作始终致力于对外阐释中国方案、中国主张,但西方国家“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新殖民主义”仍甚嚣尘上,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象。围绕此次新冠疫情,西方大肆炮制“中国病毒”“武汉病毒”“东亚病夫”“中国隐瞒”等妖魔化、污名化中国的话语,试图将疫情政治化,丑化中国抗疫形象,给公共外交传播提出严峻挑战。

二、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叙事内容

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故事,需要强化受众意识,推进外交叙事模式的故事化、形象化构建^[16]。公共外交传播发展的新动向新态势也表明,以国际公众信息需求为导向的定制化、故事化的传播内容具有更好的传播效果。以西方受众理解和熟悉的叙述方式,讲述真实生动、贴近个体的情感故事,可营造正面积极的中国形象。塑造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的良好

形象涉及“讲什么”的问题。需要重点分析不同国际受众的群体心理和文化特征,精心选择国际受众好奇、存疑的议题,以答疑解惑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解答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问题。

1. 讲好普通中共党员的故事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受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共党员都存在着严重的误解与偏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对外讲好普通中共党员的故事、揭开中共党员的“神秘面纱”是公共外交传播工作的重点之一。讲好中共党员的故事,要善于利用以小见大的视角,选取大量有代表性的党员事迹进行个体写实,让国外受众切实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由众多普通个体汇聚而成的旨在为人民服务的大国政党组织。身患渐冻症仍坚守在抗疫一线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托举起无数大山女孩求学梦的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以及许多长期坚守在扶贫路上的基层党员干部,都是当代中共党员的优秀代表,是讲好普通中共党员故事的生动案例。自2021年1月4日起,《人民日报》(海外版)开设了《感人肺腑的中国故事》栏目,选取报道了大量基层中共党员事迹,以生动故事改善了国外民众眼中的中共党员形象。此外,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党员也可以结合自身经历,成为中国共产党故事的讲述者。学生党员的语言生动朴实、贴近生活,更具有感染力,传播效果不容低估。同时,举办中外大学生线上对话,可坦诚回应国外民众对中共党员长期存在的质疑与误解。

2.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时期,一直到新时代这建党100年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与使命不断前

进^[17]。不少美国政客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肆意渲染和炒作各种反华议题,以“阴谋论”“渗透论”等荒谬论调来诋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利益当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新冠疫情肆虐之际,无数冲在抗疫一线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粉碎这些妖魔化论调的最有力自辩^[18]。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必须讲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述的长征途中女红军赠予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村民徐解秀半条被子的故事,生动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血脉相连、同甘共苦的初心与使命^[19]。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其背后所发生的诸多真实而动人的故事是对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与使命的最好诠释。

3. 讲好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普遍渗透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与实践中,“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天下为公”等执政理念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而且代表着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和精神追求,具有普适性的世界价值^[20]。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必须向世界人民阐释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和中国所秉持的平等、合作、互惠、共赢等理念对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与普遍意义。针对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彰显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执政党的国际视野、时代担当与世界责任。讲好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需要寻求两

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延展中国与世界共通的价值与利益诉求,以国际受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叙述方式,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蕴含的世界价值讲清楚、讲明白,进而获得世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执政形象的支持与认可。

三、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叙事模式

当前,全球公共外交叙事在各个层面正经历重大转变,国际传播的格局和理念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因此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公共外交叙事模式同样需要与时俱进。

1. 主动设置议题,强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主体性与主导性

导向需求概念表明,每个人都有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但外部世界的信息复杂而繁多,作为个体难以判断自己应该关注什么、重视什么,因此需要引导机制发挥作用^[21]。在开展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中,中国共产党应增强在讲好自身故事工作中的主体性与主导性,主动设置议题,及时回应海外公众对中国政党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好奇心与关注点,掌握国际舆论的主导权与解释权,积极引导国际舆论走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主动设置议题、回应海外公众关切的最佳时机。公共外交应围绕“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议题,积极发挥自身的主导性和联动作用,组织社会各界通过文化交流、公众对话、海外宣讲、视频制作等传播手段,以及纪录片、影视剧、漫画、综艺节目、电子画册等产品样态,多渠道向海外公众普及中国共产党知识、介绍中国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2. 注重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表达

讲述中国共产党故事时要用国际社会听得

懂的、喜闻乐见的、易于接受的方式介绍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不同语言、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国际受众定制、生产精准化的故事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故事全球化表达过程中,翻译扮演着重要的桥梁角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重要党政文献,蕴含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与思想内涵,是外国读者走近中国,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外交政策的重要载体和窗口。目前中央文献的非通用语版本的翻译、出版和发行往往滞后于中英文版本,导致非英语国家的受众群体不能及时了解中国最新的政治思想与发展成果。因此中国外宣部门、外文出版机构应更加主动地与国外出版社及海外营销渠道进行合作,加快推动中央文献的多语种翻译和出版,及时满足海外非英语国家读者了解中国的信息需求。

3. 植根红色文化,以文化人,在中外人文交流中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

在多元包容的全球文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需要植根红色文化的沃土,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推动中国红色文化元素走向世界,增强外国公众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了解和认同。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红色文化素材与红色故事。应依托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富有地方特色、兼具趣味性与纪念性的文创产品,吸引海外年轻游客主动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与此同时,还应不断丰富红色文化产品样态,根据不同外国受众群体的习惯与特征,将 VR/AR 沉浸式体验、实景表演与红色文化宣传进行融合,以打造可视化、立体化的创意文化产品。此外,红色文化对外传播,还需要翻译先行。各地红色纪念馆与革命遗址应加大外文网站建设力度,提高外文导览和传播水平,推进红色文旅服务的数字化与融媒体化,以更好地服务于红色文化与红色故事的对外传播。

4. 全社会共同参与,一致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

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需要共产党员、政府官员、社会组织、民间团体、舆论精英、普通公民等所有中国公民的共同参与,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自上而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公共外交氛围。在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过程中,国家领导人直面国外公众,讲述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会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在故事内容上,不仅要讲述中国深化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还应讲述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不仅要讲经济、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应讲中国在实现现代化、强国梦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苦。

与此同时,学术团体、民营企业乃至普通民众都应主动参与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故事的讲述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民营企业从“中国制造”逐渐走向“中国创造”,引领全球开启5G时代;边远农村贫困户易地搬迁,脱离贫困,实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双富裕等,这些都是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十分鲜活的素材。

5. 依托互联网和新媒体,传播好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

塑造中国共产党良好的国际形象,还需要依托网络技术对外传播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在互联互通的数字化时代下,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力量讲述和传播中国共产党故事,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新型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与全世界年轻人进行对话交流,高效传播中国特色发展理念。同时,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应在国际社交媒体空间中打造以官方媒体为主导、自媒体与商业媒体协同发力的多主体、多层次的话语矩阵。精准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形象,应以建党100周年为契机,围绕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在优兔、脸书、照片墙等国际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广泛传播。

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不仅要擅于利用国际社交媒体,还要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创建中国自己的传播平台。百度、阿里、腾讯中国三大互联网公司(BAT)以及以新兴企业字节跳动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不断开拓全球市场,已拥有广泛的国际用户,尤其是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视频内容生产平台,备受西方年轻网民群体的喜爱。在后疫情时代传播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应充分利用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海外市场与国际用户。

四、结语

在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的复杂背景下,西方国家利用虚假信息与谎言,肆意抹黑,贬损中国共产党形象。这给中国国际传播工作带来严峻挑战。中国公共外交叙事体系在行为主体、行为方式、传播对象、传播内容和传播媒介方面应与时俱进,进行战略调整。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需要聚焦国际受众好奇、存疑的议题,集中讲好中国共产党普通党员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讲好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应提高在国际传播中的议题设置能力,增强在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中的主动性和主导性;构建多主体、多层次、多角度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大外宣”格局;依托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充分发挥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技术优势,以国际化的表达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共产党可亲、可敬、可爱的大党形象。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N]. 人民日报, 2021-06-02 (01).
- [2] 韩方明. 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J]. 公共外交季刊, 2021(1):1.

- [3] 叶皓. 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6):11.
- [4] 郑华. 新公共外交内涵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4):143.
- [5] 杨明星,周安祺. 新中国70年来外交传播体系的历史演进与发展方位[J]. 国际观察,2020(5):107.
- [6] 周志高. 当前环境下公共外交中的叙事研究[J]. 社科纵横,2015(5):64.
- [7]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1-02-03)[2021-05-12].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yzbg/hlwtjbg/202102/t20210203_71361.htm.
- [8] 史安斌,童桐.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数字公共外交:挑战与创新[J]. 对外传播,2020(5):24.
- [9] 韩方明. 公共外交概论[M]. 2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2.
- [10] COHEN B C. 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33.
- [11] 张生祥.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对策分析[J]. 对外传播,2020(10):17.
- [12] 程敏,申达宏,张健. 世界大国(地区)文化外交·俄罗斯卷[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4.
- [13] 王晓静. 赵启正:推进公共外交,讲好“中国故事”[J]. 国际人才交流,2014(9):46.
- [14] 吴晓杰,殷泓. 18个问题11次谈“法”[N]. 光明日报,2016-03-05(04).
- [15] 徐旭. 试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污名化中国的原因与应对[J]. 对外传播,2021(4):39.
- [16] 杨明星.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6-17(A01).
- [17] 李贞海,刘宗灵. 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历史内涵[J]. 新西藏(汉文版),2021(1):36.
- [18] 吴波. 美政客对中共的诋毁散发霉味[N]. 环球时报,2020-07-29(015).
- [19] 朱晓露. 从“半条被子”故事体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N]. 科学导报,2021-05-14(B03).
- [20] 张一,吴倩倩. 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的国际传播力[J]. 红旗文稿,2018(11):27.
- [21]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97.



引用格式:姜国峰. 大数据时代河南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四重路径建构[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3): 62 - 66.

中图分类号: G122; G20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2186/2021. 03. 008

文章编号: 1009 - 3729(2021)03 - 0062 - 05

大数据时代河南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四重路径建构

The construction of four ways for Henan to protect, inherit and promote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in the big data era

姜国峰

JIANG Guofeng

河南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91

摘要:借助大数据技术探究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实现路径,对于河南切实履行好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责任使命,增强河南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河南应深度挖掘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绘制中华文明的现代图谱;构建黄河流域协同发展机制,拓宽黄河文化辐射范围;打造数字黄河智慧工程,汇聚文化强省的河南动力;延展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空间载体,培育河南黄河文化品牌。

关键词:
黄河文化;
大数据;
黄河流域;
协同发展

[收稿日期] 2021 - 05 - 14

[基金项目] 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12400410264);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2021 - JCZD - 09); 河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2021JKZD14);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BKS128)

[作者简介] 姜国峰(1980—),男,黑龙江省勃利县人,河南工程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传播。

黄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最深厚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需要立足新时代、借助新技术、采用新模式,以推动黄河文化的高质量发展。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以及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对全面促进大数据发展提出的方向性目标和任务,则为在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中深度应用大数据技术提供了正确指引。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一步为运用大数据技术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特别是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将黄河文化提升到文化自信、民族复兴的新高度,突出强调了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成为当前做好黄河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由此可见,利用大数据技术打造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新模式,不断提升黄河文化传播的效能,实现高质量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之目标,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时代课题。

当前,关于黄河文化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社会各界关于黄河文化的学术成果、新闻报道、实践案例大量涌现,为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和实践参照。例如,王承哲^[1]围绕黄河文化的内涵特征开展了研究,认为黄河文化既是各类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又是由各类亚文化层次构成的庞大文化体系;苗长虹^[2]认为黄河文化的根源性、持续性、包容性、统一性和创造性是其主要特征;徐光春^[3]对黄河文化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

华民族的根和魂;牛建强等^[4]从激发黄河文化精神、加强黄河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做好现当代黄河文化的传播等方面,探讨了传承与弘扬黄河文化的实现途径。关于大数据时代河南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研究,江凌^[5]建议打造有关黄河历史文化的大数据库,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朱涵钰^[6]认为,实现黄河文化传播的可视性有助于扩大黄河文化的认同感和影响力。

当前,有关大数据时代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研究与探索,在实践层面初步显现出涉及维度不断拓展和对不同技术形式的使用,在理论层面也逐渐引起社会学、信息科学、新闻传播学等不同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是如何借助大数据构建黄河文化的理论与实践框架的研究成果尚不丰富。鉴于此,本文拟遵循由里及表的原则探讨黄河文化与大数据技术相匹配的方式方法,进一步探索拓宽黄河文化数字化传播的路径,以期提升黄河文化的影响力。

一、深度挖掘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绘制中华文明的现代图谱

目前关于黄河文化的概念林林总总、角度多样,不利于实现黄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此,需要立足传统与现代,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深度挖掘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将其现代样态通过大数据技术充分呈现出来,为凝聚高度认同的文化符号,以“根”和“魂”建构宏大叙事的黄河文化内涵提供理论支撑^[7]。从目前的实践成果看,以郑州为核心的河南黄河文化内涵的宣传活动丰富多彩,通过诸如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2020年央视春晚分会场、2020年央视中秋晚会的河南元素、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等“国字号”盛事,依托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中国十大忙碌城市之一、机遇之城 2020 榜单第十、“米”字形高铁、智慧城市、5G 建设排头兵等城市名片,为黄河文化内涵彰显和时代价值体现提供了新载体,黄河文化在河南大地上得以有效地传承、创新和发展。

下一步,河南应大力开展黄河文化数字化科普工作,将黄河文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利用黄河文化数据资源库、黄河文化传播网站、黄河文化信息化推广公众号等,拓展黄河文化宣传平台,不断强化同根同源的民族认同;借助大型赛事和文化类活动,广泛渗透黄河文化创新元素,累积黄河文化自信的广泛社会基础。例如,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进一步扩大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世界影响力,广邀海内外炎黄子孙关注、参与到拜祖大典中,大力宣传同根同源的意义所在,做大做强根脉文化和寻根问祖文化的规模与水平;利用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机遇,不断营造具有黄河文化丰富意蕴的河南文化氛围,打造具有黄河文化特色的河南文化数字化品牌,形成依托数字化品牌传播文化的内生效应,续写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的现代图谱。

二、构建黄河流域协同发展机制,拓宽黄河文化辐射范围

河南作为黄河流域的重要省份,郑州作为沿黄流域的重要节点城市,天然承载着打造全国黄河文化高地的重要使命,也是河南“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战略任务的重要抓手^[8]。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区和主体区,河南应在自觉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中主动作为,利用自身特色优势勇担引领示范的河南使命,扛稳河南责任,加快由文化建设的“跟跑者”向“引领者”角色转变^[9]。在首届黄河流域教育高质量发展论坛上,河南省副省长霍金花指出,应优化全域教育布局,形成沿黄九省区教育协同发展机制^[10]。这既为黄河流域沿线加强教育合作提供了新思路,也

为树立“大黄河”流域发展共识,积极探索黄河文化区域融合,实现黄河“一盘棋”唱响新时代“黄河大合唱”的美好愿景提供了新方向。应把黄河文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内,重点传播黄河文化的内涵、思想,使青年学生对黄河文化的认知体系化、模块化。尤其是应发挥高校在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过程中的带动作用,积极利用现代科技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应以“互联网+教育”为基础,围绕黄河构建大数据特色专业体系,建立区域高校黄河文化研究联盟,跨区域的科教协同、产教融合的技术创新中心,形成网络化、大协作的技术创新平台;设立黄河文化专项研究资金,深入开展专题科学研究,为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提供决策咨询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应以“互联网+文旅”为核心,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随着数字技术与文旅资源的加速融合,以数字内容为核心的数字文旅产业已成为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应以黄河文化为核心,充分运用网络动漫、网络音乐、数字艺术、沉浸式文旅等形式,不断推动黄河文化与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超高清等科技创新成果融合发展,大力提高黄河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应利用中原城市群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充分发挥郑州作为中原城市群的龙头带动作用,实现黄河流域与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区文化旅游的互惠合作,从而打造既能凸显地方区域特色,又能代表黄河流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精品文化旅游项目^[5]。例如,2020年9月7日,全国首家黄河文化旅游研究(大数据)中心的成立,就是借助旅游大数据将黄河元素打造成网络热点的有益尝试,有助于加快黄河流域文旅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步伐。

三、打造数字黄河智慧工程,汇聚文化强省的河南动力

黄河智慧工程主要是依托网络、移动媒体、数字电视、数字报刊、微视影像等媒介,实现黄河文化的数字化、智慧化和信息化目标,凸显时间上的及时性、空间上的广泛性、强烈的互动性等多重优势。应积极适应新媒体背景下“微型、互动、跨屏融合、低语境传播”的特点,充分体现黄河文化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性和互动性,建设黄河文化数字馆。可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形式,使黄河文化成为公众的兴趣所在和目标焦点;可借助VR、AR等技术提供更直观形象的传播方式,全面推进黄河文化更清晰、客观、动态的传播。例如,2021年河南春晚中的《唐宫夜宴》《白衣执甲》等节目出现大流量热搜的现象,为大力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提供了有益启示,为推进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探索了新路径。所以,应融合好传统和现代,结合好科技和创新,统筹好内容与形式,创新表达方式,用新技术、新理念让历史走进现实,让传统文化“活起来”^[8]。对此,河南应利用科技赋能文化,挖掘硬核河南故事,创新用文物讲故事的方式,紧扣人民需求,讲好、讲活、讲精、讲实黄河故事,创作出有温度、有情怀、有立体感、有内涵的黄河文化作品,以凝聚起建设现代化河南的强大正能量。同时,还应通过网络数字化技术及其语言,对嵩山文化、古都文化、黄帝故里文化、大运河文化、殷墟文化、甲骨文文化等进行数字化提取、技术化编程,建立黄河文化数据库,为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提供有力支撑。

四、延展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空间载体,培育河南黄河文化品牌

黄河文化品牌的培育,可以借助的空间载体非常丰富,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空陆网海”四条丝绸之路,是黄河文化对外传播的新途径,也是实现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的新方向。

首先,应拓宽黄河文化的传承载体和传播渠道。网上丝绸之路是大数据时代的产物,也是现代信息技术充分运用的新空间,可促进黄河文化高质量传播。另外,越飞越广的“空中丝绸之路”、越跑越快的“陆上丝绸之路”、越来越便捷的“网上丝绸之路”、越来越顺畅的“海上丝绸之路”,则可大大拓展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黄河文化的传承载体和传播渠道,促进黄河文化深入人心。为此,应借助各种传播载体,对外讲述中国故事、黄河故事、河南故事,传递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促进发展的真诚与努力,塑造有高度、有宽度、有广度、有深度的黄河文化内涵,将“四条丝绸之路”打造成黄河文化高质量对外传播的新空间载体^[11]。

其次,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品牌,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部署。郑州作为沿黄规模体量最大的城市,应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不仅要讲好黄河故事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还要讲好郑州在黄河故事里的历史和未来,进而在讲好黄河故事的同时彰显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的魅力,让河南在黄河故事里的角色更加出彩。为此,应大力推动黄河文化与红色文化、元典文化、姓氏文化、汉字文化等融合发展,对蕴含其中的人物、典故、道德礼仪等元素进行深入发掘,以新的表现手法进行演绎表现,开发创作出具有中原特色、民族内涵、时代风貌的影视歌曲、动漫产品、舞台剧目、大型实景演出,以新业态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生命^[11]。应进一步扩大龙门石窟、安阳殷墟、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等世界文化遗产和太极拳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名片影响效应。例如,2020年12月河南运用“科技+文化”等数字创意,从数字小程序、音乐、短视频、QQ手办、表情包、文创产品6个维度,打造极具河南特色的“老家河南黄河之礼”非遗数字馆,支持郑州、开封、洛阳、安阳、焦作等城市建设成为国际文

文化旅游名城, 叫响“老家河南”“中国功夫”品牌, 推动中原文化走向世界, 这是用国际话语体系阐述黄河文化价值内涵的具体行动, 实现了传统文化转化成“顶级流量”的美好目标^[12]。

再次, 应依托黄河流域的特点与黄河文化的要素精华, 打造黄河文化地标城市品牌。打造新时代黄河文化地标是树立中原文化、黄河文化自信的需要, 是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的需要, 也是河南作为文化大省应该有的责任和担当^[13]。河南打造新时代黄河文化地标拥有自然、地理、文化等方面突出优势, 应深入挖掘、弘扬黄河文化精神, 承担起黄河文化发展的使命^[8]。重点是依托区域标志性文化资源, 构建具有中原审美特色的黄河文化地标体系; 深入挖掘具有地标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 培育地方文化品牌; 确立郑州“华夏之根、黄河之魂、天地之中、文明之源”的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地位;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便利在各大媒介上推广黄河主地标城市的历史传承、现代发展; 尽快健全与黄河主地标城市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提升郑州的城市文明度、认可度和美誉度。

当前,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已经成为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 既应立足当下, 更应着眼未来。为此, 应坚持“着眼大局、立足长远、围绕根本、抓实当前”的原则, 统筹做好“十四五”时期黄河文化品牌的战略规划布局。在高度上, 应积极拓宽视野, 不断扩大“朋友圈”, 整合跨区域文化资源, 构建国际化格局; 在宽度上, 应从黄河文化中汲取创新动力, 打造良好运营环境, 整合零散文化资源向产业化发展转型; 在深度上, 应强化同根同源的民族认同, 充实黄河文化内涵促进品牌化进程; 在维度上, 应积极打好“组合拳”, “拳打脚踢四面出击”, 借助文旅深度融合拓宽艺术化载体。大数据时代为传递黄河声音、展示河南形象提供了便利条件, 更为用黄河故事打动中国, 用“河南流量”引领世界, 提升

黄河文化的全球吸引力、辐射力和感召力提供了新机遇, 我们应以数字化、国际化、时尚化、品牌化的方式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参考文献:

- [1] 王承哲. 黄河文化的生产力视野及其范式建构 [N]. 河南日报, 2020-09-24(18).
- [2] 苗长虹. 黄河奔流, 激荡古今文化大气象 [N]. 光明日报, 2019-12-31(07).
- [3] 徐光春. 谈谈黄河文化与炎黄文化: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的体会 [N]. 河南日报, 2020-08-18(06).
- [4] 牛建强, 姬明明. 邦命维新: 黄河文化的现代转型(下) [N]. 黄河报, 2020-12-22(02).
- [5] 江陵. 切实扛起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历史责任 [J]. 河南日报, 2019-12-06(04).
- [6] 朱涵钰. 信息技术助推黄河水文化的数字化传播 [J]. 新闻爱好者, 2019(12): 27.
- [7] 杨越, 李瑶, 陈玲. 讲好“黄河故事”: 黄河文化保护的创新思路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12): 35.
- [8] 李庚香. 河南“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的指导原则和重大举措 [J]. 领导科学, 2018(2): 27.
- [9] 李铮, 冯芸. 王国生在省委宣传部调研座谈时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凝聚出彩合力紧扣百姓需求讲好黄河故事 [N]. 河南日报, 2021-02-19(01).
- [10] 王胜音, 付豪. 首届黄河流域教育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河南郑州开幕 [EB/OL]. (2020-10-31) [2021-03-05]. http://difang.gmw.cn/ha/2020-10/31/content_34326912.htm.
- [11] 打造新时代黄河文化地标, 全面展示黄河文化魅力 [N]. 河南日报, 2020-07-29(09).
- [12] 河南“空陆网海”四条丝绸之路稳定畅通保障防疫物资运输 [N]. 河南日报, 2020-02-26(06).
- [13] 江凌. 推动黄河文化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N]. 学习时报, 2020-01-03(01).



引用格式:张博文,孟晓辉. 新时代黄河文化元素数字化艺术传播创新路径研究[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3):67-72.

中图分类号:G122;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3.009

文章编号:1009-3729(2021)03-0067-06

新时代黄河文化元素数字化艺术传播创新路径研究

Research on the creative communicative path of digital art of the Yellow River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New Era

张博文¹,孟晓辉²

ZHANG Bowen¹, MENG Xiaohui²

1. 郑州轻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2. 开封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关键词:

黄河文化;
数字化艺术;
SMCR 模型;
精准传播;
艺术转译

摘要:黄河文化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指基于黄河文化元素内涵,创作出数字化艺术作品,并借助数字化艺术传播媒介进行的一切艺术传播活动。当前黄河文化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还处在低水平发展阶段,亟须推动其高质量发展。根据 SMCR 模型,黄河文化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应增强信源传播力,实现精准传播;加强数字化艺术传播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提炼形态化符号语言,注重数字化艺术转译;利用新技术通道,打造沉浸式体验。

[收稿日期]2021-04-26

[基金项目]郑州轻工业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13501050017);河南省科技厅重点研发与推广专项(软科学)项目(212400410284)

[作者简介]张博文(1990—),女,河南省开封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数字媒体艺术与信息设计;孟晓辉(1982—),女,河南省濮阳市人,开封大学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产业、新媒体。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五千年华夏文明的根源,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1]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关于宣传、弘扬黄河文化强调:“要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工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开展黄河文化宣传,大力弘扬黄河文化。”^[2]2020年不到一年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考察黄河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不仅要传承黄河文化的悠久历史,更要深挖黄河文化的新时代的内涵,弘扬新时代黄河文化精神。正所谓“世易时移,变法宜矣”,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要与时俱进,结合新时代背景,运用数字传播手段,以创新推进黄河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和新的生命力。“讲好黄河文化,传播好黄河声音”成为新时代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目前,学界对于数字化艺术传播的研究较少,探讨如何借助数字化手段对传统文化进行艺术化的再创造尚未深入。鉴于此,本文拟在分析黄河文化元素数字化艺术传播内涵、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运用SMCR模型,确定其构成元素,并借此探讨其创新路径,以供参考。

一、相关概念界定

1. 数字化艺术传播

在传播学中,传播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符号传递信息、观念、态度、感情,以此实现信息共享和互换的过程^[3]。依据传播学对传播的界定,可以将艺术传播理解为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和传播方式,将艺术作品或艺术信息传达给受众的过程。显而易见,艺术传播的发展离不开传播媒介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传播媒

介的进步史,就是一部媒介推动艺术传播的历史”^[4]。从口头传播到文字传播,从印刷传播到电子传播,再到如今的信息传播,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催生了数字化模式,也深刻影响着艺术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

作为数字化艺术与艺术传播相结合的新领域,数字化艺术传播泛指新媒体背景下,以数字科技为介质,通过数字化传播平台所进行的一切艺术传播活动。数字化艺术传播是呈现多种信息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是直接作用于人感官的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和视频等各种媒体融合现象的统称^[5],主要由数字化艺术作品、数字化艺术传播媒介、传受关系等要素构成。其中,数字化艺术传播媒介可以依据媒介的功能分为两类:一是将艺术交流等活动作为目的的数字化传播平台,如移动终端、互联网平台、数字博物馆等;二是以媒介技术本身为创作内容的艺术作品,如一些虚实艺术、装置艺术、互动艺术等。

2. 黄河文化元素数字化艺术传播

黄河文化是以黄河流域的地域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元素综合体^[5]。从地域上来看,黄河的上、中、下游都形成了地域特色鲜明的文化类型,如河套文化、先秦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等;从时间上来看,黄河文化涵盖了上至万年前的旧石器文化,直至今天的现代文化,并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最为发达;从文化属性上看,黄河文化包括了农耕文化、草原文化、丝路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海洋文化等。黄河文化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包罗万象,呈现出连续性、根源性、正统性、包容性、创新性的特征^[6]。总体而言,黄河文化是华夏民族在黄河流域开展各种与自然进行交互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所具有的文化精神在当今社会发展中拥有更丰富的内涵。

文化元素是指传统文化或文化遗产的基础构件和象征符号^[7]。黄河文化元素是象征化、意象化和提炼化的符号,反映了黄河流域历代

人的集体记忆和相近的情感,具有弘扬传统文化精神、传承华夏历史文明、增强民族自信、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的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在数字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黄河文化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泛指基于黄河文化元素内涵,创作出数字化艺术作品,并借助数字化艺术传播媒介进行的一切艺术传播活动,使黄河文化在当代以一种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形式传播下去。这有利于高质量弘扬黄河文化,促进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升级,引领文化发展,增强民族自信,实现我国国家形象由“自塑”到“他塑”的跨越,助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地位。

二、黄河文化元素数字化艺术传播现状

在数字化产业快速发展的今天,以移动智能手机、门户网站和数字电视等为代表的新媒介共同构建了新的数字媒介环境,以微信、微博、短视频等为代表的新兴社交媒介异军突起,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平台。新媒介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和信息传播方式,也为传统文化的转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8],使文化的存在形态不断向数字化转变。近年来,一些旨在传播黄河文化的手机移动程序、影视艺术、电视综艺、动漫游戏等各种数字化艺术形式不断发展与成熟,使得黄河文化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元素在新时代焕发了蓬勃的生命力,并且为黄河文化的数字化艺术传播提供了新思路。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腾讯文旅推出首个河南非遗数字馆官方微信小程序“老家河南黄河之礼”^[9],其应用设置多个融合黄河文化元素的趣味线上互动体验板块,可使用户感受“科技+文化+艺术”带来的移动数字化非遗交互体验。“互联网+传统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以移动交互软件等为主的新兴艺术传播渠道为黄河文化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提供了新路径。

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涌现出一系列以黄河为主线的电影,电影节还特别策划了三部公益主题短片《你好吗》《一颗种子》和《云上致富路》^[10],这三个发生于黄河岸边的故事分别对应“抗击新冠疫情”“黄河精神”“脱贫攻坚”三个主题,黄河文化元素贯穿始终。浙江卫视推出的人气户外竞技真人秀《奔跑吧·黄河篇》以黄河生态经济带沿线地区为依托,跑进黄河上中下游沿线重要城市。该节目将黄河文化元素与游戏、直播带货扶贫等相结合,以明星和综艺流量带动更多的人去了解黄河文化,展现黄河流域的重要地位,描绘黄河生态经济带城市文化之美^[11]。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历史、自身的特殊性、当下的快速发展、变革的新技术和新的社会形态等原因,黄河文化元素数字化艺术传播尚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目前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有:缺乏对目标受众的传播培育和分层,目标受众对黄河文化认知不足;黄河文化呈现多元一体的特征,但整体来说黄河文化资源较为分散,虽近年来已开展了保护、传承、展示等活动,但尚缺乏对相关图片、影像、非遗代表作品的系统的数字化整理;对黄河文化的特色缺乏足够认识,其数字化艺术传播发展不均衡;对黄河文化的经济、文化价值挖掘不够,其数字化艺术设计及艺术产品的转化质量不高;受众与文化元素间的信息交互力度不够,其交互、体验、反馈与二次自主传播的参与性较弱,无法形成完整的传播链条。

三、黄河文化元素数字化艺术传播构成要素

黄河文化元素数字化艺术传播本质上是信息传播,在这里我们引入美国传播学家贝罗的SMCR模型来分析其构成要素。该模型综合了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大众传播学、行为科学等理论,把传播过程分解为四个构成要素:信源(source)、信息(message)、信道(chan-

nel)和受传者(receiver)^[12],这对理解黄河文化元素数字化艺术传播构成元素和探讨黄河文化信息传播策略有很大帮助。

1. 信源——信息传播者

在黄河文化传播过程中,信源即信息传播者,其包括黄河文化的相关保护部门、各地文化主管部门、新闻媒体和普通大众。根据 SMCR 模型,从信源的传播技术上看,新时代黄河文化元素的传播必定要与科技相融合,数字化的采集与存储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等都可为其提供技术支持;从信源的态度上看,信息传播者能否主动、自觉、充分了解自己的传播内容、传播目的和传播对象,是黄河文化传播能否取得效果的关键;从信源的知识和文化上看,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接收者的文化程度对黄河文化元素的传播影响很大;从社会系统上看,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是影响黄河文化传播的外部环境,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助于提高传播者的传播意识,强化传播效果。

2. 信息——传播内容

在 SMCR 模型中,信息作为传播的客体主要包括内容、符号和处理。在黄河文化元素传播过程中,信息传播者需要将其“编码”,将黄河文化的内容、结构与成分予以艺术化呈现。信息传播者可根据不同的文化载体,如语言、图像、视频、音乐等,呈现出黄河文化元素不同的表达方式,以更加具象化的形态激发接收者的共情效应,促使其理解黄河文化的内在价值。当然,信息传播者对内容、符号的处理方式也会影响到信息传播的接受度和传播效果。

3. 信道——传播渠道

信道作为信息传播的通道,主要指文化传播的技术通道与表现形式。早期黄河文化元素的传播因时间、地点、空间、人力、物力等多方面的因素,制约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新时代的数字化艺术传播则可打破这些制约,通过数字媒体,打通受众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等通道,从而使黄河文化得到全方位的有效

传播。

4. 受传者——信息接收者

受传者是影响信息传播效果的关键一环。受传者的传播技术、态度及其黄河文化方面的相关知识、文化与社会背景等,对其接收黄河文化信息并做出相应反馈具有重要影响^[13]。而且,受传者除被动获取信息外,还可对信息进行反馈和再传播。在传播过程中,信息可能会受损,也可能被再次“编码”,原来的受传者就会变为新的信源,原来的信源则会变为新的受传者,实现信息交互。所以,黄河文化元素数字化艺术传播应注重大众对于信息的感受程度,加强与大众的互动联系,激发其主动吸收和传播黄河文化。

四、黄河文化元素数字化艺术传播的创新路径

根据贝罗的 SMCR 模型,黄河文化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增强信源传播力,实现精准传播

新时代数字化传播所具有的互动性、开放性、及时性、兼容性和延展性等特点,使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更加紧密地相连,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传统关系由过去的单向传输变成了双向、交互传输,传播模式也由“中心化”的传播转变为“去中心化”的传播,受传者的社会传播力量正在不断加强。

其一,增强传播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传播者是文化传播的主体,在传播中处于最核心的地位。黄河文化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者中既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有热爱传统文化并具备一定传统技艺的艺术家,如书法家、国画画家、设计师、戏剧大师等。他们具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能使黄河文化元素数字化艺术传播在视觉图像上得以完美呈现,应增强其传播黄河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及其所蕴含的精神在当下社会语境中进行现代化传播的能力。

其二,对受传者进行精准传播。在黄河文化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过程中,应利用好互联网优势,借助大数据等技术充分了解受众,对其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细分,以进行精准定位和传播,并结合互联网的多维传播特性,激发受众主动进行再次传播,从而更加广泛和有效地进行黄河文化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

2. 加强数字化艺术传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

一方面,应充分发挥传播者“把关人”的重要作用。在大众文化的制作与传播中,传播者有权决定让受众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有权决定制作什么,不制作什么;有权对信息资源进行取舍^[14]。在数字化艺术传播过程中,传播者需要对以数字化艺术形式呈现的作品能否展现出黄河文化元素的视觉符号精髓,是否表达出其代表的丰厚文化意蕴进行审核和把关,从而决定其能否通过大众传播渠道进入公众视野。例如,作为故宫博物院的主要传播者,单霁翔正是坚守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使命,开发出了故宫的数字化展览、VR 体验、网络游戏等数字化艺术产品,促使故宫文化成为新时代年轻人喜欢的传统文化大 IP。黄河文化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也需要这样优秀的传播者,深入了解受众的需求,创新文化表达形式,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强化黄河文化元素数字化艺术的传播力。

另一方面,应建立黄河文化元素数据库,推动黄河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化。黄河文化元素数据库就是运用数字网络技术,将有关黄河文化的历史、造型、艺术等各项元素以数据形式储存起来并展示在网络“博物馆”中。数据库具有信息实体虚拟化、信息资讯数字化、信息传递网络化、信息利用共享化、信息提供智能化、信息展示多样化等优势,可以使大众不受时空限制进行浏览,还可以自由表达意见、有效互动。黄河文化元素数据库的构建,一是可通过二维、三维扫描技术将平面类、立体类艺术作品采集保

存为数字化信息,二是可使用图形处理软件、3D 技术修复和完善有所破损的文化遗产,三是可通过数字动画、影像、数字化衍生产品等方式推进黄河文化元素数据库的建设。与此同时,各个相关机构应协同合作,建立起包括文物资源、非遗文化、古都文化、红色文化等要素的黄河文化元素数据库,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传播过程中来,真正实现“让黄河文化资源活起来”的目标。

3. 提炼形态化符号语言,注重数字化艺术转译

其一,应提炼黄河文化元素的形态化符号语言。为加强黄河文化元素数字化艺术的传播力,应筛选出具有典型性、传播热度高的元素符号,并对筛选出来的黄河文化元素符号进行再创造;结合不同的数字媒体传播特点,有针对性地提炼出现代化的形态化符号语言,即通过艺术设计等创新手段将内在的、抽象的信息融于数字化艺术作品之中和数字化艺术传播的全过程。

其二,应针对黄河文化元素内容进行数字化艺术转译设计。应基于符号学的认知,通过对不同类型黄河文化元素符号蕴含的主题文化准确地解析、转译、再设计,建立传统文化与数字信息的联结关系,探索黄河文化元素图文资源数字化表达、传播的更多可能性。其包括有目的地对黄河文化元素视觉符号的提取、加工,对用户交互行为的解码、编码,以及对黄河文化元素精神和情感的挖掘、演绎。

其三,应将原型叙事与交互叙事手法有机结合起来。原型叙事手法是在对黄河文化元素原型有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文化题材,并对其进行创造性的应用,营造出具有浓郁的黄河文化元素氛围的原型情境。这对于加强数字化艺术作品的文化感染力和激发大众对黄河文化热爱的情感共鸣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交互叙事手法是以互动推动叙事发展的一种叙事手法,其充分强调了在“去中心化”的传播变

革中普通大众的关键性作用,并在人机的互动反馈中满足用户的心理需求,使其产生沉浸式的使用体验,从而找到感同身受的超强的代入感,增强其对黄河文化传承的认同感。

4. 利用新技术通道,打造沉浸式体验

其一,利用新技术,实现情景交互。AR、VR、MR、3D 扫描与重建、动作捕捉等新技术为情景交互方式提供了多种可能,可以将其运用到黄河文化元素数字化艺术的传播中,以此来重新发掘、整合传统文化,促使新颖、多样的传统文化艺术表现方式的产生。

其二,注重碎片化语境,实现信息快速获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满足了受众对信息传播不受时间、空间、地域等束缚的传播诉求,其以便捷高效的传播优势在获得受众更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在推动着信息以碎片化方式进行传播和流动。因此,应充分利用受众的碎片化时间,满足其个性化需求,使受众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感受黄河文化的魅力。

五、结语

文化的传承发展是要经过媒介传播来实现的,如果失去传播的空间,其只能默默地消亡,带来群体的文化失忆症。当今时代,艺术与数字的“联姻”越来越紧密,传统文化可借助新媒介(如微信、微博、短视频、APP等)对生活进行全方位、深入渗透,促进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我们传播好黄河文化提供了强大动力。新时代,黄河文化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也是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需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持续推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实践(思想理论版), 2019(11):5.
- [2]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 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J]. 资源导刊,2020(1):6.
- [3] 夏征农,陈至立. 辞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606.
- [4] 曾繁仁. 文艺美学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19.
- [5] 胡中煌. 数字化艺术传播的媒介特性[J]. 新媒体研究,2019(5):115.
- [6] 侯宗辉. 甘肃黄河文化传承利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 甘肃政协,2021(1):52.
- [7] 李立新. 深刻理解黄河文化的内涵与特征[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9-21(A04).
- [8] 马中红. 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转向[J]. 文艺研究,2010(12):104.
- [9] “老家河南 黄河之礼”非遗数字馆上线[EB/OL]. (2020-12-23)[2021-04-13]. <http://www.rmzxb.com.cn/c/2020-12-23/2744233.shtml>.
- [10] 莫韶华. 取材取景河南,徐帆、姚晨和赵薇监制三部公益主题短片点亮电影节[EB/OL]. (2020-09-23)[2021-04-1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8655268111204445&wfr=spider&for=pc>.
- [11] 跑男团花式打卡黄河地标,《奔跑吧·黄河篇》官宣定档[EB/OL]. (2020-11-23)[2021-04-1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4167963700563124&wfr=spider&for=pc>.
- [12] 郑燕林,马诗婧,刘爽. SMCR 模式视角下 MOOC 建设的路径选择[J]. 中国电化教育,2014(10):36.
- [13] 柴昊,赵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传播策略研究:基于 SMCR 模型的分析[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141.
- [14] 赵继伦. 论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及其社会控制[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5.



引用格式:王银枝,张远. 征信视域下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破解路径研究[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3):73-78.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3.010

文章编号:1009-3729(2021)03-0073-06

征信视域下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破解路径研究

Research on the financing path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China difficult to crac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edit reporting

王银枝¹,张远²

WANG Yinzhi¹,ZHANG Yuan²

1.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1;

2.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关键词:

征信;
小微企业融资;
信息不对称;
信用体系建设

摘要:小微企业融资难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冲击,给我国小微企业带来了严峻的生产经营压力。征信系统作为我国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在提升小微企业信息透明度、优化小微企业信用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优化征信系统,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小微企业信用体系,解决小微企业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可以有效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助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收稿日期]2021-04-25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12400410138)

[作者简介]王银枝(1963—),女,河南省郑州市人,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征信理论与实务;张远(1991—),男,河南省郑州市人,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金融理论。

小微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其在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小微企业规模小、可抵押资产不足、抵御风险能力弱等,其一直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这严重阻碍了小微企业的发展。尤其是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的冲击,我国小微企业的融资更是雪上加霜。着力优化小微企业发展环境,破解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助力小微企业发展,显得愈发迫切。

小微企业融资难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和金融工作者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我国有学者从信用、征信等方面提出了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建议。张亦春^[1]深入研究了我国社会信用的缺失状况,揭示了社会信用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乃至企业、个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李先瑞^[2]阐述了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信用资本在小微企业融资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数据征信在小微企业融资中的应用路径;仲伟霞^[3]认为小微企业征信信息供给不足制约了小微企业征信服务发展;常璟等^[4]指出破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关键在于打破信息不对称瓶颈;吴晶妹^[5]认为在市场成熟的情况下,政府信用信息能够合理分类并分类管理,未来我国将形成三大数据体系,应将政府信用信息有条件地、有序地开放,当前政府应当建立国家级和省部级征信信息交换平台,以实现数据库的互联互通。

征信系统作为我国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在提升小微企业信息透明度、优化小微企业信用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征信视角研究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拟在剖析小微企业融资难根本原因的基础上,分析征信在小微企业融资中的作用,进而提出发挥征信对小微企业支持的效能,以助力我国小微企业发展。

一、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主要表现

当前,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1. 资金缺口较大

长期以来,融资难、融资贵严重制约了我国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从融资需求看,近年来,我国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一直较高,每年的增长率一般都在10%以上。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对新兴市场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融资不足与机遇的评估》报告显示,我国中小微企业潜在融资需求达4.4万亿美元,融资供给仅2.5万亿美元,潜在融资缺口高达1.9万亿美元,缺口比重高达43.18%。

2. 融资成本过高

目前,我国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银行贷款的利息,包括以基本利率结算的利息和以浮动利率结算的利息。浮动利率根据借款人的信誉、贷款期限等在借贷期内可定期调整,通常按照基本利率加成计算,浮动的幅度不超过20%。二是抵押物等的核实、登记、评估等方面的费用,据调查,这些费用一般占到全部融资成本的20%左右。三是用于担保方面的费用,年费率大体在3%左右^[6]。四是风险保证金利息支出。金融机构在提供借款时将一部分利息从本金中扣除,小微企业实际借到的本金要比约定的低,目的是为了确金融机利息的回收。以上这些因素无疑都加大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加剧了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

3. 融资渠道单一

在我国,由于其他融资渠道不畅,小微企业融资主要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为主,方式单一。然而,小微企业由于自身各种客观原因,往往很难满足这些金融机构的贷款条件,能够获得的贷款数量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大多数金融机构往往以小微企业财务不规范、会计信息不全或缺乏抵押品为由而拒绝放贷。许多金融机构对办理小微企业贷款方面有很多规定,这些规定使得众多小微企业望而却步。

二、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根源

近年来,学者们对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探讨,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和建议;现实中,我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然而,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存在,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目前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根源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 获取和征集信息难,信用体系不健全

首先,由于缺乏外部约束机制,对小微企业的大部分生产经营信息和管理者信息没有强制性对外公开披露的要求,人民银行对于采集到的小微企业信用信息不能确保其真实性,主要是由于在实践中人民银行征信部门不具备逐一核实其真实性的条件。因为人民银行对小微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和更新,主要是根据企业在申请办理贷款卡与贷款卡年审时由企业自己提供。此外,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等信息分散于质检、工商、税务等部门,这些部门都建立有自己的信息系统,这样就形成了条条框框的阻隔,各成系统,并且各部门出于信息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对自己采集到的信息多采取垄断式保护,其他部门无法分享,形成数据的“信息孤岛”^[7]。其次,我国信用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小微企业融资环境亟待改善。由于我国的信用评级行业刚刚起步,评级水平不高,缺乏科学的评级方法和高素质的评级从业人员,更没有高质量的信用评级体系,难以对小微企业信用状况进行科学准确的评估。再次,小微企业还没有形成良好的信用文化,信用意识淡薄,社会诚信度不高,大部分小微企业没有规范的管理制度,治理结构和会计制度不健全,有的甚至连最基础的会计信息和账本都不齐全,所提供的账务信息和资料大多未经专业审计和验证,会计信息严重失真,诸如此类,都严重影响了小微企业的社会形象,成为了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因素。

2. 有效抵押物不足,贷款担保难

小微企业规模小,固定资产较少,有效抵押物不足。抵押物是企业的实力和还款能力的现实表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风险保障。传统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时往往以抵押物作为判断企业还款能力和贷款有无风险、能否按时收回的重要因素。在贷款发放之前,机器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和其他抵押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企业的还款能力,传递出一种信号,银行借此了解企业的经济实力,解除对企业贷款的顾虑,减少信息不对称,有利于银行更直观地识别企业贷款风险;银行把贷款发放给企业之后,抵押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督促企业按时还款的作用。如前所述,由于银行获取小微企业的信用信息比较困难,对抵押物的要求比一般企业更高。但小微企业由于规模小、固定资产少、有效抵押物不足,因而形成担保难^[8]。

3. 贷款费用高,收益难以覆盖成本

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由于小微企业自身的特点,与大中型企业贷款相比,小微企业贷款付出的各种费用和成本会更高,收益往往难以覆盖成本,更谈不上盈利了,这对于主要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根本就没有贷款的积极性。首先,小微企业贷款的风险大,违约率高,贷款损失的可能性大,风险成本高。其次,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需要付出的人力、物力等资源成本高。小微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往往是“短、频、急”^[9],对小微企业贷款需要金融机构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

4. 资金需求效率要求高,难以及时满足

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国各地的小微企业都受到了疫情不同程度的冲击。随着国家相关帮扶政策的出台和企业的纷纷自救,目前我国大部分小微企业已进入复工复产状态;但据调查,仍有很大一部分小微企业资金流转困难。现实中发现,小微企业主普遍地更青睐随借随还的借期灵活贷款,资金需求一般

期限较短,但需求往往比较迫切。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往往需要层层审批,获得贷款等待的时间较长,审核批准的手续复杂,无法及时满足小微企业短而急的贷款需求。

5. 风险管理能力弱,无法有效控制风险

由于小微企业财务等信息不透明,金融机构难以及时获取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等的变动情况,无法及时跟踪、发现风险隐患并及时进行策略调整,对于随时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无法有效管理。通常在对小微企业发放贷款前后,金融机构都要对该企业进行全面考察,如了解企业的现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等情况,甚至了解企业管理者诚信状况、企业的水电费缴纳情况等,通过信息数据的变化发现风险并进行化解。根据有关资料,美国、日本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分别为8年左右和12年左右。而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年左右,成立3年后,还在正常营业的小微企业约占全部企业的1/3^[10]。生命周期短,积累的生产经营等各种信息数据较少,再加上小微企业会计信息不规范,财务制度不健全,金融机构很难根据企业各种信息数据的变动情况进行风险管理。

三、征信在小微企业融资中的作用

征信是指依法对个人信用状况和企业信用状况等相关信息进行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并对外提供的活动。在实践中,征信表现为一种为信用活动提供的信用服务,即表现为第三方专业机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的信用信息,以及可以判断这些经济主体信用状况的其他相关信息进行收集、整理、保存、加工,对外提供信用报告、信用评分与评级,以及信用信息咨询等服务,能够帮助经济主体分析判断信用风险、控制风险,尽早消除风险隐患,主动进行信用风险管理的活动^[11]。征信在小微企业融资中主要起到以下五个方面的作用。

1. 缓解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征信机构依法采集、加工、整理信息数据,形成信用报告、信用评估等产品,提供给信息使用者,能够有效降低放贷机构与小微企业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目前,征信机构在采集小微企业信息数据时,采集的范围在扩大,其采集信息的场景既有线下也有线上,既有传统数据也有替代数据。征信机构通过爬取、合作和购买等方式,整合各部门和平台不同种类的信息数据,建立起广泛的数据链接和数据聚集效应,并将这些数据对外进行输出,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贷款时参考这些信息数据,可有效缓解银行与小微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2. 加强信用约束

专业化的信用信息服务机构即具有第三方独立性的征信机构,是提供现代征信产品的实施主体。征信体系的建立,有助于金融机构了解小微企业的信用状况,及时识别贷款可能产生的信用风险,以便于在信贷决策时进行参考。完善的征信体系,能够在全社会形成“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氛围。缺乏良好信用记录的小微企业则面临更高的交易成本和更少的融资机会,从而形成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惩戒的社会环境。

3. 缓解抵押品不足、担保难问题

征信活动能够帮助信贷机构对客户进行分析,防止身份欺诈和盗用等情况的发生,识别风险点,区分虚假交易,防范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用风险。现实中,良好的信用记录成为实物抵押之外的一种“信誉担保”。具有良好信用的小微企业,信用成为其经济“身份证”,以信誉作为抵押品,可以减轻融资中实物抵押的压力。

4. 提高决策效率

征信活动使得放贷机构可以及时了解小微企业的信用状况,减少贷前调查的资源投入;金融机构可以借助征信产品(如信用报告或信用评分)对小微企业准确进行风险评

估,有助于放贷机构进行科学决策,缩短放贷的审批时间。这样,整个信贷交易过程的透明度提高了,决策的效率也提高了。1999—2000年,世界银行对51个国家5000家企业的统计数据表明,在有征信机构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明显下降,从商业银行获得信贷的可能性比无信息共享时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平均上升了12个百分点^[12]。

5. 量化信用风险

随着技术的进步,征信机构采取高科技手段进行信息调查,采集大量的数据,建立信用评估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计算出小微企业的信用评分,并以此来度量小微企业可能违约的风险程度。通过征信产品的使用,金融机构能够方便地了解小微企业的信用状况和履约能力,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客户的信用评分,筛选出符合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和要求的小微企业客户群,帮助金融机构防范信贷风险。

四、发挥征信对我国小微企业支持效能的对策建议

发挥征信对我国小微企业的支持效能,助力我国小微企业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深挖数据来源,拓宽对小微企业信息数据的获取渠道

征信是一种信息分享机制,这是最能反映征信本质的一个特征,也是征信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项好制度的原因^[3]。征信服务正是通过其信息分享机制,来帮助解决信用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对小微企业来说,能否获取全面、完整的信用信息数据,直接影响着征信系统支持小微企业的效能发挥^[13]。为此,应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完善我国征信系统,丰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数据,加强政府各部门信用信息数据的互通共享,努力实现征信系统对

信用信息数据的全覆盖。一是应加强与政府各部门的信息互通。目前,我国征信系统已能定期从最高人民法院、环保等部门采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环保处罚和许可信息等,应提高相关信息采集频率,加快更新速度,进一步将财税等信息纳入征信系统采集范围。二是应进一步推进征信系统对公用事业有关信息的采集。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诚信状况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从其公用事业缴费等信息中反映出来,因此,现代征信系统不仅应采集传统信息数据,还应采集诸如企业用电的费用、用水的费用和电信费用等这些替代信息数据。同时,应加快推进把这些公共事业信息接入征信系统的工作,扩大对该类信息的采集范围,提高征信产品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三是应引导小额贷款公司、信托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接入征信系统。加大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接入工作力度,能够进一步提高征信系统内小微企业信息的全面性和丰富性。四是应强化数据录入,挖掘征信潜能,推动大数据征信的创新和应用,使系统内小微企业信息数据更加真实、可靠。

2. 完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构建小微企业公共征信平台

打破信息孤岛,推动信用信息共享,必须以全国一盘棋的思维织密信息数据大网,拔掉政府各个部门之间互不相通的“数据烟囱”,打破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孤岛”。一是应加快推进小微企业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实现信用信息共享,不断完善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三方信用信息沟通反馈机制。二是应推进尚未进入征信系统的金融机构尽快加入征信系统,及时更新信用信息数据库相关信息,提高企业融资借贷环境透明度,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便利条件。三是应统一信息安全标准,加大信息保护力度。同时,应完善数据使用机制和信息安全机制,防

范信用信息滥用和数据泄露等风险。

3. 健全信用服务体系,改善小微企业融资条件

一是应进一步规范信用评级市场,重视信用评级人才培养,尽快建设一支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新的科技手段进行信用评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同时,应制定科学合理的信用评级缴费制度,制定统一的收费标准,以防止出现乱收费现象,杜绝以降低收费标准或评级标准的方式拉拢客户,促使信用评级市场公平竞争,提升信用评级整体水平,为金融机构判断小微企业信用提供帮助。二是应健全小微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加快小微企业担保体系建设,从税收、奖励、损失代偿补助等方面鼓励民营资金进入担保行业,加快发展商业性和互助性担保机构,为小微企业融资创造条件。

4. 加强征信宣传,提高小微企业信用意识

银行等金融机构应持续加大征信宣传力度,进一步培育和强化小微企业信用意识,鼓励和引导企业重视积累信用记录,树立以诚信为本的企业道德观念。同时,小微企业应加快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步伐,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财务管理程序,确保财务数据和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可靠,在社会上建立良好的信用形象,塑造守法经营、诚信履约的良好形象,增强自身信贷能力。

5. 优化信用生态,建立健全信用惩戒机制

诚信作为社会和谐的基础,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优化信用生态,能够最大限度减少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内耗和摩擦,大大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应进一步完善惩戒运作机制和运作环境,加大惩戒力度,扩大惩戒范围。对信用良好的小微企业,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对信用较差的小微企业列入

“黑名单”,进行行政性约束惩戒,提高融资门槛等,使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加大其失信的成本,以期对经济主体自觉守信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

参考文献:

- [1] 张亦春. 中国社会信用问题研究[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40.
- [2] 李先瑞. 刍议大数据征信在小微企业融资中的应用[J]. 财务与会计,2015(12):55.
- [3] 仲伟霞. 基于信息供给变革的小微企业征信服务发展对策[J]. 征信,2019(10):51.
- [4] 常璟,吴楠,王梅欣. 从小微企业融资看征信信息平台建设与创新:基于山东省部分地区小微企业的融资调查[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99.
- [5] 吴晶妹. 未来中国征信:三大数据体系[J]. 征信,2013(1):4.
- [6] 蔡丽华. 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现状及对策[J]. 贵州农村金融,2012(7):20.
- [7] 钱学义. 基于征信视角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J]. 黑龙江金融,2013(3):30.
- [8] 李冬晓. 基于缓解融资难视角下的小微企业征信方式创新[J]. 征信,2012(5):63.
- [9] 魏大鹏. 征信视角下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及对策研究[J]. 征信,2012(6):43.
- [10] 万存知. 征信业的探索与发展[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4.
- [11] 王晓明. 征信体系构建制度选择与发展路径[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210.
- [12] 汪路. 征信若干基本问题及其顶层设计[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11.
- [13] 刘云生. 基于征信系统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调查与思考:以南京地区为例[J]. 金融纵横,2020(2):10.



引用格式:黄琦. 货币政策工具、农村金融体系支持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区域差异与空间效应研究[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3): 79-84.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3.011

文章编号:1009-3729(2021)03-0079-06

货币政策工具、农村金融体系支持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区域差异与空间效应研究

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patial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tools and rural financial system suppor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poor areas

黄琦

HUANG Qi

中国人民银行 郑州中心支行, 河南 郑州 450018

摘要:基于2016—2018年河南省39个贫困县的季度数据,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不同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体系对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通过对经济领域的薄弱环节投放再贷款,能有效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银行和保险服务对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明显,而证券服务对乡村振兴的效果不明显;不同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体系精准支持乡村振兴,存在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有待提高,金融基础设施投放效率不高,资本的虹吸效应明显,保险保障作用较弱,以及农村金融支持农业、农户、产业的方式有待改进等问题;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空间溢出效应显著。

关键词:

货币政策工具;
农村金融体系;
乡村振兴;
区域差异;
空间溢出效应

[收稿日期] 2021-05-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XJY021)

[作者简介] 黄琦(1990—),女,河南省安阳市人,中国人民银行经济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农村金融。

乡村振兴是中共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战略,是化解新时代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地区发展不充分问题的重大举措^[1]。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学者们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情况展开了研究,一致认同应该紧紧围绕“二十字”方针与五大目标任务推进落实^[2-5]。学者们针对多元化目标探讨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张挺等^[6]从战略目标的五个方面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对11个省区市的35个乡村进行了实证分析;贾晋等^[7]基于“五位一体”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任务,运用熵值法和TOPSIS法对30个省区市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和比较;闫周府等^[8]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目标任务建立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对30个省区市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

关于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一些学者从宏观层面展开了研究。韩俊^[9]认为应健全与农业农村发展相适应的农村金融体系,以满足乡村振兴多元化的金融需求;程郁^[10]认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应保障金融资源对“三农”的优先投入,建立科学规范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有助于破解城乡金融资源的“逆向”配置问题;潘妍妍等^[11]认为农村金融体系在支持乡村振兴方面发挥支撑作用的首要条件是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生态体系,满足乡村振兴的资金需求;吴本建等^[12]通过总结发达国家和地区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的经验,发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金融支持体系应由农业信贷体系、农业担保体系、农业保险体系和资本市场构成。

总体而言,现有围绕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成果,但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鉴于此,本文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目标任务,采用熵值法和TOPSIS法综合测算乡村振兴水

平,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农村金融体系对不同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差异化影响,以期作为“后扶贫时代”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提供参考。

一、研究设计

1. 农村金融体系支持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

农村金融体系支持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有两个方面内涵。首先,农村金融服务本质上是农村金融直接或间接为农业、农户和产业发展提供便捷有效的资金支持,通过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农民生活富裕,从而实现乡村振兴。其次,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见图1)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向农村薄弱领域提供政策支持,向金融机构发放成本较低的再贷款资金,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支持乡村振兴的力度;二是银行业为县域经济、城乡居民提供存款、贷款等金融服务,帮助群众积累财富,使其获得一定的存款收益,缓解乡村发展生产过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实现生产性收入增长;三是证券业可以辅导贫困地区企业通过发行债券或IPO等方式拓展融资渠道,帮助当地企业做大做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四是保险业可以为农业生产经营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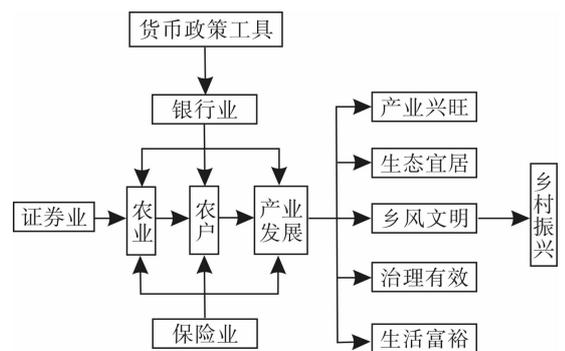


图1 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

程中遇到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一定的风险补偿。

2. 研究方法 with 数据说明

为全面反映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区域差异与空间效应,本文采用空间通用模型^[13]。本文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选取 2016 年第一季度至 2018 年第一季度河南省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区 16 个贫困县、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 11 个贫困县、非连片贫困区 12 个贫困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和金融发展指标。

3. 指标选取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乡村振兴水平,其内涵丰富,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因此采用熵值法和 TOPSIS 法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目标任务综合测度乡村振兴水平,多维度指标具体见表 1,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指标说明具体见表 2。

二、实证研究

1. 河南省 39 个贫困县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分析河南省 39 个贫困县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空间

表 1 乡村振兴测度的多维度指标

变量内涵	变量名称	计算公式
产业兴旺	产业结构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
生态宜居	碳排放量	化肥施用量 × 857.54 + 农作物种植面积 × 16.47 + 农业机械总动力 × 0.18 + 农业生产用电量 × 0.18
乡风文明	教育水平	义务教育在校生巩固率
生活富裕	人均消费水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乡人口数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农村人均纯收入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治理有效	人均财政资本投资	财政总支出/城乡人口数
	人均社会资本投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乡人口数
	信用环境	评定信用农户数/农户数量

表 2 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指标说明

农村金融体系	指标	指标解释
金融政策	货币政策工具	人均再贷款余额
农村金融服务主体	银行服务	自助设备布放数/行政村数量
	证券服务	证券期货从业人数/乡镇数量
	保险服务	保险从业人数/乡镇数量
农村金融服务对象	金融对农业的支持	人均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
	金融对产业的支持	人均农村企业贷款余额
	金融对农户的支持	人均农户贷款余额

效应,结果见表 3。由表 3 可知,空间自相关系数 λ 的 P 值为 0.063 695,空间自回归系数 ρ 的 P 值为 -0.028 957。这说明在不同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分析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时应将空间要素考虑在内。因此,河南省 39 个贫困县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影响机制分析,应以空间面板广义矩估计回归方法(以下简称 GMM)的分析结果为准。

从金融政策来看,货币政策工具的系数为 0.000 059,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货币政策工具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发挥着引导金融机构精准支持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作用。

从农村金融服务主体来看,银行服务的系数为 -0.000 453,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这说明银行在县域提供的 ATM 机、POS 机或其他自助服务终端等金融基础设施对乡村振兴的作用不显著。证券服务的系数为 -0.049 928,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证券业支持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政策主要为在贫困地区为上市企业开通 IPO 的绿色通道,旨在通过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带动当地企业发展,但实际上可能存在资金外逃的风险,这将阻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保险服务的系数为 0.000 346,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保险业对乡村振兴的支持,不仅可以分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而且可成为融资增信的保障工具,扩大融资主

表3 河南省39个贫困县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空间效应

变量	普通面板回归随机效应		空间面板 GMM 随机效应	
	系数	z 统计量	系数	t 统计量
常数项	0.132 830 ***	6.110 000	—	—
货币政策工具	0.000 142 ***	5.825 600	0.000 059 ***	2.981 600
银行服务	0.000 585	0.971 500	-0.000 453	-0.564 100
证券服务	-0.068 076	-1.550 000	-0.049 928	-0.564 400
保险服务	0.000 370 **	2.174 000	0.000 346 **	2.320 600
金融支持农业	-0.000 004	1.107 100	-0.000 006 *	-1.700 200
金融支持产业	0.000 001	0.421 600	0.000 005 *	1.668 200
金融支持农户	0.000 012 ***	3.717 200	0.000 010 **	2.275 300
R-squared	0.205 140	—	—	—
ρ	—	—	-0.028 957	—
σ^2	—	—	0.006 113	—
λ	—	—	0.063 695 ***	—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体的信贷额度,从而引导更多资金支持乡村振兴。

从农村金融服务对象来看,金融支持农业的系数为-0.000 006,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金融支持产业的系数为0.000 005,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金融支持农户的系数为0.000 010,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一方面,金融支持可以帮助农户脱贫致富;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金融业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效果不明显。尤其对于乡村振兴水平较高的地区,过多将金融资源投入农业可能会造成金融资源的浪费,降低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效率。相对而言,农村金融对产业发展的支持将有效促进乡村振兴。

由此可见,银行业、保险业和货币政策工具使用能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金融对农户的支持,能通过提升农户生产经营的融资便利度,提高收入水平,助力其实现生活富裕的目标。金融对产业发展的支持,能够促进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农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提升。保险对乡村振兴的支持,不仅可以分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发挥其风险补偿作用,而且具有融资增信的作用,引导更多资金支持乡

村振兴。持续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对乡村振兴的支持引导作用,是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保障。

2. 河南省不同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实证分析

大别山区、秦巴山区、非连片地区贫困县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空间效应见表4。由表4可知,秦巴山片区、大别山片区、非连片地区贫困县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空间自相关系数 λ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区域间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同时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选择随机效应的结果解释更加科学。因此,秦巴山片区、大别山片区、非连片地区贫困县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实证分析,应以空间面板GMM随机效应的分析结果为准。

从金融政策方面来看,秦巴山片区、大别山片区贫困县的货币政策工具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货币政策工具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发挥着引导金融机构精准支持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作用,但对于非连片地区的贫困县,货币政策工具对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表4 秦巴山片区、大别山片区、非连片地区贫困县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的空间效应

变量	秦巴山片区空间面板 GMM 随机效应		大别山片区空间面板 GMM 随机效应		非连片地区空间面板 GMM 随机效应	
	系数	t 统计量	系数	t 统计量	系数	t 统计量
常数项	0.004 243	0.350 700	0.016 952	1.015 800	-0.106 610**	-2.282 100
货币政策工具	0.000 047***	3.649 900	0.000 072***	2.482 300	-0.000 033	-0.574 600
银行服务	-0.000 807***	-2.957 400	-0.005 016***	-4.327 500	0.003 975	1.206 300
证券服务	0.028 110	1.073600	-0.045 834***	-3.746500	0.048 997**	2.077 300
保险服务	-0.001 332***	-5.629 600	0.000 576***	8.428 800	0.000291	0.895 000
金融支持农业	0.000 007***	3.291 600	0.000 030***	14.505 400	-0.000 016**	-2.156 500
金融支持产业	0.000 005***	2.670 800	0.000 017***	5.626 600	0.000 017*	1.827 300
金融支持农户	-0.000 002	-0.543 500	0.000001	1.534 200	0.000 033***	3.284 400
λ	0.143 260***	41.373 600	0.084776***	9.687 600	0.289 540***	14.194 900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从农村金融服务主体来看,秦巴山片区、大别山片区贫困县银行服务的系数均为负,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该区域的银行提供金融服务时存在结构性问题。秦巴山片区贫困县的证券服务系数为0.028 110,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大别山片区贫困县的证券服务系数为-0.045 834,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非连片地区贫困县的证券服务系数为0.048 997,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秦巴山片区证券服务乡村振兴的效果不显著,非连片地区证券服务乡村振兴的效果十分显著,而大别山片区资本的虹吸效应明显,在证券服务乡村振兴时应警惕可能存在的资金逆流风险。大别山片区、非连片地区贫困县的保险服务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秦巴山片区贫困县的保险服务的系数为-0.001 332,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秦巴山片区贫困县保险对乡村振兴的支持方式有待优化调整。

从农村金融服务对象来看,秦巴山片区、大别山片区、非连片地区贫困县金融支持产业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农村金融支持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秦巴山片区、大别山片区贫困县金融支持农业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非连片地区贫困县金融支持农业的系数为

-0.000 01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该区域农村金融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仅效果不明显,反而会占用金融资源,弱化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效果。因此,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可能更有效。非连片地区贫困县金融支持农户的系数为0.000 033,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农村金融对小农户脱贫致富的效果显著;而秦巴山片区、大别山片区贫困县金融支持农户的系数或为负或不显著,这说明这些区域金融对农户的支持方式有待完善,未来农村金融应助力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实证研究结论主要包括:其一,从整体而言,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经济领域的薄弱环节,有效促进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分区域而言,秦巴山片区、大别山片区贫困县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乡村振兴的支持效果明显,而非连片地区贫困县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其二,从整体而言,银行与保险服务能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而证券服务对乡村振兴的效果不明显。分区域而言,秦巴山片区、大别山片区银行金融服务存在

结构性问题;非连片地区证券服务能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而大别山区应警惕可能存在的资金外逃风险;大别山片区、非连片地区保险服务能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秦巴山片区贫困县保险对乡村振兴的支持方式有待优化调整。其三,从整体而言,农村金融对产业发展的支持能够促进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农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提升;农村金融对农户的资金支持能帮助其脱贫致富;而农村金融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对乡村振兴效果不明显。分区域而言,对于秦巴山片区、大别山片区、非连片地区来说,农村金融支持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对于秦巴山片区、大别山片区来说,农村金融对农户的支持方式有待完善;对于乡村振兴水平较高的非连片地区来说,过多将金融资源投入农业可能会造成金融资源的浪费,降低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效率。其四,一个地区货币政策工具使用、农村金融服务在促进该地区乡村振兴水平提高的同时,对相邻地区乡村振兴也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蕴含的政策启示主要包括:其一,应提高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支持乡村振兴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引导金融机构充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提高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其二,金融机构应依托数字技术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布局,解决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应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相关政策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引导资本市场向真实扎根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提供更多的上市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带动乡村经济振兴;同时,应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充分发挥增信和保障作用。其三,应通过创新农村金融工具激发小农经济的生命力,解决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问题;同时,应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引导金融资源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特色农业发展、解决信贷资金投入传统农业效率不高的问

题,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其四,应充分发挥区域空间溢出效应,复制推广“普惠金融兰考模式”,构建“一平台四体系”,逐步形成开放的、多元的、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为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乡村振兴提供更多可能。

参考文献:

- [1] 郭晓鸣. 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维度观察[J]. 改革,2018(3):54.
- [2] 杨新荣,唐靖廷,杨勇军,等.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路径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2018(6):108.
- [3] 叶兴庆.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J]. 改革,2018(1):65.
- [4] 姜长云. 乡村振兴战略:理论、政策和规划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2018(7):2.
- [5] 黄少安.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发展战略的阶段性演变及其理论总结[J]. 经济研究,2018(12):4.
- [6] 张挺,李闽榕,徐艳梅.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18(8):99.
- [7] 贾晋,李雪峰,申云. 乡村振兴战略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J]. 财经科学,2018(11):70.
- [8] 闫周府,吴方卫. 从二元分割走向融合发展: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经济学家,2019(6):90.
- [9] 韩俊. 以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为根本遵循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J]. 管理世界,2018(8):1.
- [10] 程郁. 引导金融资源向农村回流的政策性机制研究[J]. 经济纵横,2019(11):58.
- [11] 潘妍妍,涂文明. 破解农村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经济逻辑与政策路径[J]. 财经科学,2019(3):28.
- [12] 吴本健,王蕾,罗玲.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国际镜鉴[J]. 世界农业,2020(1):11.
- [13] 沈琼,马炬申.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中原五省人口流动对经济收敛性影响[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50.



引用格式:武永成. 乡村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的意义、困境与提升路径[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3):85-90.

中图分类号:F32;F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3.012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3-0085-06

乡村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的意义、困境与提升路径

The significance, predicament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rural tourism dri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武永成^{1,2}

WU Yongcheng^{1,2}

1. 宿州学院 管理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2. 克里斯汀大学 国际学院,菲律宾 马尼拉 1004

摘要:新世纪伊始,我国通过深化农村改革、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等一系列措施助力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其中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备受关注,成为一条好的创富路径,已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收入渠道,对乡村振兴战略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但乡村旅游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也伴随着生态环境破坏、农村从业人员思想水平提升缓慢、商业化逐利化现象严重等一系列现实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美丽乡村建设,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迟滞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着力打造特色旅游文化品牌,实现乡村本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积极提倡“泛旅游产业”,构建多产业联动绿色生态产业链;加快推动乡村旅游与脱贫攻坚的精准对接,全面强化扶贫旅游和防返贫旅游;注重保护乡村居民的利益分配权益,创新乡村金融体制;构建“三农”融合旅游发展新模式,树立大农业发展观,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产业保障,以助推区域农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关键词:

乡村旅游;
乡村振兴;
精准扶贫;
产业融合

[收稿日期]2020-12-10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骨干人才国内外访学研修项目(gxgnfx2019048);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SK2020A0784)

[作者简介]武永成(1979—),男,安徽省颍上县人,宿州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旅游酒店管理、城乡社会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关注农村问题,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并将其作为全党的重点工作来抓,力争实现农村经济的飞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共十九大更是首次将“乡村振兴”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把农民的收入问题、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农村的吃穿住行问题都一一进行落实和规划,并最终将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抓手^[1]。多元化产业发展成为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乡村旅游产业因关联产业多、推动农民就业、扩大城乡交流等优势被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希望和拯救乡村的重要力量。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带动其他关联产业,融合发展农旅新模式,充分发挥地方区域乡村旅游特色,将确保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落实,形成多点发展共助脱贫的“全域旅游”格局,深度促进乡村经济振兴、产业兴盛、人才兴旺。

一、乡村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的重大价值与战略意义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绿水青山生态环境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从而引发对乡村旅游的热衷。乡村旅游产业作为乡村经济振兴的重要抓手,以观光、休闲、娱乐、体验、考察等为主要形式,融合交通、生态、建筑、自然环境等多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能推动对乡村工作的治理与重构^[2]。加速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美丽中国建设、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价值和战略意义。

1. 乡村旅游助力乡村经济效益的提升

乡村经济效益的提升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作用。乡村经济效益的提升意味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村整体实力的提升,也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方向。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乡村旅游是对农村单一产业模式的有效破解,更是为乡

村经济效益的提升做出了巨大而切实的实质贡献。乡村旅游所具有的经济属性和物质属性,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农村地区带来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同时,乡村旅游所关联的行业诸多,消费人群对乡村文化产品、农舍住宿、饮食特色等需求,都连带农村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 and 提升,产生更大规模的经济效益。另外,乡村旅游对农村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对闲置人员的再就业,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乡村经济效益。可见,乡村旅游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产生较高的旅游消费,增加农业农村功能价值,实现乡村经济效益的显著提升。

2. 乡村旅游推动乡村自然生态建设提质增效

建立在乡土文化特色基础上的乡村旅游,其发展的前提是消费者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向往和对朴实真实单纯农村生活的需求,需要具备较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村落民居,更需要土地、水源、生态环境、文化、设施设备等等。这些客观条件是乡村旅游得以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发展乡村旅游,能够推进乡村自然生态建设,而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投入和开发,又能给乡村旅游产业的兴旺带来积极的作用^[3]。此外,乡村旅游还能引发乡村居民对居住环境和自然生态的保护,对不可再生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绿水青山的修复,对人居建筑的修葺和保存,这些都要对乡村自然生态建设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乡村旅游未来的巨大需求市场,都需要对乡村这一根基的自然生态加以保护。乡村旅游所引发的外部动力和内部需求,都可为推进自然生态建设做出积极而有效的贡献。

3. 乡村旅游带动农村产业分布格局的重新洗牌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尤其是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乡村产业布局的合理性和耦合性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的进度和速度。聚焦乡村产业发展,挖掘差异化“乡

土性”资源,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对乡村振兴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乡村旅游作为具有较高产业关联性的新兴产业,是农业和第三产业结合的新型产业,对乡村产业布局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可实现城市与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还可促进农产品与旅游的有机结合,实现服务业和农业的有效衔接,甚至可替代乡村传统低端小农种植、养殖产业的发展,推动农业、畜牧业、渔业、加工服务业的转型升级。由此可见,发展乡村旅游产业,能有力改变农村产业格局,实现产业布局的重新洗牌和创新发展,为农村产业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也可促进农村与城镇之间产业的相互融合,助力农村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加速实施^[4]。

4. 乡村旅游提高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

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将旅游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发展旅游业可实现经济财富的有效转移,让处于旅游区的居民实现财富的增长。在乡村地区发展旅游业,是国家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村脱贫的务实手段,也是实现乡村居民收入提升的有力举措^[5]。发展乡村旅游,可实现对农产品的附加需求和连带销售,助力农村农业实体经济发展,提高从事农业生产的乡村居民的收入;可助力农村居民获得相关旅游业工作,释放大量就业岗位,帮助农村居民就近实现再就业,获得相应劳动报酬,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可吸引社会投资,帮助农民实现自主民居的经营化管理,使自身成为产生经济效益的独立个体,从旅游中获得投资收益与分配收益,从而实现自身收入的提升。

5. 乡村旅游挖掘乡村历史文化价值和重塑乡土文化

乡村旅游的核心在于利用乡村地区所特有的“乡土性”作为旅游产品,以满足不同游客对乡村自然生态和民俗文化的需求,是现代旅游

业向农、林、牧区的延展。经过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已经成为当代民众休闲娱乐、陶冶情操、感受传统文化价值和魅力的重要方式^[6]。近年来,我国针对乡村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的特点,积极倡导“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乡村旅游观,并出台了一系列文化旅游政策,倡导发扬乡村文化传统,主张用文化包装乡村旅游产品与产业,助力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发展民俗文化,以满足游客需求。没有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的乡村旅游是无法走远的,也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

二、乡村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乡村旅游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旅游形式,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乡村振兴起着积极推动作用。然而,乡村旅游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连串诸如旅游同质化竞争激烈、发展模式单一且雷同、商业化逐利性特征愈加明显、产业附带效应不显著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生态、产业、经济、文化、政治建设,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和进一步推进。

1. 乡村旅游建设的品牌效应不突出

在乡村旅游文化建设过程中,由于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性和资金支持的不可持续性等综合原因,乡村旅游的同质化特征明显,大多照搬其他村落的固有模式,开设农家乐,以自然风貌为依托来吸引游客,没有发展当地特色文化品牌,地域品牌效应无法凸显,也没有形成长久吸引游客的经典项目和高端文旅产品。乡村旅游发展的长久之路在于构建地域性的文化和自然特色,并依赖品牌效应实现更大范围的经济收益,联动其他吃穿住行用的建设紧跟其后,但目前大多数乡村旅游并不注重对品牌文化的塑造和构建,只局限于短暂的低端、同质化旅游

项目,无法在区域内脱颖而出、使人口口相传,进而造成对当地旅游的一次性消费,不利于乡村旅游的长远发展,更无法持续促进乡村发展。此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新农村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乡村自有特色,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城镇化新乡村建设。

2. 乡村所在区域缺少对产业融合的深度思考,共识度低

乡村旅游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其他产业的发展为代价,更不能因消费群体对乡村旅游的热衷而忽视其他产业的发展,或者集中所有资源用于旅游开发,造成其他产业资源、人力、设备的短缺。然而,鉴于乡村旅游是以“乡土性”为核心的旅游休闲活动,其通常习惯于将发展眼光聚焦于乡村自身,而在如何促进乡村与城镇的融合方面则缺乏关注。此外,乡村旅游产业与其他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程度也相对较低,没有深度挖掘游客对乡村农产品、文化手工艺品、民俗节目的深度需求,使得产业融合效率低下,没有形成城乡一体化旅游,农业、服务业、工业协同发展的产业链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整体振兴。同时,从事乡村旅游的当地民众或群体,也缺少产业融合发展的思想认识,没有达成产业模式创新发展的共识,导致乡村旅游的后劲乏力。

3. 乡村旅游与脱贫攻坚政策衔接的有效性不强,联动度低

近些年,党和政府一直聚焦于农村发展,加速农村经济潜力的释放,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助力农村人口脱贫过上富裕生活。目前,我国很多地区还属于农村,而农村生产力水平普遍较低,尤其是贫困地区的范围还很大,这些都促使乡村旅游扶贫方式的兴起和成熟。然而,我国旅游扶贫模式的实施和有效衔接却并不顺畅,脱贫攻坚政策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结合度还不够。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国内扶贫区域的广阔,仅依赖政策的资金支持远远支撑不了地

方旅游扶贫的持续性发展;另一方面,发展乡村旅游需要的社会扶持和项目开发时间都较长,使得社会参与者投资热情受到影响,社会公众力量与地方乡村的联动频率降低,不利于农村贫困地区脱贫工作的有效开展。同时,地方政府对乡村旅游的经费投入不足、支持能力有限,也影响了乡村脱贫成效,阻碍了乡村振兴。

4. 乡村旅游的逐利性趋势过重

随着近些年乡村旅游的火热开展,广大乡村纷纷发展旅游项目,而盲目开发造成了大量旅游资源浪费。乡村旅游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文化、产业效益,使得社会资本和掌握雄厚资金的投资者纷纷涉足乡村旅游行业,地方政府有时为区域经济的发展 and 指标任务的完成,对于资本的拥有者也持欢迎态度,而没有附加应有的其他限制条件,导致很多投资者不顾及当地乡村旅游资源性质和产品开发规模,过度利用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和建设,甚至一度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生态系统的毁损,利益驱动下的投资者既不会过多考虑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不会顾及当地居民的受益权利和居住条件的改善。逐利行为的过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将导致乡村失去古朴的乡土气息,走上商业化道路,失去乡村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7]。

5. 乡村旅游缺少大农业发展理念

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乡村旅游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并对农村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生态建设、人民生活等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随着乡村旅游业由成长期走向成熟期,农村居住群体的思想观念却没有得到解放和转变,以至于多数乡村仅仅作为参与者投入旅游行业,没有真正当家做主人,思想意识上的落后,从根本上制约着农民实现共同富裕。同时,乡村在发展旅游过程中因缺乏整体大局观,忽略了农业的整体性和兼容性,依旧固守于传统的农业观念,认为乡村旅游和农业的融合发展关联性不大,忽视了大农业与大旅游的融合发展,

更忽视了农林牧渔养殖等的有机结合可推动乡村旅游效益的倍增。不树立大农业发展理念,将无法真实了解“三农”之间的纽带关系,既不利于乡村旅游的发展,更无法实现乡村真正的振兴。

三、乡村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的战略提升路径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是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积极倡导和实施的兴农战略手段。助推乡村旅游向规模化、集约化、智慧化、生态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是建设美丽乡村、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前提,也是我国旅游业走向专业化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更是实现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抓手。因此,针对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负面问题,应结合乡村旅游的自身特点,着力于问题的解决和旅游综合效益的提升,构建新时代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的创新模式,真正实现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和谐共进和高质量发展。

1. 着力打造特色旅游文化品牌,实现乡村本土文化传承与发展

乡村旅游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积极的作用,也只有在乡村旅游产业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条件下,才能不断为乡村振兴注入生机和活力。而乡村旅游的长远发展,必须创立具有本土乡村特色的支柱品牌和文化品牌,为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投入指明发展方向,实现发展方式由粗放式旅游开发向集约化、精细化方向转变,利用文化品牌效应吸引周边城镇居民的出行安排,通过挖掘乡村特色和历史文化习俗搭建文化品牌新形象,利用不断创新的文化形式,宣传乡村旅游的独特性、趣味性,并增强观光休闲体验,使受众群体能从众多的同级乡村旅游产品中主动选择本土特色文化旅游项目,并从乡村旅游中了解其历史、文化、

民俗、民情,从而实现对乡村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打造乡村特色文化品牌,构建自己的文化品牌体系,将会提高乡村旅游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其综合效益的持久实现。

2. 积极提倡“泛旅游产业”,构建多产业联动绿色生态产业链

作为促进乡村振兴手段的乡村旅游,在未来乡村产业化发展过程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如何发挥乡村旅游的巨大潜力,将成为下一阶段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旅游涉及交通运输、住宿建筑、民俗文化、基础设施等众多产业,需在今后的发展和质量效益的提升过程中加强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联合,倡导“泛旅游产业”发展新模式,以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快速成长和产业交叉融合,深度开展农产品加工,通过旅游观光吸引游客购买深加工特色农产品,实现加工业创收;借助互联网新兴科技,助力乡村旅游特色线路的线上宣传,通过线上线下的双向联动为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构建绿色生态产业链,以绿色、天然、工艺、绝活为特征理顺产品、项目、活动一体联动的经济发展脉络,形成绿色、健康的产业链^[8]。

3. 加快推动乡村旅游与脱贫攻坚的精准对接,全面强化扶贫旅游和防返贫旅游

鉴于乡村振兴过程中,贫困地区所占比例较大,因此乡村旅游的一大艰巨任务便是发展扶贫旅游,助推乡村地区脱贫致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首先,政府应加大力气扶持扶贫旅游模式,根据不同区域文化、地域、风土人情、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放权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应积极与资本投资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并进一步完善乡村旅游脱贫投资体制机制,协调落实好各方利益分配,尤其要维护好贫困地区人口的经济权益。其次,应加速推动乡村旅游与脱贫攻坚政策的精准对接,变资源为资产,变不利为有利,变贫民为富民,通

过综合分析本地区发展旅游所具备的地域、市场、人力等条件,并结合调研结果创新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精准扶贫模式,同时应夯实乡村振兴的组织管理和制度基础,助推贫困地区乡村的人才振兴、政策振兴、模式振兴、发展振兴^[9]。

4. 注重保护乡村居民的利益分配权益,创新乡村金融体制

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资金来源及其分配问题。处理好资金来源及其分配问题,可解决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后续资金补给问题,也可减少投资者与利益分配主体间的矛盾、摩擦,共同致力于乡村振兴。首先,地方政府应利用乡村旅游的巨大潜力,出台利好政策吸引外商或本地投资商,并利用招商引资的办法整合涉农专项资金,让资本发挥其最大的社会价值,实现旅游项目资金的可持续化和效益化。其次,应完善乡村和外部力量合作的体制机制,制定有利于各方投资主体的利益分配方案,并加强后续利益的分配落实。再次,应创新乡村金融秩序,设立普惠金融村级服务点,开展乡村金融服务,有效满足乡村居民助力旅游兴盛的金融需求^[10]。同时,应开展信用体系建设,以金融手段撬动乡村旅游,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5. 构建“三农”融合旅游发展新模式,树立大农业发展观

乡村旅游要想实现长远发展,必须结合各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摸清适合当地旅游发展的脉络,找准当地旅游发展的方向。首先,应结合地域农业发展特色、农村地貌特点、农民饮食习俗等创新旅游发展新模式,以乡村为载体,以特色农产品为支柱,以绿水青山为财富,更新游客旅游体验,参观农产品加工厂,亲自感受产品生产加工过程;加快信息、交通、电力、宾馆等配套设施建设,在可实施的基础上兴建机场、高铁,形成“全域一张网、融入全国网”^[11]。其次,应转变旅游观念,树立大农业大旅游大生态发

展观,优化升级旅游休闲农业,聚焦后旅游时代形成乡村旅游新热点、新流量,积极响应新农村建设,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加速城乡一体化推进,实现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同频共振、协同发展,用理念更新带领行动更新,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12]。

参考文献:

- [1] 武永成.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特色文化小镇建设[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20(5): 62.
- [2] 赵威.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经济产业提升[J]. 社会科学家, 2019(9): 95.
- [3] 张碧星, 周晓丽.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旅游产业选择与成长[J]. 农业经济, 2019(6): 51.
- [4] 朱显平, 姜杨. 乡村振兴战略下吉林省乡村旅游的发展逻辑、障碍及路径选择[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4): 91.
- [5] 何成军, 李晓琴, 曾诚. 乡村振兴战略下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机制研究[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 107.
- [6] 马勇. 助推乡村振兴: 旅游产业生态圈的核心价值与构建路径[J]. 社会科学家, 2019(3): 78.
- [7] 吴海燕.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及对策建议[J]. 农业经济, 2019(10): 47.
- [8] 程瑞芳, 程钢海. 乡村振兴: 乡村旅游多元价值功能响应调整及开发路径[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9(6): 79.
- [9] 谢珈, 马晋文, 朱莉.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思考[J]. 企业经济, 2019(11): 92.
- [10] 杨宏伟.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瓶颈制约与破解研究[J]. 农业经济, 2019(11): 81.
- [11] 郭景福, 赵奥.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制度与路径[J]. 社会科学家, 2019(4): 90.
- [12] 武永成, 储敏. 新农村建设视域下乡村旅游的多维解读[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8: 3.



引用格式:南晗. 城乡融合背景下相对贫困问题的表现、原因及其治理[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3): 91-95.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3.013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3-0091-05

城乡融合背景下相对贫困问题的表现、原因及其治理

The performance, the causes of relative poverty and its govern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南晗

NAN Han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相对于以往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有关制度安排,乡村振兴战略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乡村振兴战略置于城乡融合架构中推进,并以新型城市化战略来引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会给相对贫困治理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相对贫困治理应考虑城乡人口资源要素聚合所带来的新变化。城乡相对贫困的表征变化,城乡致贫因素、所面临的生计风险、贫困脆弱性同质性增强,迫切需要党和政府构建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完善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以实现城乡相对贫困问题的精准治理。

关键词:

城乡融合;
相对贫困;
贫困治理;
城乡一体化

[收稿日期] 2021-01-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CSH046); 国务院扶贫办委托课题(HS2019118)

[作者简介] 南晗(1981—),男,河南省西华县人,河南大学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中共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等会议明确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有关乡村振兴战略文件,明确提出进一步缓解相对贫困的发展目标,并要求围绕“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进行探索。相对于以往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制度安排,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产业化同步发展,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因此,相对贫困治理必须考虑城乡融合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统筹考虑城乡相对贫困问题的表现与原因,在继承打赢脱贫攻坚战经验的基础上,创新相对贫困治理体制机制,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一、城乡融合发展与相对贫困问题的城乡表现

一般情况下,城乡融合发展表现为乡—城融合和城—城融合,其中前者规模远超后者。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实施,城乡融合发展将成为乡村社会变革的重要政策性推动力量,由此带来的农村区域城镇化、居住社区化、农民市民化等一系列变化将使城乡贫困呈现以下表征。

其一,相对贫困问题城镇化。目前我国城市贫困人群的来源主要有特殊贫困人群、城镇下岗失业人员、作为准市民的农村贫困人群。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同步发展,使得大多数乡村人口向城镇聚集。城乡融合类村庄农民通过村庄社区的集体城镇化,或一定的筛选机制实现身份转变,成为城镇新移民。由于很多农民在生活习惯、就业观念、技能水平等方面与城镇人口有较大差距,农村人口

在“跳跃式”“爆发式”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新移民群体内部将会产生分化,一部分人经济社会地位提升或维持不变,而另一部分人则可能陷入贫困,因此贫困将呈现出一种“城镇化现象”。但这部分贫困人群“两不愁”问题不太突出,相对于城市普通居民,该群体在子女教育、住房、医疗保障等方面则会存在短板。

其二,城乡特殊人群贫困现象更加突出。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导向就是通过三产融合实现产业振兴,增加贫困人群创业就业机会,推动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源参与市场交换,使贫困人口脱离贫困。然而,相对贫困问题不仅存在于城镇居民内部,也更广泛地存在于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1]。城乡融合发展既会带来经济的普惠式增长,也会因政策、项目和经济投入受益面不均衡,导致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处于弱势的特殊困难人群相对贫困的加剧和相对贫困人数的增加,留守老人、残疾人家庭、失能人群等特殊人群贫困问题将更加突出。

其三,区域整体性贫困减少。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等各种措施的实施将使区域性、整体性贫困减少。以城乡融合发展为指导思想、以城乡一体化为核心目标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在体制上根除农村贫困的根源,农村贫困将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相对贫困人群将呈现阶层化分布,加上人口的流动,这将会改变我国贫困区域分布的传统特点,使相对贫困人群以散点的形式分布于城乡之中。

其四,流动人口相对贫困问题加剧。按照国际上对相对贫困现状的研究,贫困的流动人口是贫困主体之一。截至2018年底,我国流动人口总规模为2.41亿人。2014年,我国城镇流动人口家庭绝对收入贫困发生率和相对收入贫困发生率分别为0.16%和12.85%^[2]。由此推算,我国城镇流动人口贫困以相对贫困为主,

规模超过 3000 万人。部分流动人口成为无固定工作、无固定收入、无固定住所等绝对收入贫困人群,约为 38 万人。由此看来,流动人口的相对贫困规模较大,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贫困问题加剧。

二、城乡融合发展与城乡致贫因素的一致化

对风险和脆弱性的考察是认识贫困的关键。当我们从风险、脆弱性的角度分析致贫因素时,我们所理解的贫困不再是一种紧缺状态,更多的是关注某一人群容易遭遇什么、失去什么。其实,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考虑单一个体或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和持续性,除关注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导致农民收入来源变动外,还应考虑外部冲击给农民所带来的脆弱性。目前,作为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多维贫困已成为国内外学界讨论的热点^[3]。从已有文献来看,多维贫困不仅关注收入问题,还关注制度、知识、健康与生活质量等问题,这些维度所涉及的具体因素可以归结为贫困风险因子。在贫困风险因子的综合作用下,城乡致贫因素将趋于一致化。

其一,相对贫困风险因素的同质化。贫困风险既是客观的又是无形的,具有突发性和多变性。对于农户来讲,资产减少的风险、收入减少的风险、消费增加的风险是其陷入贫困状况的三个核心风险因素,这三个因素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都具有突变性和多变性。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资产,农户的土地承包权使土地确权可以稳固下来,但在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土地收益可能会因土地征用而被一次性支付,不少农民因此成为失地农民。他们要和城市居民一样通过务工就业维持生计和改善生活,而是否就业、就业收入多少则成为农民是否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成为市民或准市民

的农民是否贫困与劳动力市场波动和雇主效益变化密切相关。农业产业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另一支柱,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土地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将会导致农民土地向大户、合作社或龙头企业流转。大户、合作社或龙头企业的经营效益则直接影响农户土地资产收益,土地多寡、收益高低将成为农民是否贫困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成为市民或准市民的农村居民在城镇生活中的日常消费支出、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将与城镇居民一样成为致贫因素。

其二,生计风险的一致化。目前,城镇居民生计风险主要是支出急剧增加的风险和收入不断减少的风险。支出急剧增加的风险主要源于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急剧增加,收入不断减少的风险主要源于劳动力市场变化、雇主效益变化。而农民生计风险同样是支出急剧增加的风险和收入不断减少的风险,支出急剧增加的风险多为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急剧增加,收入不断减少的风险主要源于灾害、务工收入减少两个方面。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之后,农民的住房支出将超过“三化”之前支出的 2~3 倍,支出急剧增加的风险来源与城镇居民趋于一致。灾害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等原本农业收益风险将转移给大户、合作社或龙头企业,农民将更多地以劳动力、土地入股等方式获得收入,非农收入变化将成为农民的主要风险。这样,城乡居民的生计风险无论在支出方面还是在收入方面将趋于一致。

其三,贫困脆弱性相似。研究表明,贫困与脆弱性高度相关,相对于贫困的静态性,贫困的脆弱性具有动态特征,反映着应对未来各种不确定性时陷入贫困的概率。个体或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取决于在风险冲击面前平滑收入或消费的能力,这些又取决于家庭所处的环境(宏观经济、制度、社会政治和自然环境)、拥有的资

源(人力、实物、金融资本)和行为响应间的复杂动态联系^[4]。一般来说,农民风险暴露的可能性更大,宏观、中观经济社会环境如经济制度、粮食价格、日用商品价格、农业灾害、社会保障体系、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变化都会对其收入造成冲击。另外,微观层面潜在的风险如家庭主要劳动力健康水平、个体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等,使农户具有更强的贫困脆弱性。新型城镇化后,由于逐步实现了城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一体化,农村居民家庭在粮食价格、农业灾害、社会保障体系、居住环境等方面的脆弱性将会逐步消失,农村居民将和城市居民一样,面临工资性收入下降、日用品价格上涨、个体健康问题等风险因素。

三、城乡融合发展与相对贫困问题治理

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贫困的实质与根源是制度贫困的观点已经成为共识,农民遭受到了社会制度、公共资源供给和市场的三重排斥。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为基本思路指引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代我国消除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必将大大提高“三化”协调发展水平,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相互支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在此背景下,城乡贫困问题的治理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 构建相对贫困治理体系

根据上述城乡贫困问题的表征和致贫因素,应构建和实施城乡一元化的贫困治理体制,统筹解决城乡贫困问题,改变城乡反贫困工作分割局面,在建立新型城乡关系、改善城乡功能和结构、实现城乡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基础上,构建城乡统一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减贫战略转型,促进城乡共同

繁荣与发展。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的推进,以及土地流转和劳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农民的经济状况将越来越受到市场经济和城市生活境遇的影响,贫困治理的政策和措施所达到的减贫效果将越来越受到外界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应在制度、公共资源和市场三个层面重新梳理城乡关系,平衡城市与乡村、市民与农民的利益分配方式,兼顾公平与效率,建设一个城乡机会均等、市民和农民都能够全面发展的社会,从而打破城乡分割格局。消除农村发展所面临的障碍与壁垒,通过实施工业反哺农业、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统筹发展战略,实现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农民市民化和政策的一致化,从政策、资源、权利等各方面全方位为相对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构建综合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

其一,设立国家减贫工作委员会。目前,我国的扶贫机构是国家与各地的扶贫办,其主要负责管辖区域内扶贫开发方针、政策和规划制定,协调解决有关贫困地区发展的重大问题,领导、组织、监督和检查管辖区域的扶贫工作。在扶贫办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下,我国农村绝对贫困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相比之下,城市贫困治理机构的建设则严重滞后,迄今为止仍没有成立专门机构,城乡反贫困机构二元化明显,一定程度上对城乡流动性贫困介入不足。因此,应设立国家减贫工作委员会,将城市纳入扶贫部门的工作领域,综合协调城乡相对贫困治理,应对城乡贫困问题表征一体化趋势,实现城乡贫困治理体制的一元化。

其二,建立统一的城乡相对贫困标准与监测体系。合理、规范的贫困标准和监测体系是推动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环节。目前,我国农村贫困标准偏低,城市贫困标准缺乏权威的界定,且数量庞大的城市人群的贫困问题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为此,应实行相对统一的城

乡贫困标准,在继续做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监测的基础上,加强对城市相对贫困人口的监测,为未来城乡贫困问题融合治理奠定基础。

其三,建立基于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的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体系。我国脱贫攻坚的一条重要成功经验就是“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5],这条经验的优势在于动员了各种社会资源投入到贫困治理中去,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帮扶力度,而这些政策措施在城市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存在着对城市贫困人群救济保障多、政策保障少的问题。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实施过程中城乡贫困一体化的背景下,应整合城乡各方面的相对贫困治理资源,取消城乡居民在公共产品供给、反贫困等方面的差别待遇,为贫困人口在生产要素、产业支持、市场支持、自我组织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持,从而最大限度地缓解相对贫困。

2. 建立完善相对贫困治理政策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城乡出现的相对贫困现状、特征、原因、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国必须稳定有效地探索相对贫困治理机制,在城乡一体化方针指引下,完善预防、救济、开发相结合的相对贫困治理政策。

其一,建立和实施预防性贫困治理政策,减少贫困风险。随着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土地迅速集中,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在此过程中,农民的民主权利和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权利尚未得到切实保护,侵犯农民权益的问题时有发生,特别是侵犯农民潜在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使得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存在着总体收入下降、就业困难和长远生计缺乏保障等贫困风险^[6]。因此,应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范围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满足城乡相对贫困群体的生产和发展需求,提高贫困群体的福利水平,提升贫困群体的抗

风险能力。在农业产业化方面,应建立健全益贫惠农的利益衔接共享机制,引导龙头企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成为公益性的社会企业,在“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操作层面,赋予农民更多的收益权。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应注重挖掘相对贫困人群的优势资源,充分尊重他们的价值、尊严,平等关注他们的需求,整合社会资源和相对贫困人群的自我资本,引导他们积极参与自持自救、生活适应、就业培训等教育活动,提高个体和家庭的自我减贫能力,使他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自己的贫困状况。作为一个广泛、分散和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农民在风险面前比较脆弱,应引导鼓励农民自下而上地采取组织化的手段,以集体化、组织化行动应对各种风险,同时应借助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社会救助等渠道建立健全风险分担机制。

其二,建立和实施救济性政策,降低贫困人群脆弱性。“财富上移,风险下移”是社会财富与贫困风险的变化规律,城乡贫困人群因经济状况较差,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冲击,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弱。当前,应建立标准相对统一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障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体系,以机会均等为原则,把所有符合条件的城乡相对贫困居民全部纳入到保障体系之中,提高相对贫困人群的风险应对能力,降低城乡居民的贫困脆弱性。

其三,实施就业援助政策,提高相对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以劳动力方式参与就业、进入劳动力市场,能够降低因农业收入损失所导致的贫困脆弱性,但容易遭受就业排斥和失业风险。实施就业援助的目的在于打破贫困人口的贫困恶性循环,增加其就业机会与能力。从新型城镇化要求和贫困问题表征来看,在未来一段时期,相对贫困治理应以实施再就业扶贫政

(下转第 103 页)



引用格式:向云平.我国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问题探究[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3):96-103.

中图分类号:G807.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3.014

文章编号:1009-3729(2021)03-0096-08

我国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问题探究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curriculum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China

向云平

XIANG Yunping

周口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0

摘要: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是教师教育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终身教育理念与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一种发展趋势。目前,我国体育教师教育课程存在课程授课形式呆板,教学方法陈旧;课程结构比重失调,类别更新迟缓;课程内容衔接不畅,教育实践形式化;课程师资力量匮乏,教学评价模式单一等问题。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是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基石,其应遵循德性教育原则、专业性原则、终身化原则和融合发展原则,构建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观念引领体系,寻求互联网+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开发路径,推动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资源整合,以及建立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保障机制等。

关键词:

教师教育一体化;
体育教师教育课程;
终身教育;
融合发展;
互联网+

[收稿日期]2021-03-23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教学改革课题(2020-JSJYB-072);周口师范学院校级教改课题(J2019053);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0BTY023);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2019SJGLX018)

[作者简介]向云平(1983—),男,湖南省永顺县人,周口师范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体育课程一体化。

体育教师教育是健康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是提升体育教育质量的动力源泉,是实现全民健康、立德树人任务的基石。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是教师教育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终身教育理念与教师专业发展理论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一种发展趋势。实现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对促进体育教师教育课程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体育教师教育课程逐步发展完善,但同教师教育一体化的政策旨趣与发展指归仍存在一定差距。目前,学界着重研究教师培养方案、师资整合等问题,对教师教育一体化课程体系构建的研究较少,尤其对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建设的研究更少。鉴于此,本文拟在考察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提出的基础上,分析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的现状,明确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所要遵循的原则,提出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的实现路径,以期为推动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建设提供参考。

一、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的提出

国外对于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法国终身教育理论家、实践家保罗·朗格朗于1965年正式提出“终身教育”这一崭新的教育理念。他认为,终身教育是人的一生的教育(纵向)与个人及社会生活全体的教育(横向)的总和^[1]。终身教育体现了教育应持续发展、耦合发展、专业发展的特质。教师是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因此教师教育应贯彻终身教育理念。1975年国际教育会议讨论通过了《对于教师作用的转变及其对教师准备教育、在职教育影响的建议》,其中明确提出要将教师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统整为持续统一发展的有机体,改变断层状态^[2]。教师专业发展理论强调应以实际问题与现实需求为基础,以连续性、动态性、终身性为原则,整体规划教师教

育。由此,教师教育一体化正式提出。随后,终身教育理念与教师专业发展理论成为众多国家教师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

我国教师教育一体化的提出与发展较国外晚,但我国尤其认同与重视教师教育一体化理念,并借鉴国外有关改革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实现了快速发展并不断完善,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一体化发展格局。1999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提出,建立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实现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相贯通。2011年,为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全面提高教师培养质量,教育部正式颁布的《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创新教师教育课程理念,加强教师养成教育,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建立课程管理和质量评估制度等。2012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推进教师教育内涵式发展,教育部等部委共同印发的《关于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意见》提出,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完善教师培养培训制度,建立联合培养教师新机制,发挥好行业企业在培养“双师型”教师中的作用;深化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强化教师教育课程。2018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中提出,建设高校与中小学协同开展教师培养培训、职前与职后相互衔接的教师教育改革实验区,带动区域教师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提升教师培养培训质量。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强调,强化职前教师培养和职后教师发展的有机衔接,夯实教师专业发展体系,推动教师终身学习和专业自主发展^[3]。这些文件均就推行教师培养模式、强化教师教育课程、创新教师教育课程理念等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顶层设计与具体

实施方案,为我国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

二、我国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体育教师教育改革在原有实践基础上,依据“统一规划、优化结构、创新理念、突出特色”原则,对体育教师职前培养课程安排与具体实施方案进行了修改,并进一步优化了体育教师职后教育的课程设置与实践规划,努力实现体育教师教育课程的有序衔接,增强其合理性、系统性、有效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预期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完善的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与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在以下四个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

1. 课程授课形式呆板,教学方法陈旧

当前,我国体育教师教育课程的授课形式多是在要求时间内到规定地点集中学习特定内容,忽视了参训体育教师个性化的学习内容需求与自身时间安排等客观情况。首先,体育教师作为独立个体,差异明显,班级授课制的体育教师教育课程针对性较弱,且多为“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案例研讨、教学观摩、项目式合作学习等引导式教学方法尚未普及,培训教师对参训体育教师综合素养参差不齐、学习兴趣不高、主动性不强等问题应对乏力,教学方法有待创新。其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极少将心理学、逻辑学、管理学、音乐学等跨学科教学方法运用到体育授课中,教学方法较为单一。再次,培训教师与参训教师之间缺乏实际互动与思想碰撞,致使培训效率无法保障且培训成本较高。

2. 课程结构比重失调,课程类别更新迟缓

其一,课程结构比重失调。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体育教师教育课程多由通识课程、体育专业课程、教育课程三部分组成,其中通识课程

占比约为27%、体育专业课程占比约为50%、教育课程占比约为23%,呈现出重专业课程轻教育课程、重学术轻示范的态势。

其二,课程类别更新迟缓。随着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体育教师教育课程却仍以旧课程为主,智能教育、校本课程研究等新理念注入较为迟缓;有利于提升教师综合素养与专业水平的课程,如班级管理、心理辅导、教育改革实时动态、时间管理、智能教学等课程类别未涉及或受到重视。此外,理论选修课程数量偏少,涉及面较窄且综合素养门类课程缺乏,这与提升教师整体素养的教师教育改革趋势不符。

3. 课程内容衔接不畅,教育实践形式化

其一,课程内容衔接不畅。目前,我国体育教师职前培养课程与职后培训课程设置未进行深度整合,课程内容安排存在不同形式的交叉、重复甚至空白等现象,各阶段分工不明确,重点不突出;忽视了体育学科课程与教育学课程间的内在联系,学科话语体系不统一,尚未形成流畅贯通的课程内容体系,致使体育教师职前职后教育合力作用效果不明显。

其二,教育实践形式化。我国体育教育实践多只有教育见习、教育实习和毕业设计等,且多采用集中一次实习的方式,未对实践课程进行合理规划,尚未形成相辅相成、循序渐进的教育实践课程体系。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因实习工作由不同培养单位共同承担,各负责单位缺乏有效协商与配合,各实习指导老师、负责导师与学生三者之间缺乏及时有效沟通,指导力度、强度、宽度、深度均未达到目标要求,距离形成系统性、层次性、高效性的体育教师实践体系还有一定差距。

4. 课程师资力量匮乏,教学评价模式单一

其一,“双师型”师资缺乏。目前,我国体育教师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师资多为高校教师

或继续教育培训机构,教育理论涵养较高,具备良好的学术科研能力,但缺乏体育基础教育教学实践经验,脱离体育基础教育实际,其教授的内容理论性强,可操作性弱,且未对教育理论与体育基础教学实践的深度融合进行研究,难以满足体育教师教育培训师资需求。

其二,教学评价模式单一。当前,我国体育教师教育评价仍以考试成绩为主,考题偏重记忆型内容,测评方式缺乏创新性与灵活性,以课堂参与度、情感态度、课程效果等提高教师综合素养为评判依据的过程性评价所占比例较小^[4],并缺乏过程性评价细则,评价模式单一,致使“以评促学”效果不明显。此外,信息技术、智能化等评价手段运用较少,教师教育课程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不强。

三、我国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的原则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教师教育现代化,而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是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基石。《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八大理念,即要“更加注重以德为先,更加注重全面发展,更加注重面向人人,更加注重终身学习,更加注重因材施教,更加注重知行合一,更加注重融合发展,更加注重共建共享”。这八大理念,不仅为我国教育发展提供了宏观上的指导,更为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提供了原则遵循。

1. 德性教育原则

德性既是个人行为修养的准则,更是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准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要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体育教师教育应遵循德性原则,不仅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更要以德性原则对待每一位教师,为每位教师提供平等合理优质的培训课程与机

会,真正做到“注重以德为先,注重面向人人”。体育教师只有同时具备德性与教师专业能力,才能最大限度实现体育教师的个人价值。

坚持德性教育原则在体育教师教育中主要有三个方面含义。其一,以德为先。德性原则贯穿体育教师教育课程全过程中,是培养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体育教师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9 月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5]进入新时代,体育教师自身具备德性是进行立德树人教育实践的基础,对学生有着极为重要的教育意义。其二,因材施教。德性原则可满足不同阶段体育教师的实际需求。每位体育教师作为不同阶段的成长个体,其文化背景、实践经验、阶段特征等都存在差异,以德性为原则,可为每位体育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与帮助,助推其快速成长。其三,面向人人。德性原则有利于公平分配教育培训资源。教师教育课程对教师的成长至关重要,将优质的课程资源进行公平分配,使得不论处在乡村还是城市的每位教师都能够及时地等质等量地获得所需教育资源,这不仅是对教师的公平、对学生的公正,更是实现我国教育公平的前提与基础。

当前,由于教育培训资源有限,众多体育教师职后教育培训机构将教师或学校进行等级划分,并依据教师专业水平甚至学校等级对体育教师进行参训门槛限制,致使骨干教师有较多的优质教育资源与学习培训机会,而普通教师或正值成长期的教师只能参加市区级或校本部培训,导致明显的两极分化,进而学生家长想尽办法把学生送到师资力量强的所谓的好学校,形成了教师教育与学生教育的双重恶性循环,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教育不公平。

德性教育不仅适用于教师,更可应用于教

育部门、继续教育培养机构,不论乡村教师还是初任教师,应保证每位体育教师都能享受到优质的再教育,进而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专业教育人员。这是实现全社会教育公平与教育现代化目标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2. 专业性原则

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联合签署的《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明确指出,应把教学视为一种不同于其他职业的专业,教师必须经过严格的持续性的学习并获得专业知识与技能^[6]。教师教育的目的是促进教师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的提升。在建设体育强国的背景下,体育教师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专业教育才能担当起实现全民健康的重任。

体育教师专业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静态的单向度的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多维度的持续发展过程,其涵盖教育情感与态度、专业知识与技能、教育方法与研究。教育情感与态度作为一种教育信念,是教师全身心投入教育的精神品质,其表现为面对不同情景,体育教师能够准确把握学生的情感动态与身体状况;针对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及时作出合理高效的应对;热爱且专心投入到教学中,并积极带动学生热爱学习与生活。专业知识与技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科知识与技能,即教什么;二是教育知识,即为何教、如何教。这二者缺一不可,只掌握体育专业知识与运动技能无法实现教育的根本价值,只有在教育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体育教育,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育人目的。能够运用专业方法解决教育实际问题,是一名合格的专业体育教师所必备的基本职业素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能够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如讲授法、指导法、展示法、视频研讨法、案例分析法等,不断创新教育课程,推动教育实践改革。

3. 终身化原则

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通过的《关于发展成人教育的告知书》指出,要成为文化进步的主人与创造者,就必须终身不断地学习。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的目的,是构建体育教师终身学习体系,保障体育教师终身可持续发展。终身化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终身化观念。思想引导实践,观念支配行为。实现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体育教师必须树立终身持续不断地进行学习的观念。其二,终身化体系。以终身化观念为引导,将体育教师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各阶段目标进行有机结合与综合考量,统筹设计培养培训课程体系,避免体育教师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课程体系各自为政、相互断层、交叉重复等现象。其三,终身自主。体育教师只有终身学习,才能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拥有自主学习与自主发展的能力。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学生的思想观念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体育教学方式与手段应不断优化。体育教师通过体育教师教育课程可及时、快速了解新科技、新思想、新事物,这是提升教师效能感、自主能力的有效手段。

4. 融合发展原则

融合发展,指两种以上不同元素融为一体进而形成新事物的动态发展过程。体育教师教育课程应始终坚持融合发展原则,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坚持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融合。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依存。故体育教师的培养工作,既要注重教授其体育知识与教育理论课程,又要重视体育教育实践课程,使参训教师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并反思实践。其二,坚持教育过程与教育目的的融合。体育教师教育课程的目的不仅是提升教师的专业理论水平与技能,更是培养有道德有品质的人,最终达到育人目标。因此应坚持教育过程与教育目的的融合,贯彻立

德树人思想。其三,坚持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的融合。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体育教师各阶段成长提供帮助和支持,职前教育阶段课程设置重基础,入职教育阶段课程旨在解难题,职后教育阶段课程重在更新知识与观念,这种课程设置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连接,可为体育教师解决各阶段疑惑。其四,坚持教师教育与科学技术的融合。互联网信息技术促进了体育教师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的快速实现,“互联网+”时代教师教育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个性化学习。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体育教师提供了方便快捷多样的教育教学资源,体育教师可根据自身实际需求选择课程,实现个性化学习。其次,生活化学习。“互联网+教师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可随时随地学习所需课程,可以有效利用零碎时间实现泛在式学习,使之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体育教师提供更多的自主权利。再次,交互式学习。互联网为学习者提供了交流平台,体育教师在教师教育课程中与其他参与者、专家等进行交流、分享甚至辩论,在虚拟环境的交互中可实现知识的认知与传播。

四、我国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体育教师教育一体化是促进体育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必要前提,也是优化教师教育资源配置的必要手段,更是推动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探索高效合理的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路径,对促进体育教师教育课程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可从观念引领、“互联网+”、资源整合、体系保障四方面来实现。

1. 构建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观念引领体系

体育教师职前职后课程一体化是一项系统

而又烦琐的工程,既需要统筹全局又需要理性分析。一体化的实现离不开观念上的引领,形成体育教师职前职后课程一体化的观念与意识,明确一体化的发展方向,这是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实现的起点。因此,在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搭建过程中,应以终身教育理念为引领,根据教师专业发展理论,充分考虑课程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全局性、规范性、可持续性的眼光对体育教师教育课程资源进行规划设计,保障课程体系的系统性、合理性、高效性,避免交叉遗漏情况出现,提升整体效能。同时,国家与地方,高校、继续教育机构、中小学,以及专家、教师、学生都应参与其中,共同树立一体化观念^[7],既要保证体育教师教育课程针对不同发展阶段设置合理的教育目标与教育内容,也要保证不同阶段课程之间的衔接与过渡,形成各有侧重又连续完整的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体系。

2. 寻求“互联网+”时代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开发路径

“互联网+”时代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不只是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讲授,而是将互联网技术运用在不同主体、不同内容、不同组织、不同情景、不同领域中,形成一种全新的、动态关联的、衔接流畅的、相互扶持的、共同发展的基本公共体育教育服务供给模式。这意味着“互联网+”时代体育教师教育不仅是利用与借助的关系,更是相互融合的关系。其开发路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其一,精准定位需求,实现共建共享。一方面,因当前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供给与体育教师需求之间出现错位问题,故而应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准确搜集体育教师的学习痕迹,查看分析其学习习惯、学习内容、学习频率等,进而整理归纳出体育教师真实的培训需求,为体育教师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提供可靠性的预测信息。例如,未来语义网可利用自身智能

软件分析体育教师与授课专家的语义要点,并迅速在海量信息中找到相关信息,将相关信息收集到统一数据库并进行细致分类供学习者学习^[8]。另一方面,应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大力推进开放式、高效化的体育教师教育课程建设,建立全方位、多层面、立体化、个性化、共享式的体育教师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在“互联网+”时代体育教师教育课程的平台上,教师可根据自身需求自主选择目标课程,并根据自身学习情况与互动情况及时反馈课程构建中的问题与不足,赋予了体育教师作为参训主体的自主权利与表达建议权。

其二,推广泛在学习,注重专家引领。泛在学习为“互联网+”时代体育教师教育课程的教学范式提供了新思路。首先,应树立以学习为根本、以参训体育教师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参训体育教师的实际需求为课程设置目标,在激发参训体育教师学习兴趣的同时还应关注其学习情况变化,使学习者在不断感悟知识并不断实践进而反省知识的掌握情况的过程中形成高级思维能力。例如,可制作体育教师教育小视频,将其发布于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等社交平台,推广泛在式学习。其次,应注重授课专家的引领导向作用。授课专家应引领参训体育教师认清自我定位与实际需求,针对其个体特征与发展阶段实施个性化的教学方法,帮助其搭建广泛而有效的自主学习平台并激发其自主学习潜力与热情,培养锻炼其自主查找资料并主动学习的能力与习惯,最终引导参训体育教师实现系统性的自主可持续发展。

其三,完善评价方式,实现多元发展。体育教师教育课程评价体系应采用多元性、定量性、全面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方式,将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和综合评价有机结合起来。结果评价是指制定可测量、可评定的量性指标,如听课时长、课后测评、听课类别等,可通过互

联网数据进行测评。过程评价是将参训体育教师课程任务分为多个子任务,以多视角、多层次、多途径对参训体育教师进行全面合理评价,也可及时给予授课专家关于参训体育教师现存问题的反馈。增值评价指向参训体育教师的自我认识,将重点由测量培训结果转向促进专业发展,由只看结果转向突破自我,突出评价机制的人性化与科学性。综合评价不仅关注体育教师教育课程的进程,更关注参训体育教师的专业成长与素质的提高、知识体系的重构、教育教学能力的提高和教育教学情感的丰盈。

3. 推动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资源整合

目前我国体育教师课程开发主要由师范院校、教研机构等负责,但各部门机构间缺乏沟通,致使课程开发效率低、质量得不到保障,所以应对课程开发机构进行整合,建立体育教师教育课程开发团队,发挥各自资源优势^[9]。师范院校在人力资源、设备配置、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具有优势,应成立教师教育课程开发负责部门,承担起体育教师教育的重任,并整合教研机构资源,合力对体育教师教育课程进行统筹设计,采用以课程为中心、以教材为依据、以教学目标为根本的体育教师教育课程框架。同时,应丰富评价类、案例类、交互类等有待改良推广的课程资源,提高体育教师教育课程资源的完备性,实现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

4. 建立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保障机制

体育教师教育课程的推广与应用、反馈与精进,是课程建设的关键一步,因此应设立专业推广部门。推广部门应提前对适用人群进行细分,并针对不同群体开展需求调研;注重课程开发流程的规范化与标准化;根据课程特点、性质、阶段、类型制定针对性的推广方案;充分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通过多种方式向潜在用户推送精品课程;努力完善课程更新机制;积极回访,调查体育教师满意度,根据其反馈信息进行

查漏补缺,以建立完善的体育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 [1] 王晖. 教师专业化背景下体育教师教育课程的一体化[J]. 教育与职业, 2013(17):145.
- [2] 陈时见, 李培彤. 教师教育一体化的时代内涵与实现路径[J]. 教师教育研究, 2020(2):1.
-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EB/OL]. (2019-02-23) [2021-01-13].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23/content_5367987.htm.
- [4] 董新良, 闫领楠, 赵越. 教师教育课程一体化构建:问题、理念及对策:以地方高师院校为例[J]. 教师教育研究, 2020(1):1.

(上接第 95 页)

策为主要方向。统筹城乡就业制度,是解决我国城乡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贫困不是市场经济制度本身造成的,而是由弱势群体遭受了经济社会领域的排斥特别是就业排斥造成的,因而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也必须通过增强贫困人口就业能力来实现。

参考文献:

- [1] 陈端计.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城乡反贫困统筹模式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08(1):54.
- [2] 朱晓, 秦敏. 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5):115.

- [5] 张保淑. 望海楼:新时代教师的“时代重任”[EB/OL]. (2018-09-11) [2021-01-13].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911/c40531-30284793.html>.
- [6] 何菊玲. 教育现代化背景下教师教育一体化课程改革的原则[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5):116.
- [7] 陈时见, 王雪. 教师教育一体化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J]. 教育研究, 2015(8):109.
- [8] 李江, 夏泽胜. “互联网+”时代的教师培训:模式更新、价值证成与行动路径[J]. 教师教育研究, 2020(4):38.
- [9] 何菊玲. 教育现代化背景下教师教育一体化目标与课程体系研究[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3):149.

- [3] 李飞, 唐丽霞, 于乐荣. 走出多维贫困研究的“内卷化”与“学徒陷阱”:文献述评的视角[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147.
- [4] 李丽.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研究[D].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 2010.
- [5] 习近平. 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20-04-30) [2021-01-0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5381003772669410&wfr=spider&for=pc>.
- [6] 张晓玲, 卢海元, 米红. 被征地农民贫困风险及安置措施研究[J]. 中国土地科学, 2006(1):2.



引用格式:陈婉颖. 高等教育线上教学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基于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设计三个方面的探讨[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3):104-108.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3.015

文章编号:1009-3729(2021)03-0104-05

高等教育线上教学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基于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设计三个方面的探讨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online teaching of higher education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three aspects of teachers, students and teaching content designs

陈婉颖

CHEN Wanying

河南警察学院 基础部,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高校普遍采取了线上教学。这场大规模的线上教学实践虽然是特殊时期的应对之举,也是拉开未来教学改革大幕的破冰之策,但也暴露了很多问题。从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设计三个方面来看,线上教学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有:教师由讲授者转变为指导者、由面对面讲授到线上讲授的转变、需严格管理好教学时间和多方面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学生的期望、准备和参与情况;内容设计与教师、多媒体、教学策略的结合。高校和教育部门应直面线上教学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为开展线上教学的教师提供专业发展的机会,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培训,并在技术和多媒体整合方面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支持,以不断提升线上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充分发挥在线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线上教学;
教师角色;
学习者;
内容开发

[收稿日期]2021-03-05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0BYY003);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12400410286)

[作者简介]陈婉颖(1988—),女,河南省焦作市人,河南警察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外语教学。

面对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保证“停课不停学”,我国教育界经历了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教学模式改革,2020年春季全国高校全部采用线上教学。这场全国规模的教学模式改革,让过去多局限于理论探讨的线上教学模式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和检验。由于准备时间短、任务量大、前期未充分调试,线上教学暴露出了很多问题。线上教学绝不仅仅是将讲台转换到电脑屏幕前,离开了外部的监督和学习氛围、情绪感染等因素,同样的教学语言和教学指令对学生的影响会大打折扣。本文拟从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设计三个方面讨论高等教育线上教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提升高等教育线上教学质量提供参考。

一、教师

教师作为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教育教学实践是教学改革成功的关键^[1]。在线上教学中,教师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由讲授者转变为指导者

线上教学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教师角色的变化。线上教学时教师有四种不同的角色:教学角色、社会角色、管理角色和技术角色。教学角色是指社会对教师职能和地位的期望和要求,其规定了教师在教育情境中所应该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具体包括知识的传授者、学习的促进者、教学的设计者等;社会角色是指教师承担着与学生建立社会关系的任务,具体包括社会规范的象征者和人际关系的协调者;管理角色是指教师承担着组织教学活动和学生的职责,具体包括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学生学习的管理者;技术角色是指教师承担着为学生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的任务,即技术的提

供者和帮助者。

线上教学要求教师的角色要从原来面对面授课的讲授者转变为线上教学的指导者。作为指导者,教师必须根据学生所处的在线环境对讲授的内容做出调整。换句话说,在线教师的角色应从面对面授课的知识传播者转变为线上指引学生学习过程的引导者,其主要任务是如何促进学生学习,而不仅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根据H. J. Choi等^[2]的研究,在网络环境中,教学的主要挑战源于教师无法将他们面对面的课程材料无缝地转换到在线环境,并且相比认知层面的教学调整,很多教师对学生的情绪因素缺乏关注^[3],尤其当教师是新手时,角色的变化对其来说更具挑战性。

2. 由面对面讲授转变为线上讲授

如何将面对面的课堂教学有效地转化为在线教学仍然是线上教学面对的一个难题。D. Anderson等^[4]认为,这个转变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教师教学方式的脱节和课程内容如何有效地在在线课堂上传授。线上教学的授课方法不同于传统的面对面的授课方法,课堂互动不仅仅是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还包括学生与学生,教师、学生与技术之间的互动,而教师角色的这种转变必须得到技术开发和课程开发人员的支持。

由于缺乏与学生的视觉交流和面对面的接触,许多教师在授课内容和学生参与方面都遇到了困难。在传统的面对面的授课过程中,教师从学生在课堂上的言语或非言语互动中就能够获取一定信息或线索。而在线上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师看不到学生的表情和反应,无法接受这些情感暗示,从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师生沟通障碍。

据了解,对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规模的线上教学,很大一部分教师表示不太适

应。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准备时间短、前期经验不足、线上平台调试不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教师对线上教学这一新事物不适应,大多数教师是第一次进行在线授课,线上教学打破了传统教学的固有模式。尽管教师们可能乐于通过增加技术手段来提高线上教学质量,但他们可能并不认为在线课程具有与传统课程相同的价值。

3. 需严格管理好教学时间

相较于传统的面对面的教学模式,线上教学更加便捷,但它需要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准备、设计和讲授。国外一项研究数据显示,线上教学准备和授课的时间是面对面教学的两倍多^[5]。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作为“停课不停学”的权宜之举,由于时间较为仓促、准备不够充分,教学效果不太理想。线上教学对时间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能否管理好、用好自己的时间,课前是否抓住时间充分准备、课上是否有效利用时间组织教学活动,是教师能否高效开展线上教学的关键。

4. 多方面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教学模式的转变要求教师转变教学风格,多方面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在刚刚开展线上教学时,很多教师自嘲线上教师是“18线”网红主播,这反映了大家对线上教学的迷茫。教师是决定在线教学能否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教师的沟通能力、创建交流群的能力和有效地传授知识的能力,对学生的学习效果有很大影响。要想提高线上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教师除要成为合格的知识传播者外,还必须是良好的倾听者和沟通者,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创建交流群,用发人深省的问题来吸引学生,从而推动讨论的深入进行;必须能够并且愿意提供即时的反馈,并营造一个轻松的环境,让学生感到自己被重视,并愿意分享他们的想法。每天或

每周保持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是帮助创建交流群并让学生参与线上教学的重要策略。教师可通过QQ群、微信群等与学生展开讨论,鼓励学生即时反馈学习体验,帮助学生解答问题。与所有的学习环境一样,在线上教学中教师必须重视学生的反馈意见,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并确保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而提高自己的在线教学质量和水平。

二、学生

作为线上教学的实施对象,学生对在线教学的期望、准备和参与情况会直接影响线上教学的质量和效果,这也是高等教育线上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

1. 学生的期望

对于线上教学,一些学生可能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如期望他们的在线评论和作业能够得到老师及时的反馈,老师能认真关注线上布置的作业和任务是否按时完成,以及老师应认可他们的线上测试成绩等。建议教师在开展线上教学时,在课程开始时就要清楚地告诉学生线上教学的规则和要求,以尽量减少学生不切实际的期望。

2. 学生的准备

在线教学不仅对教师来说是一种挑战,对于学生来说同样也具有挑战性。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够成功地参与在线学习,大多数情况下,学生需要进行自我激励和自我调整。因此,教师应该随时准备帮助缺乏必要学习技能的学生。为了帮助学生掌握线上学习所需的技能,M. Hung等^[6]提出了一个模型,该模型包括五个维度的准备:自主学习、学习动机、计算机和网络自我效能感、网络沟通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者控制。自主学习指学生清楚自己的学习需求,能够确立自己的学习目标,实施自己的学习

策略和评估自己的学习效果。网络课程为学生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自主学习水平高的学生在网络环境中更能够获得学习上的成功。动机是指“出于好奇和享受而做某事的需要”^[6],在线学习动机对线上学习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计算机和网络自我效能感是指学生对自己使用计算机和网络完成任务的技能的认知。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其在线学习往往表现得越好。网络沟通自我效能感是指学生对自己在网络环境下的沟通能力的感知,与在线学习时的表现正相关。学习者控制是指学生对自己学习经历的指导程度^[6]。与传统学习方式相比,在线学习的学生可以灵活选择学习内容的顺序、节奏和数量,也可以采用更为个性化的方法进行学习。教师可以通过上述这个模型来评估学生的准备水平,对那些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学生要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指导。

3. 学生的参与情况

在线学习时,由于学生离开了课堂环境和班级群体,他们很难建立归属感、目标感和规范感,从而变成线上学习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线上学习的积极参与者。与传统课堂相比,将音频或视频课体与在线文本讨论相结合,可以增强学生在线讨论的参与意识,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和联系,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学生可以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并缩短交流时间,从而打破课堂僵局和弥补文本材料的不足。但由于有些线上课程网络平台建设不完善和网速的限制,很多时候线上教学并不能采用全程视频,声音传输不流畅,影响了线上教学的学生学习体验和参与积极性。

三、教学内容设计

线上教学内容设计得好坏与教师、多媒体和教学策略是否有机结合密切相关,也是高等

教育线上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

1. 内容设计与教师

在大多数的线上课程中,教师一般是使用规定的内容进行教学。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创造性地将自己的经验整合到课程内容中的作用就被淡化了。从面授课程到在线课程,生成新材料或调整材料的任务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由于改革和准备的时间仓促,很多高校并没有给教师提供适当的培训和支持,这导致教学内容多是简单地从面对面的授课环境复制到在线环境。在未来的线上教学改革中,应当鼓励教师参与线上课程的内容设计,运用先进的教学技术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通过增加线上课程教学改革项目、灵活的课程安排、适当的物质奖励等措施激发教师设计和开发线上课程的意愿。

2. 内容设计与多媒体

线上教学内容的开发需要整合多媒体资源,包括学习游戏、视频和情景模拟等。但需要注意的是,简单地将其融入到在线课程的设计中并不总能得到理想的效果,教师需要明确多媒体的融合对于哪些学习活动具有促进作用。错误使用或过多使用多媒体反而会喧宾夺主,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根据多媒体学习理论,有三种促进学习的教学设计方法:少即是多、多即是多、专注多即是多^[7]。“少即是多”的方法侧重于减少或消除无关紧要的内容,以避免学习过程中的任何干扰。“多即是多”的方法关注添加的效果,如添加图像,可以丰富教学内容的呈现形式,增加学习趣味,但同时也要把握添加的度,添加太多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关注多即是多”的方法是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来学习课程材料,同时使用添加的功能,如添加图形和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多媒体的整合应用可以为学生提供多次反复学习一节课的机会,而不需要教师重复相同的内容。河南某高

校针对线上课程的一项调查统计显示,线上学习期间最常用的功能是弹幕和回看。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多媒体工具在线上教学中的作用,应在线上课程内容设计的早期引入多媒体技术。

3. 内容设计与教学策略

线上课程的内容设计应以学生为中心^[8]。线上教学虽然与传统的面对面的授课环境不同,但使用最佳的教学策略是最重要的,在这一点上,线上教学与传统教学是相似的。有效的教学策略包括师生间对等互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注重实践和应用、个性化多样化、启发式教学等。例如,与同伴合作是提高学生学习和参与意愿的一项重要策略,线上教学的内容设计应包括协作活动,教师应给出相应的互动和参与的详细规则。

此外,线上教学还需要教师发挥共情的作用。学生是线上教学活动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离开学生的积极参与和密切配合,线上教学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因此,线上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既要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也应理解和充分考虑学生的情感需求,从而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教学实效性。

四、结语

本文从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设计三个方面阐述了高等教育线上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这对于提升线上教学质量和效果具有重要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历史总在不断发展,世界回不到从前。2020年春季全国高校采取线上教学,虽然是特殊时期的应对之举,但也是拉开未来教学改革大幕的破冰之策。可以预见,后疫情时代,线上教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将会逐渐成为常态。在在线教育环境中,

教师、学生和-content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高校和教育部门应直面线上教学在这三个方面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为开展线上教学的教师提供专业发展的机会,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培训,并在技术和多媒体整合方面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支持,以不断提升线上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充分发挥在线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许悦婷,陶坚. 线上教学背景下高校外语教师身份认同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20(5): 12.
- [2] CHOI H J, PARK J. Difficulties that a novice online instructor faced: A case study[J]. Distance Education,2006(7):317.
- [3] 范国睿. 智能时代的教师角色[J]. 教育发展研究,2018(10):69.
- [4] ANDERSON D,IMDIEKS S,STANDERFORD N S. Feedback please: Studying self in the online classroo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truction,2011(4):3.
- [5] CAVANAUGH D. Teaching online: A time comparison[J]. Online Journal of Distance Learning Administration, 2005(8):1.
- [6] HUNG M, CHOU C, CHEN C, et al. Learner readiness for online learning: Scale development and student perceptions[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0(55):1080.
- [7] MAYER R E. Incorporating motivation into multimedia learning[J].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2014(29):171.
- [8] 邱晓辉,彭文辉. 网络课程发展性评价[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07(4):26.